

# 纳 萨 尔 巴 里 运 动

〔印度〕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著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一九七八年六月

## 譯 者 說 明

本书作者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是印度共（马）的成员，现在在英国布赖顿的萨塞克斯大学工作。

在印度共（马列）领导下的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遭受挫折之后，最近几年，印度各革命派都在力求正确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他们多数认为，这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在具体路线政策上发生错误，斗争遭到挫折。与此同时，印度的统治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也乘机制造反革命舆论，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挑拨印度各革命派之间的革命团结，歪曲和诬蔑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妄图瓦解印度人民的革命斗志。

本书作者站在印度共（马）修正主义集团的立场，打着“调查研究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招牌，大力兜售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套黑货，并为它破坏、镇压纳萨尔巴里人民武装斗争的罪行进行辩解。本书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印度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宣扬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作者叫嚷什么“现在在印度把武装斗争列入议事日程”“为时过早”，胡说什么纳萨尔巴里运动失败主要是由于“印度的统治阶级不是买办性的，并不缺乏人民的支持的”，“人民还不准备革命”。

本书多处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我党对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其中有不少歪曲诬蔑和挑拨之词。

由于本书引用材料较多，对于研究印度的革命运动有一定参考价值，所以现将全书译印出来供内部参考，希读者批判地使用其中的材料。

本书各章附录篇幅较长，参考价值不大，一律从略。

一九七八年四月

## 目 录

序.....	( 5 )
前言.....	( 7 )
第一章 纳萨尔巴里和纳萨尔巴里分子.....	(10)
第一节 纳萨尔巴里起义.....	(10)
第二节 纳萨尔巴里运动以前印度共产主义 运动的梗概.....	(25)
第三节 第三个共产党的诞生.....	(37)
第二章 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农村地区的武装斗争 和歼灭运动.....	(53)
第一节 歼灭运动.....	(55)
第二节 斯里卡库兰起义.....	(62)
第三节 其他地方的红色根据地.....	(68)
第四节 一点评价.....	(73)
第三章 文化革命.....	(89)
第四章 城市游击活动.....	(101)
第一节 歼灭运动.....	(101)
第二节 积极分子和支持者.....	(117)
第三节 其他政党的态度.....	(127)
第四节 结束语.....	(132)
第五章 什么是纳萨尔巴里主义.....	(141)
第一节 印度国家政权的阶级性.....	(141)

第二节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议会选举的看法·····	(146)
第三节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武装斗争前景的看法·····	(152)
第六章	纳萨尔巴里主义的不同派别·····	(169)
第一节	导言·····	(169)
第二节	马宗达同安得拉派的分歧·····	(172)
第三节	马宗达同比哈尔组织的分歧·····	(175)
第四节	马宗达同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的分歧·····	(180)
第五节	马宗达同阿希姆·查特吉的分歧·····	(186)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印度共(马)和印度共(马列)·····	(193)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马)·····	(19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马列)·····	(206)
第八章	结束语·····	(219)

## 序

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用这本书来宣布一项关于研究和专题论文的计划。这些著作内容涉及印度社会紧张和不安定的局势，包括旨在使现“制度”和支持这一制度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研究中心愿意鼓励关于印度社会改革的不同观点，并希望一场有意义的辩论将在系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以代替不是以学习和研究为根据的论战。

我们相信，克服贫乏的抽象论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倡在有计划和有系统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辩论。这种研究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思想内容和提出一种独立的、连贯的看法(如本书)，或者可以从各种不同观点和经济的限度讨论主要的题目(如本丛书将出版的关于国家建设的著作)，或者是提供关于印度各种问题和倾向的叙述性和分析性材料(如随后将出版的关于城市紧张局势的专题论文)。有些研究可以涉及各种运动，另外一些则可对各种看法作横断面解剖。但是各种研究的指导思想都是为了说明问题——以及为处理这些问题而作的努力——并为有系统的学术讨论提供材料。

我们极其高兴地赞助这个对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这个运动曾一度提供了革命变革的希望，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为配合研究中心对城市紧张局势的研究，对加尔各答进行了研究，他决定把他长期以来对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兴趣继续维持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是城市研究计划的结果，而是它的一个副产品。这完全是达斯古普塔的工作，研究中心只是在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和需要帮助的时候才给他以帮助，正如研究中心对它自己的学者所做的那样。达斯古普塔也有一种由某些强烈信念所指导的特定看法，而其中有些信念可能是非常值得争论的。然而这正是本丛书的整个目的。我们确实很高兴把这本书作为本丛书的第一部予以出版。

拉杰尼·科塔里

##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书。纳萨尔巴里这个名字来源于孟加拉北部大吉岭县的一个名叫纳萨尔巴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在一九六七年经历了一场反对当局的、宣布以在印度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短暂斗争。这个事件本身也许不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在我国当代政治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一个保证忠于中国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开端。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分裂成为许多小派别，但其中最大的，即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九六七——七一年期间曾对西孟加拉的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在本书的大部分地方，我们倾向于把印度共（马列）和整个纳萨尔巴里运动等同起来，但我们并没有忽略其他的纳萨尔巴里派别，并且指出了他们同前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纲领上的分歧。

我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从伦敦大学到印度度假，并在那里逗留了约十三个月。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里度过的，但我在四次访问加尔各答的过程中，也在那个城市总共度过了约四个月。我的加尔各答老家在一个当时被称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解放区”的地区内，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在加尔各答会见的人范围很广：各左翼政党的领袖（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老相识），我在学生时期认识的形形色色的纳萨尔巴里分子，以及我的和不参与政治活动的亲友。通过和各界人士确实多达数百次的没有经过组织



的会见，我得到大量有关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情况，他们的阶级、年龄、文化程度、他们的态度以及人民对他们的态度。我也看到了纳萨尔巴里分子采取行动的情景，特别是在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当时正在举行期中选举，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的活动正处于最高潮。没有这第一手的知识，没有从我和许多人的谈话和讨论（有时是十分激烈的讨论）中得到帮助，这本书是永远不能完成的。

在加尔各答时，我也收集了纳萨尔巴里分子供党内讨论而出版的文件以及他们的出版物（特别是《爱国者报》和《解放》），这些出版物虽然是非法的，但愿意得到的人都可以秘密地拿到。加尔各答还有两个周刊——《新地》和《镜报》——也载有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有用的材料。同时，当然我也必须查阅报纸合订本以了解每日的动态。但是，要对这些报道作去伪存真的工作，则始终是一件难事，而我在做这工作的时候就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判断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加尔各答时，我为孟买的《经济和政治周刊》写了两篇不署名的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的活动的文章，后来又在德里、加尔各答和特里凡得琅的一些讨论会上就这个题目做过演讲。到处都要求我写一本书略述纳萨尔巴里运动，它的目标、纲领和行动，以及它同印度共（马）和印度共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直至一九七一年七月我才开始写这本书，但政治形势变化得那么快，使我不得不几次修改我的原稿。只是从印度回来以后，我才设法把稿子写成了。我感谢我的朋友们鼓励我承担起写一本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书的工作，特别是感谢那些曾阅读第一、二章的初稿并提出许多

意见的朋友。我特别感谢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及其主任拉杰尼·科塔里，他鼓励我承担和完成这件工作并安排这本书的出版，在研究中心关于印度城市紧张局势的研究项目下，我从事于研究加尔各答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工作，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研究事实上就是从上述工作中产生出来的。我对研究中心的秘书阿瓦·库拉尔夫人表示感谢，她安排和校对了各种草稿的打字稿——这常常是在德里和萨塞克斯远隔重洋的情况下完成的，——因而加速了这本书的出版。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阿拉蒂，她总是首先阅读各章草稿并提出意见。

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

萨塞克斯大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所

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日

# 第一章

## 納薩尔巴里和納薩尔巴里分子

### 第一节 納薩尔巴里起义

納薩尔巴里，这个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麓六十多个村庄的地区，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在那一年，它成了产生印度新政治运动的一场武装起义的舞台。納薩尔巴里地面方圆八十平方英里，有森林、茶叶种植园和农田，居住着四万二千人。居民大半是部族人：桑塔尔人、奥劳人、蒙达人、拉杰班希人。从生态特点来看，这些部族和分散在国内的其它部族并无什么区别。它的经济，主要是以轮耕制为基础的农业，但很大一部分土地用于生产茶叶。从地理上说，它是西孟加拉邦最北部以茶园和山区休养胜地著名的大吉岭县西利古里大区的一部分。它同尼泊尔和中国边界接近，这一点在起义开始后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所属的那个邦立法会议选区(邦的二百八十个选区之一)，在选举中始终是把执政的国大党的候选人选进邦议会的。这个地区同全国公路网有良好的联系，附近还有一所大的兵营。

一九六七年是西孟加拉邦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年二月，第四次大选结束了国大党连续二十年的统治，十四个政党的联盟上台执政，联盟中有两个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

党（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一般地被称为“亲苏”，第二个“亲华”。这两个共产党在选举中是互相对立的；印度共同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人的党（孟加拉国大党）和其它几个政党结成同盟，而印度共（马）则领导由几个左翼政党组成的另一个联合阵线。

尽管出现了三方的竞选，国大党以外的政党又互相诋毁攻讦，但国大党并没有能够赢得绝对多数，在全邦群众庆祝国大党垮台的空前欢乐气氛中，两条联合战线在选举后联合起来，组成西孟加拉邦的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共同纲领起草出来了，组成执政联盟的每个政党都签了字，新政府开始了它的事业，很得公众的好感。可是，在有二百八十个席位的邦议会里，政府中的多数派只比国大党多二十八席而占微弱优势，政府的生存依赖一批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小政党。这些议员中的某些成员被对方用政府职位收买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比这一点更严重的，是联盟内部各主要政党在方针上的分歧和群众基础的不同。所有的党都同意共同纲领，但它们中间有许多党只不过把纲领看作是一个宣传手段，在贯彻纲领的问题摆上日程时，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就没办法再掩盖了。联盟内部的争端，集中于诸如警察的作用、新政府的劳工和土地政策等这样一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警察不干预土地和劳工纠纷，而各个富农党——例如孟加拉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则谋求在那些冲突中使用警察。在头两个月内，裂缝已是如此之大，即使假定国大党管理的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那也只有奇迹才能使这个联盟在规定的整个五年任期内存在下去。

来自纳萨尔巴里的第一批消息，五月末出现在全国性报纸上。报道说，一群部族农民，在印度共（马）的地方组织的领导

下，已经控制了那个地区，并正在宣传通过武装斗争在全国夺取政权。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五月二十二日，当时一个地主违反法院的命令，试图对一个贫苦佃农实行夺佃。另一次冲突发生在第二天，在一个茶园附近占地的部族人同茶园的武装警卫发生了冲突。五月二十四日，一小队警察开进该地区，但遭到伏击，一名警官被打死。第二天，一支较大的警察队伍被派往那个村庄，但找不到那些人，他们已逃走了。警察向示威的妇女和儿童开枪，打死九人。警方的这种报复行为，激怒了部族人，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支持该地区的印度共（马）领导人。

虽然大多数人在这些事件以前没有听说过纳萨尔巴里，可是共产党人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活跃在那个地区。一九五九年，他们第一次做出认真的努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组织部族人。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就是部族人被逐出了他们开垦和种植的土地的问题。土地档案保管不善，部族人又不懂土地立法的复杂性。他们的耕种方法是：开垦森林，在开出的土地上耕种一个时期，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这使得他们同林务官和地主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在森林开垦出来后宣称他们对之拥有所有权。共产党人在部族人中间开展这个运动时，还提出了债务的沉重负担、贷款的过高利率、地主在抵押期满后拒不退还抵押的土地和其它类似的问题。部族人既未受过教育又贫穷，他们依靠共产党人领导他们反对富裕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①。

部族人的领袖是一名忠诚的党的工作者，名叫卡努·桑亚尔，是附近城镇的属婆罗门种姓的人。在纳萨尔巴里起义时，他年纪三十四、五岁。他来到该地区后，不久就学会了部族的话

言，尽最大努力同农民的生活打成一片。在组织会议、示威、向当局派请愿团方面，在承揽涉及农民的土地权利的诉讼方面，在抵抗高利贷者和地主侵犯他所热爱的穷苦人的生活等方面，他都很积极。桑亚尔尽管来自城市，出身于高贵的种姓，但是由于他完全参加了他选定居住下来的那个社会的生活，他赢得了该地区人民的爱戴。他在战地的亲密同事是詹加尔·桑塔尔——一个有战斗精神的部族人，过去曾数次代表共产党竞选邦议员。

桑亚尔虽是纳萨尔巴里的未加冕的国王，而他在区一级的领导人却是查鲁·马宗达——一个在西里古里城居住多年的人，富农家庭出身，四十年代初期成为共产党人，在北孟加拉的两个重要城市西里古里和贾尔派古里的建党工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和桑亚尔不同，他不是群众领袖，他在当地作为一名党的工作人员而出名。桑亚尔是一个活动分子，乐于投进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马宗达在健康毁坏以前，虽然也是同样努力工作的，却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理论家。他虽然身材疲弱矮小，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人人都说马宗达是桑亚尔的导师，但马宗达同邦内党组织领导集团的关系却并不总是那么愉快的。他是一个难于共事的人，坚持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马宗达一生为党工作，直到纳萨尔巴里起义，他在全邦却不怎么有名，在他自己的地区以外，也几乎没有党员知道他。即使在故乡西里古里，马宗达也不如该地区的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和理论家萨蒂恩·马宗达出名，后者曾几次在邦议会代表该地区。

一九六二年同中国发生边界战争以后，马宗达、桑亚尔和许多其他“左翼”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有被人称之为“亲华”的感

情，坐了几个月的牢，一九六四年，当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时，他们两人都加入了新成立的印度共（马）。在这个时期，马宗达热情地忠诚于中国党。他鼓吹新党把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其活动的指导原则，有一个时候，他发表讲话赞成用宣布印度共运为中国党组织的一个支部的办法，把印度共运在组织上同中国党联系起来。在最初几个月里，他在本地区极为热情地为印度共（马）进行工作，可是在印度共（马）的领导者们拒绝接受中国对于印度革命前景的看法和中国对于印度国家政权性质的提法，并且未能在同苏联进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全心全意地站在中国一边时<sup>②</sup>，他对印度共（马）的领导人便感到失望了。也象印度共（该党并不掩饰它加入苏联党）一样，马宗达要求印度共（马）加入国际共运中中国党领导下的那一方。

一九六三年，马宗达作为未分裂的共产党的候选人，参加邦议会西里古里选区补缺选举的竞选，但遭到惨败，丧失了他们竞选保证金。这一结果同马宗达本人没有什么大关系，因为这次选举是在同中国的边界战争几个月之后举行的，这种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宗达对于这个结果耿耿于怀，许多很了解他的人认为，他以后完全反对参加议会选举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这次竞选的失败。

到一九六六年，马宗达在党内为鼓吹接受“中国路线”而进行了许多个月的工作之后，已经明白：新党——印度共（马），同他关于印度革命的意见（或中国的意见）的共同点，比他起初想象的要小得多。在印度共（马）内部，持这种见解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印度共（马）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包括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要求这个党在中国党同苏共的搏斗中站在中国党一

边，并通过可以反映中国党对于印度形势的意义的纲领。起初，他们对于正式路线的反对，采取了“党内斗争”的形式，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另一种意见，同时又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可是后来，他们有些人试图另立党的中心，在党员中宣传他们的观点③。从六十年代初期起，就有一个名叫红旗的派别，在南吉尔·塞尔万的领导下活动于马德拉斯，声称同中国党有直接联系④。塞尔万早已被共产党开除了，可是他起草并散发的文件却成了著名的《南达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该报告是由当时的印度内政部长古尔扎里拉尔·南达为了证明不经审讯而监禁印度共（马）的领导人是有理的而于一九六五年提出的⑤。另一个被开除的库尼卡尔·纳拉亚南领导着喀拉拉邦的一个独立的派别，这一派宣称忠于毛主席的思想。在西孟加拉邦本身，加尔各答的四名学生在一九六五年集体越过印度边界，到尼泊尔去会见驻在那里的中国大使。据了解，大使没有给他们任何鼓励，在简短的会见后把他们打发走了。中国人尽管对印度共（马）的政策有保留，在当时却认为它是唯一的印度共产党，中国人不愿被人看到他们在鼓励分裂出去的派别⑥。

没有迹象表明马宗达同这些分布在印度各地的派别有任何联系。但在一九六六年以后，他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在党员中间秘密流传。他甚至化名给政治局写信，批评它的政策⑦。他在这些活动中，发现印度共（马）西孟加拉邦委委员、党刊编辑之一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是一个愿意合作的人。乔杜里随后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协调委员会的召集人，在印度共（马列）成立后又任该党政治局委员。这位乔杜里同马宗达一样，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和马宗达不同的是，他是文静的、谦逊的，然而因为他身



在党的加尔各答邦总部，党员认识他的人就多多了。在印度共（马）决定参加一九六七年选举以后，马宗达和乔杜里联名散发了一个文件，批评参加选举，指出印度统治阶级是由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组成的，强调开展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至少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前一年，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平行的党中心，接连不断地出版批评党的路线的文件⑧。

在选举进行的时候，还看不清楚国大党不能取得绝对多数。各反对党四分五裂，两个共产党在许多选区里互相争夺。马宗达反对印度共（马）参加选举，同时正在通过卡努·桑亚尔制订在纳萨尔巴里地区开展大规模运动的计划，运动在选举结束、新政府成立后不久便要开始。在印度共（马）的领导者们看来，这次运动是为了确立部族人的权利，重新分配土地和接管由封建分子非法占有的过多土地。除了广度和激烈程度以外，这次运动同过去在同一领导下在该地区进行的运动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国大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和十四个政党联合执政，根本上改变了预定在选举以前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条件。马宗达被印度共（马）同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有几个党依靠富农的支持）和亲莫斯科的印度共联合起来组织政府的决定激怒了。他反对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去参加一个根据资产阶级宪法的邦政府，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会鼓励党内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失败和联合阵线上台执政时全邦群众表现的欢腾使他相信人民愿意变革、进行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西孟加拉选举的结果，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遍及全国的、日益高涨的反国大党浪潮的一部分。执政党在八个邦里丧失了多数，而共产党人在喀拉拉邦却大获成功。政治制度出现了裂痕，“一党支配一切”

制正在明显地崩溃，几乎在每个邦里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人集团，即使在执政党能设法保持其多数的那些邦里，也存在一个党的党员退党去参加另一个党的可能性。六十年代初期、中期，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失业惊人地增长，这个时期的经济停滞现在导致了一场突然的政治危机，其规模之大，是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学权威在一年之前都未能预见到的。大选后不久，在比哈尔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印度的几百万饥民现在靠根据四八〇号公法提供的美国粮食勉强维生。

不仅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危机，而且对国大党的反抗在各地都在增长。尽管有政治危机和对国大党的反抗，马宗达认为仍然有这样的危险，即各左翼政党，特别是他自己的那个印度共（马）的无效果的议会政治，会缓和人民对执政党的对立情绪。他得出结论：从被他认为是党的“修正主义领导”手中夺过主动权并把基层党员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那时正是“文化革命”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炮打司令部”是那里的流行口号。如果群众已准备革命，统治阶级又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和冲突而变得脆弱，就没有理由在群众性民主斗争上去浪费时间了⑨。已经没有必要再坚持纳萨尔巴里运动原来的纲领了，党的口号应当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经济改革了⑩。

印度共（马）现在是邦政府中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马宗达虽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而极为反感，然而这一事实结果却对他是有利的。新的联合阵线政府已经宣布，警察将不干预土地纠纷；不论他同印度共（马）的部长们有什么样的分歧，只要政府继续执政，就可以依靠这些部长们去制止大规模的警察镇压。

运动的准备工作是背着党的邦领导人进行的。当这些领导人

因听到谣传而提出询问时，马宗达和桑亚尔总是对他们保证说，运动不会越出原计划的范围。印度共（马）已发现同联盟中的伙伴一起工作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劳工战线上的“围困运动”问题上，因此印度共（马）的领导者们很想避免其它政党的这种猜疑：它表面支持议会制，却在从事推翻政府的阴谋。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发生的第一次事件后不久，印度共（马）在纳萨尔巴里的组织的领导者们即宣布该地区是“解放区”，不允许警察和政府官员进入。为保卫该地区而成立了武装小队。为接管学校和其它公共活动而成立了村委员会，村委员会也行使司法机构的职能。组织了对富农住宅的袭击，富农囤积的大米被没收，他们持有的抵押和贷款单据都被销毁了。

全国报刊对这些事件作了空前的宣传。许多人当时认为，这些事件是在印度共（马）领导下精心拟定的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的全国性阴谋的一部分，印度共（马）并且利用它在邦政府的地位暗中破坏政府，以推进革命的目标。如富农政党，特别是孟加拉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统一社会党，以及国大党，都要求立即采取警察行动，在同有游击队活跃的村庄毗邻的地区成立了“抵抗委员会”。几天之内，有三名部族人被这些抵抗委员会的“防御行动”打死了。

纳萨尔巴里事件使印度共（马）的邦领导者们陷入困难境地。他们感到愤怒，一个小小的地方组织竟然采取反对党的革命战略的单方面行动。他们认为，纳萨尔巴里党组织的行动是反对众所周知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是本应该坚持这些准则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地方党组织企图绕过党的机构进行党内讨论，以求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于党的其余部分。

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于谴责这个由它的地方组织指导的穷苦部族人的运动，或宣布与之无关。

印度共(马)领导人采取的解决这个危机的公式如下：首先，党反对在纳萨尔巴里进一步采取警察行动，并谴责五月二十五日的警察暴行。印度共(马)通过它在政府的部长们，成功地禁止警察在谈判和进一步研究期间进入该地。其次，党决定不理睬纳萨尔巴里党组织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口号，而把整个运动解释为争取实现部族人的民主和经济权利要求的斗争。它宣称，把纳萨尔巴里看作一个法律和秩序问题，是错误的，并敦促政府研究纳萨尔巴里提出的同土地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有关的根本问题。第三，党同纳萨尔巴里党组织举行谈判，以图说服它放弃在领导者们看来是“冒险主义的路线”<sup>⑪</sup>。最后，领导人们通过刊物、小册子和党内讨论，发动了一场反对“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的宣传运动<sup>⑫</sup>。

邦农民运动领袖、当时负责土地税收的部长哈雷克里什纳·科纳尔，访问了纳萨尔巴里和西里古里，并同马宗达和桑亚尔谈了话。但他的使命失败了，因为他们两人都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在纳萨尔巴里以外的地区，他面临富农党的激烈的抗议运动，这些党派指控他同纳萨尔巴里串通一气。空气是紧张的，联合阵线政府处于分裂的边缘。中央政府和军队都在密切关注纳萨尔巴里发生的事情。

纳萨尔巴里领导人忠诚于中国党是广为人知的，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他们已同中国人有任何接触。印度共(马)仍然被人们称作亲华的党，即使在消息灵通人士中间，它同中国人的分歧也未多加宣传。尽管在几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中国党在印度

其（马）各级组织中都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热爱。纳萨尔巴里的党组织是毫不含糊地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印度共（马）领导人则期望中国人不会在它所认为的印度党内事务上支持一方<sup>⑬</sup>。

中国共产党在六月十日通过北京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了谴责印度共（马）领导人的消息，印度共（马）的领导人知道这消息时，很为震惊和怀疑。印度共（马）的一些领导人甚至认为不曾有过这种广播，这消息只不过是分裂党的印美宣传。另外的人把这消息解释为文化革命中刘少奇一派的声音，并不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意见。事实上，印度共（马）花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才出来发表一个对报界的声明，声明说：“北京广播电台报道的对纳萨尔巴里斗争的整个评价，和我们党所做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sup>⑭</sup>。

当中国共产党于七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印度的春雷》为题的社论时，中国共产党就使得任何人对它对纳萨尔巴里斗争的立场都没有怀疑了。社论开头就说<sup>⑮</sup>：

“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了。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一块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地区在印度诞生了。这是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发展。

几个月来，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打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枷锁，冲决了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印共革命派做得对，做得好！”

文章接着为印度革命制定了一个纲领。这个革命在性质上是

---

\* 原社论中，在“罗网”后，还有一句半话，约一百二十字，然后才接“印共”……。——译者注

农村的革命，农民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的武装斗争应最后包围城市和夺取政权。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别的道路，而武装斗争则应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

继社论之后，在各种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中严厉地攻击了印度共产党（他们是这样称呼印度共〔马〕的，至于印度共，则干脆被叫做“丹吉叛徒集团”），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还进行广播。各邦的联合阵线政府被斥为对人民的“骗局”，和加强现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权结构。印度共（马）的领导者也因为“出卖”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的特仑甘纳斗争而受到批评。印度的统治阶级被说成是由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援助和庇护的封建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这些文章和广播所表达的思想，在印度共（马列）于一九六九年成立时，都终于吸收到它的纲领里面去了<sup>①⑥</sup>。

中国对纳萨尔巴里的支持，自然对纳萨尔巴里的领导者们有极大的影响。他们的行动在中国党看来，是正确的，而中国党的意见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们现在期望，由于这种支持的结果，印度共（马）的相当数量的干部会离开母党，并同他们一起建立以武装斗争的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为基础的新党。同时，中国对纳萨尔巴里领导人的支持，也证实了印度政府的最大恐惧：中国正试图通过他们颠覆政府。

起义持续了五十二天。当联盟的第二大党孟加拉国大党的领袖、邦首席部长兼警察厅长阿乔伊·穆克吉把一支庞大的警察特遣队派到那里去时，起义就结束了。警察在几支边境保安部队的支持下，于七月十三日开进纳萨尔巴里，逮捕了大约二百五十名农民，用刺刀扎死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纳萨尔巴里的造反者没

有进行抵抗，一枪未发。卡努·桑亚尔（他是在三个月以后被捕的）在警察行动后不久在该地区的一次党的集会上哀伤地说：

“不论在斗争开始的时候党员自发地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到后来面对白色恐怖时，党员的作用就化为乌有了”<sup>①⑦</sup>。

起义的所有领袖，包括查鲁·马宗达和詹加尔·桑塔尔，不久都被捕了。他们在监狱里一直待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当时在期中选举之后，第二个联合阵线政府上台执政，政府的警察厅长左蒂·巴苏——印度共（马）的一位领导人——释放了同纳萨尔巴里事件有关的全部在押人员。

在这场为期两个月的斗争中，一共死了十八个人，其中九名妇女和儿童是在五月二十五日警察行动中被杀的，三名部族人被各“抵抗委员会”所杀，造反者杀死六人，其中一名是警官。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严重受害者是联合阵线政府本身。在七月五日的内阁会议上，首席部长被指控为违反不派遣警察力量到纳萨尔巴里去的协议和默许警察使用镇压性方法。很明显，在这个事件造成了激烈气氛之后，联合阵线政府的垮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阿乔伊·穆克吉现在正在寻求新的盟友，以组织另一个政府；他同国大党商定，他和他的支持者退出联合阵线，并在国大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他为那个场合（十月二日）起草的公开声明，就印度共（马）的“亲华”感情和策划推翻政府的阴谋，对该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sup>①⑧</sup>。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在广播中和文章中批评了印度共（马），印度共（马）仍然受到了这种种指责。许多反印度共（马）的领袖们当时确信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穆克吉的政变最后没有搞成，可是中央政府在十一月解散了他的内阁，在国大党的支持下，成立了由退出联合阵

线的人组成的新政府。

纳萨尔巴里起义在西里古里地区的支持者们于九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几天以后被捕的卡努·桑亚尔在这次会议上对这次斗争做了详细说明。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这个运动的成就和失败<sup>⑭</sup>。

他提到的成就是：（1）接收了非耕种者的土地，（2）销毁了一切法律文件，（3）宣布抵押和贷款字据无效，（4）没收了囤积的大米，（5）审判和处决了一些富农，（6）同样审判和处决了富农的“走狗”，（7）组织了用弓箭武装起来的小组，（8）接管了村庄的行政和学校，（9）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宣布现行法律和法院无效。

桑亚尔宣称，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参加了农民协会。雇农全心全意地支持运动，虽然小土地所有者并不是一致支持运动的。中农在开头犹疑一阵之后参加了运动，富有者在较大的封建分子逃离这个地区后也参加了。他宣称，附近茶园的工人参加了联合行动。发动斗争，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夺取政权。在他看来，形势是有利于武装斗争的，因为“敌人因危机和内讧而困难重重”。

桑亚尔也列举了运动的弱点：

（1）缺乏强有力的党组织，领导权掌握在未能抵抗警察进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手里。

（2）党没有完全依靠人民，有时还对群众采取主动减少损失的做法泼冷水。

（3）党的工作者对军事无知。运动依靠许多人的自发行动（例如袭击富农的住宅），但没有能够建立武装游击队来保护



“解放区”。

(4) 因为中农和富农的阻挠，党没有能够实行土地改革。

在印度当代政治史上，纳萨尔巴里事件，就其本身而论，应被看作不怎么重要的事件。从斗争持续的时间、抵抗的力量、自己遭受的伤亡或给对方造成的伤亡以及革命者控制的地区的面积等来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纳萨尔巴里起义都是一个小事件。且不说，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的特仑甘纳起义，即使在一九五九年的粮食运动中，加尔各答大约就死了一百五十人，直到军队开进街道以前，有好几天邦政府失去了对整个城市的控制。一九六六年的粮食运动也持续了好几个月，造成更多人的死亡，更加有效地造成邦政府陷于瘫痪。对比之下，如果没有对警察行动的禁令，纳萨尔巴里起义可能早就结束了。此外，当警察开进去时，没有人进行抵抗，运动涉及的地区小，双方总共只有十八个人死亡。

然而，由于几个原因，这次起义的重要性现在却远远超过了起义的规模和范围。第一，运动发动之时，正是首届联合阵线政府在西孟加拉执政的时候，而印度共（马）又是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结果，它得到了比它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得到的要大得多的注意和新闻报道。引起报刊注意的，倒不是起义本身，而是对纳萨尔巴里起义的猜疑，即以为它只不过是大规模武装起义的一个小小的开端。对于那些想要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许多派系的人以及那些想要利用它去搞垮联合阵线政府的人来说，纳萨尔巴里运动总是可以加以用的。

第二，这一事件加上它在报纸上得到的引人注目的宣传，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一个自发的群众高潮正在印度展开，而那是符

合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看了印度报刊有关土地纠纷、饥民抢粮库以及类似事件的报道，加强了他们的信念：革命就在眼前。中国人认为，阻止印度群众前进的是印度共（马）的“新修正主义”领导人。他们感到有责任谴责这些领导人，并鼓励人们退出该党，去组织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革命党”。这样，这一事件终于使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马）分道扬镳了。

第三，纳萨尔巴里成为印度农民武装起义和毛主义的标志，并导致以它的名字命名的新政治运动的诞生。

## 第二节 纳萨尔巴里以前印度 共产主义运动的梗概

印度共产党成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几乎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诞生了<sup>②</sup>。但是印度共成立不久，它的领导人就几乎全被英国政府关进了监狱。他们被控告犯了阴谋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罪，对他们进行了许多审讯，包括著名的“坎普尔阴谋案”和“密拉特阴谋案”。在四十年代初期，在印度共挺身而出公开支持苏联反法西斯侵略以后，党的领导人被释放了。国大党领导感到印度共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是一个威胁，便极力利用印度共的“人民战争”的口号，说它是印度共“忠于外国”的证据，控告共产党人同英国人——苏联在战争中的同盟者——合谋。共产党在当时是太弱小了，不能有效地反击这种宣传，有好几年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同时，同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不同，印度共产

党还被剥夺了支持民族解放和国际主义事业的机会。然而，到英国统治快结束的时候，共产党人参加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包括一九六四年皇家印度海军起义之后举行的民族主义示威，因而加强了他们在工人中的地位。在独立的时候，两个重要的群众组织——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印农民协会——的领导权，都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后不久，印度共错误地判断了人民的情绪，发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口号。除了特仑甘纳地区——这个地区的起义继续了几年，大约四千名党的干部丧失了生命（见下节）——，起义都被政府迅速扑灭了。这并不是政府的火力起了决定性作用。比政府的优势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的支持。党的力量主要在工会里，在几座城市和大市镇里。在乡村，总的说来，共产党人一般是不为人信任的，而且被看作苏联的代理人。对比之下，执政党在组织方面和追随者方面，都是有广泛基础的。

### **特仑甘纳起义：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

因为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再次成为重要的讨论题目，我们有必要就那场斗争的性质、范围和从中应吸取的教训说几句话<sup>②1</sup>。

特仑甘纳是一块包括九个县的地域，当时是海德拉巴士邦的一部分，这个土邦是由以巨量财富和庞大后宫闻名的尼札姆统治的。一九四六年特仑甘纳的农民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谷物税、强迫劳动、夺佃——开始进行斗争，但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反对尼札姆封建统治的起义。领导权从开始就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他们努力发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推翻尼札姆。除有拥有

一百英亩以上土地的封建地主外，农民阶级的各个阶层——包括富农——都被吸引到运动中去了。虽然付出了两千人的生命的沉重代价，运动在两年内便控制了大约三千个村庄，其影响则扩大到更多的村庄。一九四八年印度政府对海德拉巴进行干预，特仑甘纳运动以天文速度发展壮大，尼札姆在该地区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印度政府对于尼札姆在独立时决定不参加印度联邦一事是不愉快的，此外，据说政府对于由共产党人鼓动起来的斗争的巨大发展也感到不安，一九四八年九月政府对海德拉巴的军事进攻，同样受了这第二个因素的影响。印度政府接管海德拉巴，完全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它已经不再是一场反对为人痛恨的封建君主的战斗，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战斗。结果，很大一部分先前积极参加反对尼札姆起义的人，现在失去了兴趣。此外，同尼札姆的装备不良的、纪律松弛的、人数较小的私人军队相比，运动现在则面对一支武器良好、纪律较严、人数大得多的军队。

在印度接管之后，共产党人继续在特仑甘纳作战，但决定从平原撤退到森林区去，以避免同大占优势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在共产党正式取消这场斗争以前，战斗又拖延了三年，又有两千人丧生，约一万积极分子被捕（他们在监狱里蹲了三、四年）。

一九五二年该地区举行选举，共产党参加了竞选。选举结果表明，尽管起义失败了，共产党还是和过去一样受人拥护。在游击队力量比较强大的四个县——瓦朗加尔、坎曼、纳尔冈达和卡林纳加尔——，印度共赢得了它竞选的三十二个席位中的三十个，而国大党在竞选的四十一个席位中只得到四个。

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起义局限于特仑甘纳。虽然这四个

县的三百五十万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支持他们的事业，可是其余的三亿五千万印度人对运动的目标，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抱敌视态度。印度人民，总的说来在政治上是支持执政党的。他们很高兴国家现在已经独立，期望出现奇迹，愿意给国大党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当时，在全国范围，除了国大党外，没有可代替它的别的政党。只要印度的其余地方在政治上支持政府，政府就有可能动员一支大部队去对付装备不良的游击队。据说，当时部署在特仑甘纳的军事人员，比在克什米尔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军事人员还要多。

在当时特定的客观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下，运动是没有机会扩展到印度其余地方的。除了在安得拉邦的城镇里举行的反对当局镇压的学生罢课外，几乎没有什么支持游击队的行动。在特仑甘纳地区内，从军事上说，游击队不断丧失地盘。他们被赶出了平原，山林地区被军队包围了，军队对周围村庄的系统的彻底搜查，严重地妨碍了志愿人员和物资流向游击队。到一九五一年，运动已进入了死胡同。把运动继续下去是英勇的，然而是没有意义的。几个月之内，那些还留在森林里的人将被围捕。保护运动的成果和保持其堡垒，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取消斗争以前，特仑甘纳共产党人的一个代表团秘密地到莫斯科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据报道，苏联党和中国党都表示运动已无成功的希望，但他们建议印度共产党人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两党在赞扬特仑甘纳革命者的英雄行为的同时，批评了印度共没有认识到印度政府一九四八年干涉海德拉巴的意义。在这种干涉——它改变了运动的全部性质——之后，继续以武装行动的形式进行这场斗争是否明智，也成了印度共产党人热烈辩论的一

个题目。

这一运动将作为这个次大陆农民斗争史上的重要一章而为人们永远铭记在心。自一八五七年独立战争以来，在印度历史上，是没有什么事件可与它相比拟的。

从目前研究的观点来看，这场斗争的一个饶有兴趣的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特仑甘纳的领导者们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人民解放军的报道。根据阅读过的东西，他们相信印度革命应当遵循农民武装起义的“中国道路”，而不是得到农民阶级支持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城市武装起义的苏联样板。在历史上，他们是中国境外的第一批“毛主义者”。“中国道路”为当时印度共总书记巴·特·兰那地夫所反对，他甚至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除了斯大林（当时还活着）以外，他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他以后撤回了这个声明，但不到一年，钱·拉哲斯瓦尔·拉奥便取代他任总书记。拉奥是特仑甘纳斗争的领导人之一，该地区的另外两个领导人——普·孙达拉雅和马·巴萨瓦潘奈亚——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三个人现在在印度政治生活中都担任着重要职务：拉奥和孙达拉雅分别任印度共和印度共（马）的总书记，巴萨瓦潘奈亚则是印度共（马）的主要理论家和政治局委员。

到一九六七年，中国党才批评印度共产党人对特仑甘纳斗争的指导。那一年八月五日，中国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文章在详细介绍了特仑甘纳起义之后说：“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印度共产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对和破坏。他们首先毫无根据地指责它‘破坏统一战线’，然后攻击那些遵循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是鼓吹‘由农民来领导’的理论”<sup>②</sup>。在另外的

地方，中国的刊物攻击印度党“出卖”特伦甘纳革命<sup>②③</sup>。《解放》引用了兰那地夫任总书记时发表的声明，作为当时印度共全国领导人反华态度的证据。但这个批评没有注意到：在一九四八年印度政府进行干涉之后，继续举行起义的关键性决定，是在兰那地夫控制着党的时候作出的，而且尽管他在理论上反对武装斗争的某一种形式，但在当时他却是通过这种斗争夺取政权的主要发言人。此外，不论兰那地夫的看法如何，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和在他卸任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特伦甘纳斗争却照旧进行下去。事实上，在运动于一九五一年十月被取消以前一年多的时候，拉奥就接替了他的工作。虽然在运动结束前，阿约艾·高士已代替拉奥任总书记，但特伦甘纳的领袖们却是做出这一决定的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动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的，这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 **发展时期：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年**

在五十年代，印度共产党摆脱了在群众中的孤立处境，并且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它主动地在工人、中等阶级职员和学生中建立组织，参加他们的斗争。但是比这些局部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它试图发动各界人士参加就种种国内和国际问题而开展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该党在它影响较大的地区，同教派主义、种姓主义和语言沙文主义的斗争是特别成功的。尽管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持久地开展了反共产党运动，说共产党在印度传统和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它是赞成一种外国的思想的，可是到一九五九年，印度共却能够同很大一部分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在喀拉拉、西孟加拉和安得拉。在这段时期结束前，人们普遍承认，这个党能够使许多城镇的管理陷于瘫痪，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人

出来支持他们的总罢工号召。这个党的主要弱点，是它没有进入大部分农村，而在那里却居住着印度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此外，参加该党群众集会的人数虽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使人产生误解。执政党和其它大党在比较不先进的那部分居民中有较牢固的基础，这部分居民还需要政治化，他们从不大量参加他们支持的政党的政治集会。共产党则在那些有政治觉悟的人中间有较大的影响。但在许多地区和邦里，例如北方邦、中央邦、拉贾斯坦、古吉拉特、奥里萨等，共产党几乎不存在。

共产党的最惊人的成就是在喀拉拉取得的，一九五七年它在该邦邦议会中赢得了绝对多数并组织了政府。它的统治持续了二十七个月，由于总统的命令而告结束，总统下令的理由是该邦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崩溃了。在共产党力量强大的另一个邦——西孟加拉，共产党人在几个左翼政党的统一战线的保护下，在五十年代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斗争（在缺粮、物价和其他问题上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喀拉拉的共产党政府被解散以后，共产党在西孟加拉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粮食运动，运动引起了同警察的激烈对抗，造成一百五十人死亡。共产党人在其他邦也取得了进展，只是各地进展速度不一，然而在安得拉，党的力量实际上却在下降。在旁遮普，共产党领导了农民争取减税的一次斗争。在孟买，共产党是为争取把该邦按语言改组为两个邦——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的联盟的一个主要成员。在马德拉斯的一些地方，共产党在雇农和贫农中间发展了一个根据地。在印度全国，支持共产党的选民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九。



在五十年代，与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增长的同时，党的组织却陷入派系斗争<sup>②4</sup>。两个主要派别发生分歧，是由于他们对执政党及其政府持有相互抵触的态度。多数派（被称为“右派”）认为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是最重要的矛盾，并且支持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当时印度政府反对军事条约，在诸如苏伊士运河、印度支那等几个问题上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坚定和有效的立场。以后，这种支持扩大到它的计划和工业化等国内政策。在这一派看来，印度统治阶级代表进步的、民族的、反帝的资产阶级。这一派把反对国大党外部的反动派（例如由人民同盟所代表的力量）和垄断组织在国大党内部的影响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它的口号是建立包括国大党内进步分子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的、基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去反对由人民同盟、自由党和一部分国大党员所代表的日趋右倾反动的教派和封建势力。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它认为党在喀拉拉选举的成功，证实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理论。

少数派（被称为左派）驳斥了认为印度统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中进步阶层的观点。它问道，在国大党里谁是进步分子，人们怎样识别他？它批判同国大党实行民主团结的口号，称之为“阶级合作”的路线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派承认当时印度外交政策的进步方面，同时又细心地指出，这种政策是符合同封建分子勾结起来控制这个国家的印度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这一派赞成积极有力地反对国大党的政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这一派并不完全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考虑到历史的经验和印度政权的暴力性质，对这种可能性又表示怀疑。

这只是两派观点的一个粗略的概括。在一派之内，各领导人

的解释和强调之点也有所不同，而且也并不是该党的所有党员都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在他们对待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上。这一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尽管召开了全国执行机构的多次会议和几次代表大会，两派仍不能在共同纲领上取得一致意见。结果，每个党员虽然都一致认为一九五一年的纲领已经过时，但不能用一个新的纲领代替它。直到一九六四年分裂以后，每一派才起草了自己的纲领。

在这里有关系的，是指出世界上的两大共产党——苏共和中共——当时都曾劝告印度共产党人在主要问题上同印度政府协调一致地工作。两个党都把印度看作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 分裂和印度共（马）的成立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中印边界纠纷公之于众的时候，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日益增长的时期便结束了。这一纠纷导致了一九六二年短暂的边界战争，以及实行紧急法令和暂停公民基本权利。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被猜疑为具有“亲华感情”的人）被拘押在监狱里，对左翼运动的支持暂时中断了。人民转而支持政府，左翼工会和群众运动实际上停滞不前。

比政府的镇压政策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队伍的不团结。右派声明全力支持政府进行战争，甚至走到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地步。左派则拒绝参与战争努力，公开表示怀疑印度政府关于边界纠纷的解释，因而成了报刊和政府攻击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四月，即左派的成员从监狱放出来以后不久，共产党正式分裂为印度共和印度共（马）。新党——印度共（马）

——的领袖们，在建党会议之后再次被捕，党的组织实际上被迫转入地下。但是一九六五年，在喀拉拉的期中选举中，印度共（马）成为最大的政党，在有一百三十三席位的邦议会中得到了四十个席位，而且获胜的候选人中有二十八人实际上是在监狱里参加竞选的（他们是作为“叛国者”而被拘禁在监狱里的）。经过了七年的沉寂，一九六六年在西孟加拉也爆发了一系列巨大的群众运动。同中国的边界纠纷，已不再是一个最为人关切的问题了，从经济方面说，六十年代头五年是这个国家当代历史上最坏的年份。

### 一九六七年选举和联合阵线

一九六七年大选标志着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因为执政党在半数的邦里被击败了。在大多数邦里，右翼政党和持不同意见的国大党人的组织靠削弱执政党而增加了自己的力量；而在喀拉拉和西孟加拉，左翼力量却胜利了。在选举后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印度共（马）在两个邦里都单独地构成最大的政治集团。在喀拉拉，它在有一百三十三席位的邦议会中占有五十三个席位。而在西孟加拉，同联合政府中的其它政党相比，它的地位并不是那么强大的。在有二百八十个席位的邦议会里，各党所占席位如下：国大党一百二十七席，印度共（马）四十三席，孟加拉国大党三十四席，印度共十六席，前进同盟（一个地区性的政党）十三席，统一社会党七席，人民社会党七席，人民同盟一席，自由党一席，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人士三十一席。因此，在喀拉拉，首席部长埃·马·森·南布迪里巴德是印度共（马）提名的人，而在西孟加拉，阿乔伊·穆克吉担任了首席部长，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左蒂·巴苏则任副首席部长。西孟加拉的由十七人组成的内

阁中，有四人是印度共（马）党员。

两个联合政府，没有一个干完五年任期。喀拉拉联合阵线，由于印度共和印度共（马）的不断磨擦，于一九六九年垮台。当时以印度共的喀拉拉邦领导人阿基塔·梅农为首席部长的新政府成立了，并得到国大党的支持。在西孟加拉，联合阵线政府甚至还未干满一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就被总统的命令拉下了马。取代联合阵线政府的、受到国大党支持的政府，五个月之后也垮台了。但在一九六九年期中选举，另一个联合阵线政府以对党大党较大的多数上台执政。邦议会席位的分配如下：印度共（马）八十席，国大党五十五席，孟加拉大会党三十三席，印度共三十席，前进同盟二十一席，统一社会党九席，人民社会党五席，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人士四十七席。联合阵线的总席位是二百一十八席。同第一届联合阵线政府一样，阿乔伊·穆克吉任首席部长，左蒂·巴苏是他的副手，但后者现在负责管理警察，印度共（马）同它的伙伴相比要强大得多。

第二个联合政府维持了大约一年。在这期间，接收了封建分子和富农的大约三十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的人。联盟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冲突。穆克吉由于对这场土地斗争十分震怒而辞职了。从一九七〇年三月起，再次对该邦实行总统治理一年。在一九七一年的期中选举中，印度共（马）在一定程度上是单独竞选的，只得到几个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支持，但竟然把它在邦议会的席位增加到一百一十一席（如果把它的伙伴得到的席位加上，则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席）；国大党的席位也增加到一百零五席，其它政党则损失惨重。选举后上台执政、由国大党领导、得到印度共支持的联合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随后又一次实行了

总统统治。在一九七二年的选举中，国大党以巨大的多数——在二百八十个席位的议会中占二百一十八席——重新上台，但是人们广泛传说国大党在选举中使用了控制、恐吓和恐怖手段。

### 印度共（马）和中国

一九六四年分裂以后，印度共一般地被认为是一个亲苏的党，印度共（马）是一个亲华的党。诚然，印度共（马）反对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九六二年同中国的边界战争之后，它的领导成员便被拘禁起来了。但是，在其它问题上，例如在中苏意识形态辩论和对印度形势的估量等问题上，新党是远非亲华的。在意识形态上，一九六七年以前印度共（马）一直未表态，那一年它才第一次公开阐明了它对种种问题的看法，虽然从它诞生的时候起，这些问题就已在各级讨论过<sup>②⑤</sup>。在一九六七年关于意识形态的文件中，印度共（马）在许多问题上站在中国党一方，但它对苏联党的谴责，却没有走到称该党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或者否认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地步。它批评中国同苏联采取“一致行动”去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以后的年代里，在诸如“个人崇拜”或在党章明白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等问题上，印度共（马）也表示了不同于中国立场的意见。

在印度问题上，从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印度共（马）的纲领草案曾送给世界各个共产党，据了解，中国党对于纲领中的整套提法都表示不同意<sup>②⑥</sup>。但是，中国人当时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尽管有这些分歧，中国党和印度共（马）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切的。直到纳萨尔巴里起义，两个党才分道扬镳。

### 第三节 第三个共产党的诞生

纳萨尔巴里运动是一九六七年在西孟加拉开始的，在那一年，国大党在第四次大选中失败了。经过了兩届联合阵线政府、兩届国大党支持的联合政府、三次总统统治以及大量流血牺牲之后，国大党在一九七二年以绝对多数重新上台执政。就在这一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在其缔造者查鲁·马宗达死后实际上就结束了。纳萨尔巴里运动这多事的五年，可以分为五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纳萨尔巴里运动起义本身。第二阶段从起义瓦解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印度共（马列）——第三个共产党——成立的时候。第三个阶段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参加几次农村起义的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得拉邦斯里卡库兰县的起义。这时期纳萨尔巴里分子政策的重大特点，是把“歼灭阶级敌人”作为武装斗争的“唯一策略”。第四阶段是在运动转入城市地区和加尔各答成为活动中心之后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的。在加尔各答，运动首先采取了包括进攻教育机构的“文化革命”的形式，但不久以后就在城市里贯彻歼灭的策略。第五阶段开始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它标志着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结束。在这一阶段，政府和忠于执政党的反社会分子，通过一系列武装行动，歼灭或监禁了运动骨干，把游离分子争取过去。

第二阶段即本节所讨论的主题的特点是建党活动。这个阶段始于中国共产党向“印度共（马）内的革命派”祝贺他们在农民中传播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国党也发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革命党” \* 的号召<sup>(27)</sup>。

但是，正象下面按邦说明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力量还不足以立即建立一个政党。纳萨尔巴里起义和中国党对它表示支持以后不久，印度各地出现了许多派纳萨尔巴里分子。这些派别在忠于毛主席的思想和反对印度共（马）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许多策略问题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意见分歧。

西孟加拉。在纳萨尔巴里（起义）的时候，西孟加拉邦的那一派人数是很少的。印度共（马）的广大党员都不熟悉它的领导人。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因为在该党邦委中担任职务又是党刊的编辑之一，是这一派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人物。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前，在西孟加拉西里古里地区以外，查鲁·马宗达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其他的纳萨尔巴里领导人，如卡努·桑亚尔、詹加尔·桑塔尔、科康·马宗达都是在下面工作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后，两个知名的工会工作者——邦电力局的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和人寿保险公司的阿希特·森——参加了这一派，但不到两年，在印度共（马列）成立的时候，他们又退出了。除了一两个地区外，没有发生印度共（马）党员大批退党转到新运动方面去的情况。一贯支持印度共（马）的领域（诸如工会、农会和中等阶级职员的组织）未受纳萨尔巴里的影响。虽然许多人预言印度共（马）会中途分裂——中国党和纳萨尔巴里分子都希望它的大多数普通党员会参加新运动——，但他们的希望没有实现。

---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印度的春雷》一文中并无此话。——译者注

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能够象他们希望的那样从印度共（马）的干部中得到支持，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几个人的支持，这几个人几年来一直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围。他们中间有：尤特帕尔·杜塔（加尔各答戏剧界的著名剧作家、演员和导演）；普罗莫德·森古普塔（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在德国，回到印度后成为分裂前的印度共的亲密同情者）；阿米亚·查克拉瓦蒂（加尔各答一个学院的负责人）；萨蒂亚南达·巴塔查里亚（加尔各答市议会议员）。这些人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也没有什么追随者，然而是在加尔各答政界的知名人士。虽然在他们还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时候，他们为纳萨尔巴里事业而参加了宣传工作，但他们当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时间都不长。其中，普罗莫德·森古普塔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成立了一个单独的毛主义派别，阿米亚·查克拉瓦蒂于几个月后退出政治生活，萨蒂亚南达·巴塔查里亚则被纳萨尔巴里分子除名。尤特帕尔·杜塔，这个在当时由于对邦戏剧运动的贡献而最为人熟知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初就离开了政界，在国大党支持的首席部长普拉富拉·钱德拉·高士博士（他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统治西孟加拉四个月）把他逮捕和监禁起来之后，他被迫在许诺表现良好的保证书上签字，重新回到剧院去了。当时，根据合同，杜塔将在詹姆斯·埃沃里导演的一部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为了保住合同，他极其想出狱。

但是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开始时期，对运动帮助最大的是加尔各答的主要大学——大管区学院的学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他们对政治活动都没有表现什么兴趣。那一年，对于不能令人满意的学院宿舍管理方式表示反对的抗议性罢课，在几名学生被停学



或开除的时候，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大管区学院的学生和印度共（马）的学运工作者更加接近了。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物是一个名叫阿希姆·查特吉的大学生，他对纳萨尔巴里运动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间的成长起了主要作用。纳萨尔巴里起义后不久，查特吉和支持他的大学生就参加了在加尔各答成立的支持那个斗争的几个派别。

喀拉拉。在喀拉拉——印度共（马）有大批追随者的另一个邦，纳萨尔巴里运动没有能够取得大的进展。印度共（马）的邦议会会员K·P·R·高普兰退出印度共（马），并成立了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小组，但该派只能吸引不多的几个人参加它的行列。同安得拉和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他们辞去当选的职务——不同，高普兰保持他在邦议会的议员职位直到一九七〇年期中选举被击败为止。从组织上说，他参加了纳萨尔巴里分子中的纳吉·雷迪派（见后）<sup>⑳</sup>。但是比他的这一派更为重要的，是出现在喀拉拉的分别由库尼卡尔·纳拉亚南和科萨拉·拉姆达斯领导的两个对立的派别<sup>㉑</sup>。后者是喀拉拉首府特里凡得琅的前市长和邦议会议员。

从一开始，库尼卡尔派就对西孟加拉和安得拉的主要纳萨尔巴里分子各派保持其独立性。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这一派参加了土匪抢劫，并进攻两个警察所：蒂鲁切利（十一月二十二日）和普尔帕利（十一月二十四日）。对第一个警察所的进攻，是由库尼卡尔亲自率领的；对另一警察所的进攻，是由他的爱穿军装的女儿阿吉塔指挥的。两次袭击均告惨败，在一名无线电报报务员被打死、三名警察被打伤以后，参加两次袭击的一百五十多人全部被捕，该派的炸弹专家死亡<sup>㉒</sup>。库尼卡尔两周以后向警察投

降，因为他脱离了同志，没有钱又挨饿<sup>①</sup>。据报纸报道，阿吉塔在给警察的声明中说，参加袭击普尔帕里警察所的人们，从坎曼走了三天，穿过密林到普尔帕里。袭击者不知道进攻警察所的计划，只是当他们已接近目标时，才第一次把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被警告说：逃跑者当立即枪毙。但是，在警察反击的时候，袭击者几乎没有进行抵抗。据阿吉塔说，他们许多人只是对于分到一份掳掠品有兴趣<sup>②</sup>。

北方邦、比哈尔、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在印度共（马）先前不那么强大的地区，纳萨尔巴里分子取得的成功要大些。在北方邦，印度共（马）邦委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希夫·库马尔·米斯拉参加了纳萨尔巴里派，并带过去相当大一部分——约一半——党员<sup>③</sup>。米斯拉先参加查鲁·马宗达派，随后在印度共（马列）成立时参加了该党，但在快到一九七〇年底时，他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同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sup>④</sup>。在旁遮普，虽然印度共（马）党员总人数只降低了百分之二，但在学生和其他青年中却有大批人退出该党<sup>⑤</sup>。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也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共（马）党员转移到纳萨尔巴里分子那边去。他们的领导人拉姆·皮阿尔·萨拉夫是该邦的一位形象高大的政界人物。他在同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决裂后，当G·M·萨迪克（后来任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成立了克什米尔民主会议党时担任了该会议的总书记。萨拉夫是印度共（马）查谟和克什米尔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些人退出印度共（马），导致了该邦印度共（马）组织的实际瓦解<sup>⑥</sup>。那里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很快就分裂为两派，一派由萨拉夫领导，另一派由萨拉夫先前的副手K·D·西蒂领导。萨拉夫派终于得到印度共（马列）的承认，但未

能产生什么影响，萨拉夫本人不久被捕。在比哈尔，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成立了一个派别，辛格是印度共（马）中央委员会委员，比哈尔工业地带的一位老工会工作者。但是象北方邦的组织一样，它在一九七〇年退出了印度共（马列）<sup>③7</sup>。

安得拉。就退出印度共（马）的人数说，纳萨尔巴里运动在安得拉邦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功。党的邦组织的好几位领导人长期以来就不满意党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在西孟加拉的同伴，纳吉·雷迪、C·文卡特斯瓦尔·拉奥、普拉·雷迪和其他人，在党内都是重要人物，有大批追随者。此外，就党员人数说，安得拉的党组织同喀拉拉和西孟加拉的党组织地位相等。

但是，安得拉的持不同意见者很长时间以后才离开印度共（马）。他们有些人，特别是斯里卡库兰党组织的党员们，赞成迅速同母党决裂，而其他人，主要是邦的领导人则有保留，理由是作出这种决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纳吉·雷迪认为，持不同意见的人推迟作出决定，就能够把更多的印度共（马）党员争取到他们那边去。安得拉的持不同意见者同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虽然两者都明确支持中国党，但安得拉的持不同意见者某些领导人（如普拉·雷迪）在对印度形势的解释上，则与中国党持不同的看法<sup>③8</sup>。

安得拉的持不同意见者继续在印度共（马）内部进行斗争，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布德万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印度共（马）大加谴责，并对中国党表示支持；但同时它在许多方面却不同于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立场<sup>③9</sup>。全会后不久，他们就离开了母党。根据印度共（马）的估计，该党一万六千名党员中有三千人参加了纳萨尔巴

里派，另外四千人则摇摆不定。他们的人数，使他们很容易地成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最大组织(40)。

### 协调委员会

那些自认为是“纳萨尔巴里道路”追随者的人，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会，在印度共(马)内成立了革命派的一个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号召建立由毛主席思想指导的马列主义党。虽然会议宣传立即进行武装革命，会议不是秘密举行的(41)。然而该委员会并没有立即从事建党工作。它宣称，“不是为了建党而建党，建党是为了完成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这一悲惨的现实：只有通过尖锐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真正的革命政党才能诞生和成长”。它接着说：“甚至意识形态斗争，如果脱离了革命的阶级斗争，便完全不成其为斗争(42)。

一九六八年五月，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成立，它在一项宣言中要求信仰武装斗争的革命派为建立毛主义政党的目标而团结起来(43)。这个党将在毛主义付诸实践之后建立起来。它还声称：“这样的党将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而且同时是人民的武装力量和人民的政权”(44)。同时协调委员会提出了“打倒选举”的口号，要求人民抵制议会政治(45)。

从这些言论可以明白看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导人反对仓促成立第三个共产党。那时，纳萨尔巴里运动只不过是一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具有同样思想的个人而已。他们在反对印度共(马)和忠于中国党方面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策略问题上，诸如对群众运动、选举和经济斗争应采取的态度，他们之间又有分歧。这些领导人不愿因为强行建立集中的组织机构而冒运动分化瓦解的风险。在喀拉拉已有三派，在克什米尔有两派。虽然，所有安得拉

的纳萨尔巴里分子都团结在全印协调委员会的邦委员会之下，但是斯里卡库兰的组织则同全国性领导机构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并且不相信纳吉·雷迪领导下的邦领导。在西孟加拉，纳萨尔巴里分子之间也有分歧。在开始阶段，一种松散的结构——各派在这种结构中都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还有这种严重危险：基层的纳萨尔巴里分子不会喜欢一个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领导<sup>④6</sup>。采取匆促的行动去建立一个政党——这也意味着成立一个拥有处分权的领导机构——，可能被看作领导人贪权的证据。

### 印度共（马列）的诞生

全印协调委员会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八日的会议上，发出了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号召。它在宣言中说：“由于拒绝承认必须在党内进行的斗争，结果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产生了唯心主义偏向。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清洗了一切机会主义倾向、不良倾向和不受欢迎的分子以后，才应该建党的思想，只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构想出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斗争的党，即设想一个纯粹的、完美无缺的党，只不过是沉溺于唯心主义的狂想曲”<sup>④7</sup>。同时，全印协调委员会决定开除反对建党的安得拉邦组织。

人们或许要问，全印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为什么一反其先前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决定采取匆促的步骤建党呢？理由之一或许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以后要遵循的那条策略路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就不能加以贯彻。查鲁·马宗达曾说：“全印协调委员会自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完善武器，因为协调委员会只能按民主原则进行工作，不要求任何程度的集中制，因此不能够唤起革命派的纪律感”<sup>④8</sup>。但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国党想要

这样的—个党成立起来。查鲁·马宗达引用了毛的话，“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来为他们建党政策辩护。他还提到，“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领导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建党的重要性的缘故。”查鲁·马宗达满怀信心地预言，党成立以后，会立即得到中国的承认<sup>(49)</sup>。

党于四月二十二日成立，预期的中国党的承认很快就来了。中国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印度共（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党的名称——的政治决议，并通过北京广播电台欢迎它的成立<sup>(50)</sup>。其他派别，象纳吉·雷迪领导的那一派，既未得到承认，也未受到广播电台的谴责。

从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的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同印度共（马）分裂后那么就决定成立第三个共产党，是不为协调委员会的大多数追随者欢迎的。卡努·桑亚尔五月一日在加尔各答群众大会上宣布新党成立的同时说，那些说通过斗争建党的人，是沉溺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sup>(51)</sup>，虽然这正是协调委员会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就建党问题做出的决定。许多派别不愿参加新党，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印度共（马列）激烈地攻击了他们，它声称：“今天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它们嘴上高喊忠于毛主席思想，甚至忠于纳萨尔巴里。党认为，这些派别中的许多人代表了革命运动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宣扬‘在现阶段出现派别的历史必然性’，‘自下而上地建党’和其它反马列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力图靠自发性实现建党任务，并且蓄意阻挠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sup>(52)</sup>。甚至在那些选择暂时留在印度共（马列）党内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怀疑建立一个新党的明智性。为了警告那些人，印度共（马

列) 声称: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我们的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反修斗争就将继续下去。修正主义将以各种伪装出现, 并力图夺取党的领导权”<sup>(53)</sup>。

邦电力局雇员工会总书记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退出了, 并成立邦一级的对抗性的协调委员会。他在一个文件中批评印度共(马列) 忽视城市, 拒绝参加工会, 无视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众组织的任务。这个文件也攻击印度共(马列) 的游击战争方法是“格瓦拉主义”<sup>(54)</sup>。另一个重要领导人阿希特·森——他曾主持宣布新党成立的加尔各答群众大会——, 最后也脱离了印度共(马列), 并且成立一个名叫毛主义共产党人中心的新组织。他对印度共(马列) 的批评, 同达斯·古普塔的批评相似。他对一九六九年四月后正式发动的“歼灭阶级敌人运动”表示谴责<sup>(55)</sup>。

印度共(马列) 得到全印协调委员会北方邦、比哈尔邦邦委的支持, 得到阿萨姆、特里普拉、查谟和克什米尔等邦委的支持, 还得到安得拉的斯里卡库兰县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 纳吉·雷迪派则得到喀拉拉K.P.R. 高普兰派的支持, 以及马哈拉施特拉的组织的支持。就党员人数说, 纳吉·雷迪派依旧是两个毛主义派别中较大的一个, 但是在雷迪被捕后, 这一派的发展便受到了限制。

对于这一派——以后被称作安得拉邦革命共产党委员会——为什么被开除出协调委员会, 有好几种解释。一个近因是纳吉·雷迪关于袭击喀拉拉警察所的公开声明, 他在这个声明中说这些袭击是“冒险主义的”, 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中央政府出钱的<sup>(56)</sup>。然而, 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则认为, 一切起义——包括这些袭击——的矛头都是指向政府的, 都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组

成部分<sup>57</sup>。虽然他们对于库尼卡尔·纳拉亚南作为一个革命派的资格不敢肯定，但他们决定不去管这一点，因为“详尽地分析领导人的作用，无助于〔革命的〕任务反而会加强反动派的力量”<sup>58</sup>，他们对于喀拉拉袭击的看法和中共的意见相同，而雷迪的看法则是同中共对立的。因为雷迪没有撤回他关于袭击的声明，印度共（马列）认为这无异于对抗马列主义运动的国际（即中国的）领导<sup>59</sup>。另一个原因是：雷迪反对在同印度共（马）分裂后不久在四月成立印度共（马列）。他还强烈反对印度共（马列）纲领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并反对对印度形势的分析<sup>60</sup>。

在运动的这个阶段，纳萨尔巴里分子主要忙于宣传和建立他们的组织。印度联合新闻社在一九六八年末发表的一项调查说，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多半限于写标语和出版党报、党刊，人们并不担心马上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一九五九年开始的斯里卡库兰斗争，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一直是以集会、罢工等传统形式进行的；此后，那里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参加了对地主住宅的几次袭击，抢劫财物后离去。纳萨尔巴里、拉金普尔和德布拉的活动也只限于经济斗争。



## 注 释

- ①参看卡努·桑亚尔：《关于特莱地区农民斗争的报告》，《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马·巴萨瓦潘奈亚：《我们党关于纳萨尔巴里的立场》，《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大吉岭农民的武装斗争》；《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纳萨尔巴里提出的问题》。
- ②德什拉杰·查达：《印度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五年；并参看：印度共（马），《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立场》，一九六九年。
- ③《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 ④《甘露市场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 ⑤印度政府内政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对议会的声明：《亲北京共产党人的反民族活动及其进行颠覆和暴乱的准备》。
- ⑥这次旅行的组织者之一是赛巴尔·米特拉，他是这时期的一名学生领袖，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在一九六七年被开除出印度共（马）。印度共（马）对于没有更早地把他开除出党所提出的理由是：为调查此事件而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该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都被捕了。赛巴尔·米特拉终于脱离了纳萨尔巴里活动，当了一所学院的讲师。人们在公开场合看见他的最近的一次，是他参加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的送葬的时候。
- ⑦巴·特·兰那地夫：《反对反党倾向》，从一九六七年七月

二日到同年八月十日分六次在《人民民主》发表。

⑧同上。

⑨参看桑亚尔：前引文。

⑩同上。

⑪参看《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⑫参看兰那地夫：前引文；

巴萨瓦潘奈亚：前引文。

⑬印度共（马），《我党同中共在纲领和政策的某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析意见》，一九六七年。

⑭《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⑮《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⑯参看第五章。

⑰桑亚尔：前引文。

⑱详情见这一时期（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五日）的《政治家报》和加尔各答的其它日报。

⑲桑亚尔：前引文。

⑳详见穆札法尔·艾哈默德：《我自己和印度共产党》；莫汉·拉姆：《印度的共产主义，分裂中的分裂》；G·阿迪卡利：《历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杂录》，第二卷。

㉑根据同特仑甘纳起义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讨论写成。还可参看普·孙达拉雅：《特仑甘纳的人民斗争及其教训》，加尔各答，一九一三年；《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大吉岭的印度革命派高举武装斗争的火炬》），这篇电讯表达了中国对于斗争的看法。

㉒《新华社英文电讯》，前引文。

㉓《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印度农民起来了》。

- ②④参看阿约艾·高士：《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新世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印度共，《政治决议》，一九五四年；印度共《第五次座谈会》，一九五五年（党内文件）；《新世纪》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新托洛茨基分子必须开除出党》；印度共（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一九六五年。
- ②⑤印度共（马），《意识形态辩论总结》，一九六八年；印度共（马），《中央委员会为意识形态讨论准备的草案》，一九六七年。
- ②⑥参看第七章。
- ②⑦《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 ②⑧《政治家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度快报》，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 ②⑨《印度时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
- ③⑩《政治家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先驱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③⑪《爱国者》，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政治家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
- ③⑫《政治家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
- ③⑬印度共（马）《政治——组织报告》，一九六九年。
- ③⑭《印度时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
- ③⑮印度共（马），《政治——组织报告》，一九六九年。
- ③⑯同上。并参看《印度快报》，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③⑰《印度时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爱国者》，十二月八日；《国民先驱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③⑱《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关于斯里卡库兰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解放》一九六九年十月，《纳吉·雷迪的政治》，《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 ③⑨ 印度共（马），《致安得拉同志们的信》，一九六八年。
- ④⑩ 印度共（马），《政治——组织报告》，一九六九年。
- ④⑪ 《解放》，一九六八年五月。
- ④⑫ 同上。
- ④⑬ 《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宣言》，《解放》，一九六八年六月。
- ④⑭ 查鲁·马宗达：《印度人民民主革命》，《解放》，一九六八年六月。
- ④⑮ 《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决议》，《解放》，一九六八年六月。
- ④⑯ 《印度共（马）革命派协调委员会——它的性质和目的》，《解放》，一九六八年五月。
- ④⑰ 《是建党的时候了》，《解放》，一九六九年三月。
- ④⑱ 查鲁·马宗达：《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现在建党？》，《解放》，一九六九年三月。
- ④⑲ 同上。
- ⑤⑰ 《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
- ⑤⑱ 马利卡米纳·拉奥，《印度的毛主义——两个派别》，《新地》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周年号）
- ⑤⑲ 《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
- ⑤⑳ 同上。
- ⑤⑳ 《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
- ⑤⑲ 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土地革命》，《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 ⑤⑲ 《爱国者》，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 ⑤⑲ 《解放》，一九六八年一月。
- ⑤⑲ 同上。
- ⑤⑲ 《甘露市场报》，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 ⑥⑰ 参看马利卡米纳·拉奥：前引文。

## 第二章

# 納薩尔巴里分子在农村地区的 武装斗争和歼灭运动

纳萨尔巴里运动历史的第三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是从纳萨尔巴里分子转移到农村并企图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时开始的。在第一节中我从讨论歼灭理论开始，毫无疑问，这是这些造反行动的最重要的特点。在第二节中我要论述斯里卡库兰的起义，在那里，歼灭理论首次和最认真地得到贯彻执行。第三节谈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穆沙哈里和拉金普尔—凯里等地的起义。第四节试图对这些起义作一点评价。我略去了比尔布姆的起义（该地的起义在一九七一年西孟加拉大选之后坚持了三个月），部分地是因为它包含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同时也由于搞不清这次起义——是谁组织和怎样组织的，更重要的是不清楚它是怎么垮的。这里只是着重谈谈纳萨尔巴里分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些地方那怕是很短时间的控制——的那些起义。因此，搞了约七十次歼灭的旁遮普和在纳萨尔巴里分子支持下偶然搞了几次谋杀的比哈尔都没有包括在这个研究之内。

在讨论歼灭运动之先，有必要概括一下纳萨尔巴里分子关于武装斗争的观点。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如下：

- 1、国大党政府是代表印度封建王公、大地主和官仔买办资

本家的利益的。印度的经济是半封建经济，统治阶级本身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两种外来势力手中的工具。在所有矛盾中，封建势力同印度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2、除了武装斗争外是别无选择的。“只有依靠暴力革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拯救印度，才能取得印度人民的彻底解放”①。其他活动方式如政治宣传、建立群众组织和参加争取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等，都是修正主义的，不应采用。同样，各种代议机构——从议会到村评议会——都应抛弃，甚至从策略上考虑也不应加以利用。

3、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是极为有利的。人民都不支持政府，政府只是靠军事力量维持其统治，印度人民都准备起来革命。革命的火星一燃，就会象森林的大火迅速烧遍全国。

4、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农民内部，目的是要使贫农和无地农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时也要争取中农和一部分富农。

5、革命者将创建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根据地，他们“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这样，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②。类似的声明也写进了印度共产党（马列）的纲领。

6、在游击战争的初级阶段将通过游击活动歼灭阶级敌人。歼灭运动将导致红色根据地的建立，有了红色根据地，游击队就能在根据地自由活动，人民也会挺身而出支援游击队。在一个较晚的阶段，解放军将作为歼灭运动的最终产物而建立起来。

7、在印度，革命运动的领导要服从国际领导（指中国

党)。要鼓励游击队员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在印度农民中宣传毛泽东思想。

## 第一节 歼灭运动

### 目 的

歼灭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粉碎农村封建权力而代之以农民的权力。党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就不能不打击并歼灭农村的地主个人<sup>③</sup>。“歼灭阶级敌人并不仅仅意味着消灭个人，并且还意味着消灭阶级敌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查鲁·马宗达在一篇文章中就是这样说明歼灭运动的。他又说：“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级形式，而通过游击活动歼灭阶级敌人的行动则是游击斗争的初级阶段”<sup>④</sup>。

第二个目的与前者有密切联系，是制造“红色恐怖”，以对抗封建势力的“白色恐怖”。“我们的政治的实质在于歼灭阶级敌人，而不是损害或打击他们以便把他们赶跑，只有歼灭敌人才能破坏敌人的士气”<sup>⑤</sup>。这些谋杀——加上这些杀害中以及后来活动中所采取的残忍方法——可望在封建分子中引起恐惧气氛和制造惊恐情绪<sup>⑥</sup>。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某些封建分子被杀了，很多人因害怕而离开村子，而那些没有走的则赶紧学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术语，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者”<sup>⑦</sup>。由于缺少人民的合作，警察也不容易查到纳萨尔巴里分子，因为村子里谁也不想触犯纳萨尔巴里分子。甚至被纳萨尔巴里分子处决的人的妻子和儿子也不向警察报案和请求援助<sup>⑧</sup>。查鲁·马宗达总结的建立“解放区”的主要好处之一是：

“一旦一个地区从阶级敌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些阶级敌人被消灭了，另一些逃跑了），国家镇压机器就失去了耳目，警察就不可能知道谁是游击队员，谁不是游击队员，谁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谁是耕种地主的土地”⑨。

第三、通过这个运动，马宗达指望农村群众中贫苦的那部分人站出来并且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他说：“因为他们（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的阶级仇恨远不如贫苦农民的阶级仇恨强烈；只有通过歼灭阶级敌人的运动，贫农和无地农民才能够建立他们对于全体农民群众的领导”⑩。也有的报道说，有好几次，当歼灭活动发动后，中等阶级的活动分子提出了疑问并退出了运动⑪。不管这是否符合事实，《解放》月刊上大部分关于谋杀的报道都强调指出，这种谋杀完全是由贫农和无地农民计划和执行的。但是领导也向小资产阶级积极分子下达组织暗杀小分队、吸收小分队成员、进行谋杀之后的下一步行动等一系列重要任务⑫。

第四个目的是鼓励老百姓消除恐惧和惰性并参加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⑬。所预想的是：杀死一个“可恨的压迫者”，可以得到当地人民强烈的支持，并说明运动是代表贫苦阶层的人的利益。关于戈皮巴拉布普尔的报告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党的领导可以正确地估量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歼灭阶级敌人和游击战争所增强起来的积极性和勇气”⑭。《解放》刊载的从诸如特里普拉、戈皮巴拉布普尔和斯里卡库兰县的桑佩塔等地来的报告，说明运动在动员农民参加粉碎农村封建权力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⑮。

**在理论、策略和组织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初发动了歼灭阶级敌人运动，其目的是粉碎封建权力，创建红色根据地，鼓励群众参加革命军队，树立农村群众中的贫苦阶层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这一行动路线对印度共（马列）的理论、策略和组织也有重大影响。

过去没有忽视用经济斗争去动员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必要性，而现在，歼灭运动开始以后，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都被取消了，理由是：“如果不首先打碎国家机器，就试图进行土地革命，那就纯粹是修正主义”<sup>①⑥</sup>。实行歼灭政策以后，党在策略主张上的变化程度，可以从实行这些政策以前的某些声明中看出来。

例如，一九六八年十月马宗达指出：“虽然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同志要继续宣传政治，然而他不能忽视提出经济要求的一般口号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这些，就不能把广大阶层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就不能把农民中的落后阶层提高到领会我们政治宣传的水平，也不能保持他们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仇恨，……‘农民要夺取即将收割的庄稼’是吸引广大阶层农民投入运动的口号”<sup>①⑦</sup>。他还说：“因此，反对封建阶级的经济斗争，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都是必要的。因此，夺取农作物的运动是必要的”<sup>①⑧</sup>。一九六九年二月《解放》月刊提到穆沙哈里的斗争时写道：“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并不存在一堵万里长城”<sup>①⑨</sup>。该刊联系到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拉金普尔起义时指出：“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一旦与这些〔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就会成为一股强大洪流”<sup>②⑩</sup>。

但是，现在的理论是，要在游击活动获得成功和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后开展经济斗争。把地主杀死或者赶跑或者将其制服，地

主在农村中的权力被连根拔掉之后，种庄稼的经济任务就会毫无困难地完成<sup>②①</sup>。斗争的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有关租金、工资、债务、利息、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的经济目标。据认为，发动经济斗争而不首先夺取农村政权，就会鼓励农民在拥有土地后退出积极的农民斗争<sup>②②</sup>。

二、当此时期，甚至政治运动任务也没有摆到优先地位。一九七〇年二月马宗达写道：“同志们，现在不是分散我们的力量去搞宣传的时候。我们不要陷于无目的的政治宣传中，政治宣传必须为成功地进行歼灭战的目的服务。”<sup>②③</sup>因此，不仅是经济斗争放弃了，甚至政治运动也取消了，唯一的是推行了歼灭计划。

三、这个政策也意味着拒绝“群众路线”和群众组织，而采用秘密组织来从事党的活动。马宗达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中明白地宣布：“革命农民证明，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对开展游击战争来说，都不是必不可缺的”<sup>②④</sup>。据认为，“公开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是发展和扩大游击战争的障碍”<sup>②⑤</sup>。

这条路线很快地从前线革命者那里得到确认。他们指出，在桑佩塔，以前没有群众组织并未给发动游击战争带来困难<sup>②⑥</sup>。迪纳杰普尔西部的印度共（马列）消灭了一个阶级敌人后证明：

“在当代，游击斗争可以在没有群众组织的情况下组织起来”<sup>②⑦</sup>。从特里普拉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sup>②⑧</sup>。

党的意见是，需要的是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开始时人数要少。一九六九年七月马宗达指出：“情况是：一部分先进的、有阶级觉悟的农民群众发动了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看来好象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斗争”<sup>②⑨</sup>。

## 暗杀的技巧

马宗达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许多人称之为“暗杀手册”——中详细叙述了游击队员在农村活动应采用的方法：“组织一支游击队的方法必须完全是秘密串连性质的。甚至在党的政治组织的会议上也不应当丝毫透露这种秘密串连的情况。这种秘密串连必须个别地单线进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志在这方面必须尽可能采取主动。他应当同他认为最富有革命精神的贫苦农民接触，并且悄悄地问他：‘要是把某某地主干掉，你觉得好不好？’游击队员就是必须这样来个别地秘密挑选和吸收，然后组织成一支队伍”③。

上面这段话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首先，游击队组织必须完全是秘密串连性质的和完全独立于政治组织。第二，吸收暗杀小分队人员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员负责进行。第三，人员的挑选由知识分子同志个别地进行，暗杀小队内部进行单线联系。第四，唯一的宣传是与歼灭政治有关的宣传，就是同可能成为行刺者的人“悄悄地进行耳语”。第五，在上述文章的其他部分可以看到，选择暗杀对象也是由知识分子成员主观评定的。

### 谁是“阶级敌人”？

谁是阶级敌人？在农村，纳萨尔巴里分子袭击的受害者的名单中，除了地主，还包括富农、高利贷者和警察密探以及“地主代理人”（这些“地主代理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社会较贫苦的阶层）。《解放》月刊对一个典型受害者作了这样的描绘：

“哈拉丹占有一百比卡\*头等稻田，他的放债事业是兴旺的。他还经营制造水泥的设备。这是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他的无

---

\*一比卡等于二市亩。——译者注

情的剥削和压迫使附近村庄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积极主动地协助警察把农民驱逐出村子。”<sup>31</sup>

从上述描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该受害者不是一个大封建地主，无论如何从他的财产和压迫农民的能力来看，很难说他的罪恶应该判处死刑。事实上许多受害者是小地主，他们被列入“地主或警察的代理人”。据粗略估计，纳萨尔巴里分子处死的大地主和大高利贷者的数目还不到受害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 使用的武器

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袭击时使用各种武器，但是他们特别喜欢用诸如刀、斧头、剑、棍棒和矛这类传统武器。这一使用传统武器而不是火器的政策，从许多方面说都是有道理的。在理论上，它意味着要更多地依靠人而不是武器。在实践上，有枪也会引起许多困难。“重视火器”会使同志们认为没有枪就无法从事“行动”，而一时又不可能给游击小队的每个成员发一支枪。带枪支的人会感到紧张，而一个人带有枪支，被察觉和逮捕的可能性就更大<sup>32</sup>。

使用传统武器的另一个理由是：使用传统武器，要跟受害者的肉体接触，而这被认为是可以增强对剥削者的“革命仇恨”<sup>33</sup>。关于武器的使用问题成为阿希姆·查特吉同马宗达分裂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宗达曾一度强制戈皮巴拉布普尔行动的领导人查特吉毁掉他设法弄到手的一些枪支。

在运动的早期阶段，马宗达的口号是，谁不帮助党搜集枪支，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者<sup>34</sup>。但是，在发动歼灭运动以后，战斗口号变成了：“谁手上不沾染阶级敌人的鲜血，谁就几乎不能称作共产党人”<sup>35</sup>。

## 虐待狂的表现

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的袭击，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残忍和野蛮，而且是有意这样干的，目的是制造红色恐怖，正如摘自《解放》月刊的下列几段话所表明的：

“对他的死并不满足，农民们还用他的鲜血刷标语。这表明群众对这个罪恶昭彰的封建主的强烈愤怒。地主老婆的兄弟和其他亲戚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一九六九年六月）

“这里，在地主房屋的墙上用血写着：‘以血还血’，‘你们杀害了P·K·，所以我们把你们统统消灭掉’。”（一九六九年七月）

“人民用敌人的血刷写标语，以表示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一九六九年八月）

“人民用敌人的血刷标语并将他的脑袋挂在他的房顶上，表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愤怒。”（一九六九年八月）

“我击那个狗腿子的头，一下子就送了他的命。但是还显得不够，所以农民们又把他砍成三块，其中一人还把刀子深深地插进死地主的肚子里。”（一九六九年九月）

“杀死后，我们割下他的头挂在他的屋前，还用他的血写诸如‘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农民游击队员的阶级仇恨是这么强烈，他们用竹竿抽打阶级敌人，直至竹竿折断。然后开始用斧头砍他。”（一九七〇年一月）

“游击队员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仇恨是这样的强烈，以至把敌人的脑袋割下，挂在大门外。”（一九七〇年三月）

“游击队员的愤怒和阶级仇恨是这样的强烈，以至把他的脑

袋割下来，踢到屋外去。”（一九七〇年三月）

## 第二节 斯里卡库兰起义

斯里卡库兰是安得拉邦二十个县中的一个。不象该邦的其他多数县，它在过去从来不是共产党的强大基地。在四次大选中的任何一次，共产党人都未能从这一地区争得一个席位，印度共（马）和印度共所得票数加在一起在这几次选举中分别占百分之四点九、百分之十二点七、百分之五点六和百分之四点四。根据一九六一年人口普查，这个县的居民为二百三十万，约占安得拉全邦人口总数三千五百九十万的百分之六。纳萨尔巴里的起义只限于这个县的某些税区<sup>③⑥</sup>。除了在一、二个县发生过零星事件外，斗争没有发展到特仓甘纳地区<sup>③⑦</sup>。然而，运动渗透了同斯里卡库兰相邻的、有大量吉里江人（山地部族）居住的奥里萨邦的科拉普特县，这主要是由于苏巴拉奥·潘尼格拉希的努力，他是安得拉邦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领导人，原先是从奥里萨来的<sup>③⑧</sup>。

在斯里卡库兰县境内，起义是从帕尔瓦蒂普兰特区所辖的多山的部族地区开始的，那里吉里江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起义达高潮时控制了下列六个税区：帕尔瓦蒂普兰、帕塔帕特南、帕尔康达、桑佩塔、伊查普兰和特卡利，前三个税区均属帕尔瓦蒂普兰特区。上述六个税区面积约五百到七百平方英里，约有三百个村庄，近二十万人口，约占安得拉邦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

斯里卡库兰的吉里江人运动比纳萨尔巴里运动更早。吉里江人的斗争——山区部族人的斗争，在未分裂的共产党领导下，一

九五九年开始于帕尔瓦蒂普兰特区。主要问题是关于林务官员限制他们的耕种方法。部族人还要求增加他们当农场雇工的工资。他们当农工的日工资不到半个卢比，当农场杂役每年只给五十九公斤粮食。另一个问题是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来自平原地区）拒不把抵押期满的土地交还给吉里江人，吉里江人无法从法院得到保障。还有许多问题，如沉重的债务等，也都体现在一九六四年吉里江人提出的权利要求中<sup>③</sup>。这些是部族的典型的不满表现，在印度许多地方都能看到，除了反对高利贷的盘剥外，部族人都是敌视政府的，因为政府通常把他们的流动耕作和蒸酒定为非法。在一般情况下部族人都被污蔑为罪犯。

运动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就。农场杂役的工资提高了五倍，强迫把三分之二的产品分配给耕种者，夺回了大约一千五百至二千英亩抵押给地主的土地，大约五千英亩荒地已交给吉里江人使用而不受林务官员的限制，以及到一九六七年废除了约三十万卢比的债务。运动还取得不少政治成果：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一个群众组织——吉里江人协会已成为他们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小组会、宣传小队、公开集会和罢工，也有面对警察镇压的群众直接行动。发生了一系列的逮捕和许多警察的起诉案件，并在吉里江人地区设立了警察营地。一九六八年初，特别武装警察被调来弹压群众运动，有二人被杀害，一千五百人被逮捕，警察多次在部族村庄进行掠夺和破坏。

一九六四年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后，尚未分裂的共产党的斯里卡库兰县级组织的领导人加入了印度共（马），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又退出该党。他们先加入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印度共（马列）成立后则参加印度共（马列）。

吉里江人的运动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加鲁达巴德拉事件之后有了新的变化。在这次事件中，吉里江人的示威遭到地主打手的袭击，地主的打手们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对她们进行了污辱。这事件激怒了邻近几个村庄的人民，他们集合起来，在地主土地上强行收割。接着是警察的残酷镇压。据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说法，这些事件促使他们思考用更有效的办法去反对警察和地主的打手的镇压。该县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领导人帕查迪·克里什纳穆尔蒂决定绕过邦领导而同查鲁·马宗达以及全印协调委员会其他领导人取得直接联系<sup>④</sup>。

马宗达劝告斯里卡库兰的领导人放弃以经济斗争为基础的群众运动而开展游击行动。他还建议斯里卡库兰的领导人要集中力量搞歼灭阶级敌人的活动并摧毁警察的武装。据纳萨尔巴里分子方面的消息，这一新路线鼓舞了这些领导人，他们立即从事组织游击队和计划庞大的进攻。

游击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的。那一天，来自二十五个村子的二百五十名吉里江人在帕尔瓦蒂普兰袭击了一个高利贷者的住宅，没收了他贮藏的价值二万卢比的大米和其他谷物。这是对地主、高利贷者及其代理人进行一系列袭击的开端，在袭击中游击队破坏和焚烧了屋房，拿走了钱和其他财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发生了几起同警察的遭遇战。有时是警察进行袭击，但是在另外情况下是小股警察巡逻队中了埋伏。《解放》声称，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底止，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一地区杀死了二十名警察<sup>④</sup>。但是，在这一阶段的游击活动中，尽管袭击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住宅，但除了同警察武装冲突中打死了人以外，还没有一个人是被蓄意杀掉的。



第二阶段从二月开始。作为歼灭阶级敌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杀死了一个地主，这个运动被认为是发动农民群众的唯一方法<sup>②</sup>。与此同时，运动扩展到桑佩塔平原，这地方过去几乎没有群众组织和党的活动。这些歼灭行动大多数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受害者被切成若干块，就在孩子、妇女和亲属的面前把割下的脑袋钉在大门上。这种杀人方式的主要目的是恐吓敌对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据报告说，甚至被杀害者的亲属也害怕向警察控诉和求援<sup>③</sup>。有的地主是经过人民法庭审判后杀掉的。在这场运动中，近一百五十人（包括警察在内）被纳萨尔巴里分子杀死了。

从地主那里夺取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都分给了吉里江人。最初吉里江人不敢要，唯恐遭到警察的镇压。据纳萨尔巴里分子说，他们的恐惧迅即被克服了。

到三月，据说纳萨尔巴里分子已控制了五百到七百平方英里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行政机构已瓦解，林务和税收官吏以及政府官员都不准进入这些地方。只有大批警察才能进去，那些继续留在该地的吓破了胆的地主和富农都无法也不愿跟警察合作。这个地区是由纳萨尔巴里的群众战线——农民斗争委员会（Rytanga Sangyam Samithi）管理的<sup>④</sup>。马宗达于三月初访问斯里卡库兰，他说希望这个县将成为印度的延安，成为革命者的红色堡垒，而武装斗争的烈火将从这里燃遍其他各地<sup>⑤</sup>。到七月的第三周，五十四个阶级敌人被杀死了<sup>⑥</sup>。

但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向国家政权的挑战立即遭到大规模的警察镇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帕查迪·克里什纳穆尔蒂于五月被杀害<sup>⑦</sup>，在十一、十二月的四次遭遇战中，其他十三位重要领导人

和工作人员被杀害<sup>(48)</sup>。在吉里江地区，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和凯拉萨姆于一九七〇年七月被杀害了，随后在四天之内，另两位领导人阿帕拉苏里<sup>(49)</sup>和纳格布尚·帕特奈克被捕了<sup>(50)</sup>。印度共（马列）斯里卡库兰的书记C·特杰斯瓦拉·拉奥后来也被捕了。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安得拉被捕的有一千六百四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斯里卡库兰被捕的<sup>(51)</sup>，没有超过二十个月，运动的脊梁骨就被打断了。

《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号发表了一篇总结斯里卡库兰斗争经验的文章，承认在领导同志被杀害之后“目前我们的损失和挫折是沉重的”。但另一方面它从毛关于“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场糊涂，一无是处，那就证明我们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原文如此——译注）的教导中得到鼓舞<sup>(52)</sup>。但是，事实上在党内早就对游击战争和歼灭敌人计划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死后，有人说他曾在日记中对放弃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群众斗争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据说他曾认为新的策略路线使纳萨尔巴里分子孤立起来了，部族人由于警察的残酷镇压而不再支持运动了。在萨蒂亚纳拉扬纳死前数周，他在这个山区的领导地位已被撤销，但不知道这是否由于他反对党的路线<sup>(53)</sup>。接替萨蒂亚纳拉扬纳担任这个山区领导的凯拉萨姆也跟他一起死去了<sup>(54)</sup>。还有报道说，阿帕拉苏里和帕特奈克一九七〇年七月去加尔各答（他们在那里被捕）表示他们反对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的这个策略路线<sup>(55)</sup>。还有报道说运动内部的部族人同平原居民之间发生了冲突<sup>(56)</sup>。

印度共（马列）的斯里卡库兰组织所作的自我批评性的分析刊登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的《新地》上，它声称：“在过去

两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经验。我们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正在纠正这些错误”<sup>57</sup>。

这个报告没有提到马宗达，这是严重的疏忽，因为斯里卡库兰的斗争被公认为是在马宗达的理论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早期斯里卡库兰的许多报道经常提到马宗达对他们的鼓舞和指导。这个报告也对歼灭运动保持谨慎的沉默，而更重要的是它制订了一个经济斗争纲领：

“因此，我们是考虑了当时存在的客观政治和社会条件之后来采取行动的。我们决定在印度共（马列）领导下发动人民反对各种剥削。分配多余的土地和地主非法占有的土地，拒付高利贷的利息，分配地主贮存的粮食并以公平价格出售这类粮食，拒付林业部税务官征收的所谓税款——这些都是人民要进行斗争的一些问题”<sup>58</sup>。

运动兜了一大圈，一九七一年初又回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前的位置上，但是已没有领导干部了，没有强有力的、基础广泛的群众支持了。这两年的造反几乎毫无成就，却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高昂代价。

谁是运动的领导人？在吉里江人地区的领导人是一九六〇年从平原来这里当教师的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他在贾塔普和萨瓦拉两个部族中是非常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死去，运动不仅失去了一位主要领导人，而且也失去了在面对警察大镇压时能有效地保持住部族人对运动的忠诚和支持的唯一人物<sup>59</sup>。党的领导权交给了一位从平原来的文科硕士帕查迪·克里什纳穆尔蒂。他死后又交给了C·特杰斯瓦拉·拉奥。来自奥里萨的安得拉著名作家苏巴拉奥·潘尼格拉希帮助把印度共（马列）的活动扩展到

奥里萨边沿的村庄。阿帕拉苏里是斗争中的另一主要人物。运动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其他各县的工科和医科学生参加了运动，成了中层领导<sup>(60)</sup>。但是据一九七〇年七月的报告，部族人对学生和其他从平原来的领导不满意，要求由他们自己来领导，部族人和非部族人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分歧的<sup>(61)</sup>。

### 第三节 其他地方的红色根据地

#### 米德纳普尔的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起义

同安得拉的斯里卡库兰一样，西孟加拉邦的米德纳普尔在过去也不是以共产党活动而闻名的，国大党和富农党牢固地控制着这里的居民。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是米德纳普尔的两个警察管辖区，靠近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是部族人。戈皮巴拉布普尔居民中的重要成分是马拉卡特里亚人，这个种姓曾经以组织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Paik—Biaroga”）而出名。从加尔各答去德布拉很容易，加尔各答距德布拉约八十英里。戈皮巴拉布普尔不那么容易进去，因为苏巴尔纳列卡河构成了它的北面边界。这两个地区均为森林所覆盖。

纳萨尔巴里运动在这两个地区的领导权都是由外来的学生所掌握。在戈皮巴拉布普尔的领导人是阿希姆·查特吉和桑托什·拉纳，前者是加尔各答大管区学院的学生领袖，后者是本地青年，有名的高材生。拉纳属于马拉卡特里亚种姓，他的种姓背景有助于他取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一位当地的部族领袖——古纳达尔·穆尔穆——在这次起义中也是突出的人物。在德布拉的领导人是巴巴德布·孟达尔，他是一位地方法院律师，于一九六七年

作为印度共（马）的候选人参加邦议会竞选，但没有获胜，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发动前的几年中他参与了部族的各项经济斗争。另一个领导人是阿索卡·迈蒂，他属于米德纳普尔的另一地区，曾经是重要的学生领袖，后来是这个县的印度共（马）领导人。一批从加尔各答来的学生同这些领导一道参加了夺取政权的运动。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已被警察监禁。

在印度共（马列）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边区委员会的支持下，邻近戈皮巴拉布普尔和德布拉两地区的党的工作者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戈皮巴拉布普尔的运动，并于同年十月一日发动了德布拉的运动<sup>⑥2</sup>。但是，德布拉的运动是早在一九六七年以经济斗争的形式开始的，当时在印度共（马）领导下，为反对黑市商人和囤积居奇者以及在有关农业工人工资问题上开展了斗争。但纳萨尔巴里分子说，这些斗争没有多少进展。他们说，这些行动暴露了组织，招致了当局的镇压。一九六八年，德布拉的领导转而效忠印度共（马列），但是直到马宗达宣传歼灭政策之前，印度共（马列）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最初两次对地主的行动失败了，然而“从两次游击活动的教训中我们体会到继续深入地在同志中推行歼灭阶级敌人的政治的必要性”<sup>⑥3</sup>。

据纳萨尔巴里分子方面的报道，这个地区与纳萨尔巴里起义不同，没有让偶然性和自发性起作用，运动是更有纪律和有计划地进行的<sup>⑥4</sup>。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后，领导上对实际上控制农民的村委员会比对分配土地和其他类似问题给以更多的重视。纳萨尔巴里分子也组织抢收庄稼，把典押给高利贷者的财物退还给贫苦农民，并确定无地雇工的工资。在根据地建立后仍留在村里的

封建分子同意遵守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命令，纳萨尔巴里分子则答应不剥夺他们的土地。

如同斯里卡库兰的情况一样，歼灭政策在这两个地区也立即取得成功：一些地主被杀掉了，一些地主跑到城里去了，而另一些地主则想同纳萨尔巴里分子调整关系。由于封建分子放弃权力而产生的那个地方的权力真空，由纳萨尔巴里分子填补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宣称：“每一次行动都增强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阶级仇恨，因而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sup>⑥5</sup>。在实行暗杀之后，很少人敢站出来协助警察，小股警察也不敢轻易进入某些地区<sup>⑥6</sup>。

当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的行动开始时，西孟加拉邦是在联合阵线政府的治理之下，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左蒂·巴苏主管政府的警察部门。虽然在此期间逮捕了一些人和东部边境步枪队被派去协助该地区的警察，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兼管警察的部长是不愿意尽力镇压叛乱的。不象在斯里卡库兰那样，纳萨尔巴里分子被捕后就枪决和遭受非人道的严刑拷打，在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警察的行动没有超过遏制纳萨尔巴里的活动和在受影响的村庄设置警戒圈这个限度。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联合政府倒台和邦长接管权力之后，警察就大批开进“解放区”，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把起义镇压下去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连同许多积极分子都被捕获了。

### 穆沙哈里起义

穆沙哈里，是穆札法普尔县一个包括十二个村子的小地区，约有一万人口，该地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后成了比哈尔纳萨尔巴里分子活动的中心<sup>⑥7</sup>。

如同在斯里卡库兰一样，运动是从经济问题着手的。但是后来，按照《解放》月刊的一篇报告，运动“发生了向政治斗争转变的质的飞跃”<sup>(68)</sup>。问题涉及到砍伐森林和占有土地的权利问题。

纳萨尔巴里分子起初只在两三个村子工作和骚扰地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他们接收了地主收获的庄稼并举行了一次武装游行，游行队伍通过了穆沙哈里地区的所有村庄<sup>(69)</sup>。这次行动招致了警察的严厉镇压。据印度共（马列）比哈尔的领导人萨蒂亚·纳拉扬·辛格说，这次行动使运动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争阶段。对这个地区的地主的住宅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在两个月内有六个地主被杀死了。在这些袭击中，纳萨尔巴里分子还把他们查抄来的借据烧毁并没收粮食和其他谷物。一九六九年五月的报道说，当时的运动涉及到二十个村子和近五万人。次年，据称运动扩展到穆札法普尔县各警察管辖区，以及比哈尔邦的达尔班加、昌帕兰与南孟吉尔等县和西孟加拉邦的普鲁利亚。据来自穆沙哈里的报道说，那里有十八人被杀害。但是，由于在短时间内逮捕了六百多人，运动迅即失去其势头，比哈尔邦在一九七〇——七一年只是偶尔发生一两起谋杀事件。

五月九日《新地》发表了印度共（马列）比哈尔邦委会的一个报告，总结了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报告说，“抵制选举”的口号没有在其党员中进行正确的宣传，结果是兰契·沙哈巴德和孟吉尔的某些党组织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某些其他党的竞选活动<sup>(70)</sup>。

报告列举了穆沙哈里斗争的四点错误：（1）领导的思想上有经济主义，结果是游击战争的发动被推迟了；（2）党对付敌

人的镇压缺乏充分的准备，而当镇压到来时，抵抗软弱无力；

(3) 党依靠专家进行游击训练，这种错误观点的结果是我们某些领导同志甚至想从“假政治犯”中找同盟者<sup>⑦①</sup>；(4) 党过分依赖现代化武器而未使积极分子相信使用传统武器的必要性。

### 北方邦的拉金普尔—凯里

与尼泊尔接壤的拉金普尔的帕利亚地区，过去有个时期全被森林覆盖和由塔鲁部族居住。后来从平原来的人迁入，实际上把部族人赶出了这个地区。其他地区的农民被鼓励迁移到这里来清理森林，从事耕作，并受到可以占有十至十二英亩土地的引诱。但是土地所有权都转到富农和地主的手里，小农辛勤劳动使这个地方成为可以居住和耕种的地方，而他们却没有从中得到利益<sup>⑦②</sup>。

这个地区的运动是以经济斗争的方式开始的，其目的是为了确认贫苦农民的权利。开头，运动的范围只限于大约十一个村子，但消息很快地传到其他二十个村子。一九六八年五月成功地掀起了一次群众高潮，但立即遭到警察的镇压。原来的那十一个村庄被警察占领了两个星期，其中三个警察营地留驻了三个月。农民组织力量太弱，无法抵挡警察的猛攻，他们便采取了“消极防御”<sup>⑦③</sup>。

无论如何，这个运动从来没有达到人们所宣传的那种规模。印度共（马列）的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很弱小的。当时这一派只有十二名成员，而其中仅有三人是准备去战斗的。当时没有群众组织，只在三个村子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即使这些委员会也没有开展正常的活动。然而党却自我安慰地说：“我们第一个分队的九名成员，手持红书宣誓，要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党进行工作将



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小规模起义具有一些饶有兴趣的特点。第一，参加者没有脱离经济斗争的轨道：“为土地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一旦与这些斗争相结合，就将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第二、组织上对于未能建立群众组织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我们没有完全听取毛同志的教导，而自认为只要有少数几个革命者坐在森林里就可以把‘农民斗争的农村根据地’创立起来。过了几个月，我们才重新去学习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并开始到人民中间去。”第三、歼灭阶级敌人政策没有被他们所接受。事实上，印度共（马列）北方邦委员会始终是怀疑这些政策是否明智。

一九七〇年五——七月号《解放》月刊发表了一篇报告（《北方邦的农民游击斗争迅速发展》），承认在拉金普尔—凯里遭受的损失，但在解释时提到，在这些地区“没有把通过歼灭阶级敌人以唤起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当作当前活动的总路线。这也表明缺乏决心。”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之后发生了一些凶杀（总共十五人）。

## 第四节 一点评价

### 运动的主要成分

纳萨尔巴里运动在农村地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的领导权掌握在“老战士”（指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人）的手中，但是大部分积极分子都是新手。总的领导人是查鲁·马宗达，他从四十年代以来就是共产党的活动分子。我们已经提到斯里卡库兰的领导人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从五十年代后期就

代表统一的共产党在这个地区活动，萨·纳·辛格（比哈尔领导人）和希夫·库马尔·米斯拉（拉金普尔—凯里起义的领导者）两人在参加纳萨尔巴里分子队伍之前都是印度共（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德布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这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当地活动了许多年，其中一人甚至还在这个地区参加了一九六七年的竞选。唯一例外是阿希姆·查特吉和桑托什·拉纳，他们共同领导了戈皮巴拉布普尔起义。他们在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之前都不是印度共（马）或印度共的成员，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印度共（马）很接近。

干部中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和部族人。加尔各答大管区学院的学生对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起义负主要责任，安得拉的医科和工科生参加了斯里卡库兰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德里的圣斯蒂芬学院的一些学生在比哈尔和旁遮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已经知道马宗达的“暗杀手册”给参加运动的这些学生成员规定了组织歼灭运动的任务。虽然真正到农村去组织起义的“出身高贵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才智可以补偿这个不足而有余。

在纳萨尔巴里分子造反的所有这些地方，得到部族的支持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象在纳萨尔巴里一样，所有这些地区，特别是斯里卡库兰和德布拉，过去就有共产党人在这些部族中组织群众活动的传统。在造反初期，纳萨尔巴里分子成功地发动了部族人去袭击地主的住宅，但是随着在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思想逐渐强调通过少数游击队员搞歼灭而不是强调搞群众性行动，参加的部族人就少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对重新分配土地不感兴趣，这也挫伤了他们对运动的支持。当警察终于开始干预和镇压不仅是纳

萨尔巴里分子而且还有那些被认为是同情纳萨尔巴里的部族人时，部族人就转过来反对纳萨尔巴里的积极分子。

部族的支持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些地区的不利因素。这些地方都是些小小部族的孤立地区，被非部族农民居住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在斯里卡库兰和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都没有在非部族农民中开展群众工作的传统。结果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未能在他们中间扩大活动。查鲁·马宗达本人曾指出，德布拉的部族人与非部族人之间的对立是那里运动的一个重大弱点<sup>(74)</sup>。在斯里卡库兰和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部族人和大学生发生了冲突，部族人抱怨学生企图支配他们<sup>(75)</sup>。

与得到这些地区的部族的支持形成对照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很少得到农民的响应。被派到农村去的学生，不管如何努力同农民相结合，还是被村民当做外来人。一般说来，一个从城里来的人是得不到乡里人信任的，他需要很大的耐心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在斯里卡库兰和纳萨尔巴里的部族中的领导人，曾经在农村中工作了许多年才得到村民的爱戴。萨蒂亚·纳拉扬和桑亚尔两个都会讲部族土语，前者还娶过两个部族妇女。

没有本地的干部，没有群众的支持，一个革命党是很难在农村存在下去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在非部族地区实行的歼灭政策，使他们的处境更困难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希望在杀死了可恨的和残暴的高利贷者或富农之后，农村中的穷人就会摆脱惰性和恐惧而和他们一起干。但事实上适得其反，因为这些谋杀和纳萨尔巴里组织的秘密性，在无地农民和其他穷人中引起了恐惧和厌恶。在缺乏政治宣传的情况下，在乡下人看来，消灭阶级敌人运动只不过是城里来的陌生人杀害了同村人而已。

此外，由于摒弃群众活动和群众组织，纳萨尔巴里分子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他们拒绝执行那些能够给穷人带来眼前利益的计划，理由是这些斗争都是经济主义。另一方面，夺取政权的号召难以以为贫苦的和政治上落后的农民所理解。纳萨尔巴里分子没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太先进而不能为落后农民所理解，同时他们没有使他们自己同农民所能理解其目的和意义的那些斗争——例如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民和无地农民的斗争——联系起来。象“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一类的口号也是同农村的现实格格不入的<sup>⑦⑥</sup>。自称在毗邻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的孟加拉邦边区进行过一百二十次歼灭活动的阿希姆·查特吉，在一九七一年被捕前数月曾悲叹说：“尽管杀死了许多人，他的组织连一个贫农或无地农民都没能吸收进来，因为它的活动跟他们没有联系起来<sup>⑦⑦</sup>。

歼灭运动的一个后果是把“游民分子”引进了运动。桑亚尔在他著名的特莱报告<sup>⑦⑧</sup>和萨·纳·辛格在他的关于穆沙哈里的报告<sup>⑦⑨</sup>中都提到，在主要的积极分子中有“假政治犯”或“流氓”。查特吉还评论说，歼灭路线只是对学生、青年、中等阶级、土匪和游民无产者有吸引力<sup>⑧⑩</sup>。一旦杀人成为衡量一个干部的革命潜力的尺度和虐待狂成为“红色恐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犯罪分子涌入运动就将不可避免的了。

歼灭理论提出后，游击队组织从政治组织中分出来了，这也使得这些分子很容易参加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队伍，并借消灭“阶级敌人”或其代理人的名义来报私仇。歼灭对象的选择已无法控制。与众所周知的革命运动的准则相反，政治组织实际上已从属于暗杀小分队。当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七〇年四月转入加尔各

答后，游民分子在组织内部就更加有力量了，许多大学生因为不同意歼灭政策而退出了运动。

### 党内分歧

这些起义和歼灭运动的第二个方面，是由于种种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在纳萨尔巴里分子队伍中引起的分裂。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阿希特·森以及其他的人，把歼灭政策叫做反对“人民战争”思想和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格瓦拉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对于这些批评，马宗达的回答是：格瓦拉是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武器进行斗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则是依靠群众的合作使其努力得到成功的<sup>⑧1</sup>。纳吉·雷迪不反对个人暗杀这个行动，但是要把它同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据他说，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这样做<sup>⑧2</sup>。萨蒂亚·纳拉扬·辛格也不反对歼灭，事实上，他在穆沙哈里和比哈尔邦的其他某些地方，就曾小规模地执行歼灭政策。但是他反对杀富农，而马宗达则认为富农同党的关系是对抗性质的<sup>⑧3</sup>。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但赞成杀警察、军事人员、密探和某些经过选择的“阶级敌人”<sup>⑧4</sup>。查特吉则批评歼灭运动的另一方面，即批评它坚持杀“阶级敌人”但同时却以袭击警察和军事设施会削弱革命者的阶级仇恨为理由而不愿搞这种袭击。查特吉认为，这种态度就领导人方面说无异于胆怯，并加强了国家机器<sup>⑧5</sup>。几乎所有这些批评，除萨·纳·辛格外，都指出完全禁止群众性活动，是运动的最严重的缺点。

歼灭政策也引起了关于“进攻策略”是否适宜的理论问题。纳吉·雷迪、萨·纳·辛格和库尼卡尔·纳拉亚南认为，人民战争不应从进攻开始，而应从反抗地主的进攻和镇压开始。他们引

用毛的著作来证明防御行动在革命战争中不是不重要的，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在同强大敌人战斗的危急形势下不从事防御。对于这些批评，马宗达的答复仅仅是：“修正主义者与革命者之间的主要分界线是，前者要求以保证成功作为从事斗争的先决条件，而革命者则勇敢地进行战斗和夺取胜利”<sup>⑧⑥</sup>。马宗达还受到批评，说他歪曲了毛的歼灭战思想，毛的歼灭战只限于同敌人的武装力量作战，从来没有采取秘密暗杀的形式。批评者引用毛的话来证明，毛是要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而反对消灭地主个人<sup>⑧⑦</sup>。

纳萨尔巴里运动内部在歼灭理论上的争论，提出了另一个有关游击战争原则的策略问题，即同样的战术是否在印度的所有地方都完全适用的问题。马宗达接受“普遍适用的”路线，据他说，歼灭运动是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适用于印度的任何地方，而雷迪、辛格和查特吉则强调“印度革命的不平衡性”。

所有这些分歧对党的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党组织退出了马宗达的组织，罗易·乔杜里和查特吉则继续在印度共（马列）内部同马宗达的路线和领导进行斗争，直到乔杜里死去和查特吉被捕为止。雷迪在印度共（马列）成立时将他的组织分裂出来，安得拉的斯里卡库兰组织在一九七〇年也拒不承认马宗达的领导。最后，中国党在一九七〇年送交给印度共（马列）的一封密信中也批评了歼灭路线，但是马宗达直到一九七二年他死以前都不让在党员中间传阅这封信<sup>⑧⑧</sup>。

歼灭路线后来推行到加尔各答，当时，即一九七一年四月，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个城市开始了大规模活动。在运动中，反社会分子和退学的青少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大学生——他们中

许多人由于反对歼灭路线现在被扣上“怀疑主义分子”的帽子——都被推到后面去了<sup>⑧9</sup>。

### 红色根据地

这些武装起义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发动起义之前很少考虑计划和组织工作。事先几乎没有想到如何对付大规模的警察进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当警察大批到来时，纳萨尔巴里分子就根本无法抵抗。在斯里卡库兰吉里江人地区，事先没有做出计划来把起义扩展到周围的没有左翼活动传统的平原地区去。起义所及的地区是非常小的，人口也很少，在一个拥有五十六万个村子的国家中，受纳萨尔巴里运动影响的村子没有超过二百个，而且还是很分散的。只要这种起义局限于分散在全国的孤立的小地区，印度统治阶级就不难将其镇压下去。

其所以事先缺少准备，是因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武装斗争理论认为准备是不必要的。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观点是，印度的统治阶级由充当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傀儡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组成。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仅靠其军事力量维持生存<sup>⑧0</sup>。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印度人民都准备搞武装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所需要的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它将象灯原大火一样从这个国家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sup>⑧1</sup>。对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反响鼓舞着他们，他们期望斯里卡库兰将成为印度的延安。

一九七一年三月马宗达写道：“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麓到南方的河口，到西南的婆罗双树森林，到西孟加拉的农村，都回荡着英勇的农民游击队的脚步声”<sup>⑧2</sup>，他预言，人民解放军“如果不是在一九七〇年的话，也将在一九七一年初”<sup>⑧3</sup>在孟加拉的广

阔平原上进军。马宗达在把这一点同中国的经验做比较时宣称，印度革命者的处境比在斗争年代中的中国人要好些。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时遭到敌军的包围，而“印度的各个角落都象一个火山，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不能仍然只局限于那一个地区。这一斗争正在扩大，将十分迅速地扩大到我国各个地区。因此，敌人要包围是不可能的”<sup>⑨</sup>。对于印度人民进行革命的主观准备过分乐观，以及错误地估计印度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印度统治阶级的力量和弱点，使得纳萨尔巴里分子对游击战争的基本技术方面漠不关心。

## 总 结

最后，我们可以将这些农村地区的武装起义的经验概述如下。运动的主要弱点是，认为只要发出武装斗争的号召，印度人民就会立即起来造反。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斯里卡库兰得到部族的支持，但他们的活动没有扩展到周围的平原地区。在平原对地主住宅的偶然袭击，虽然支持了部族地区的运动。却并未能在平原居民中产生很大影响。领导很快认识到，仅仅在部族地区不可能长久保住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因为警察迟早一定会大批来到的。领导者显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要想把活动扩大到平原，但又不愿使自己卷到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和斗争中去。他们认为，歼灭策略可以替代群众组织和群众活动而将他们的影响扩大到新区。

歼灭政策立即取得成功。只要有二、三个地主被杀掉，其他的就跑到安全的城市去了，或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热情支持者。这些屠杀在农村制造了一个权力真空，纳萨尔巴里分子进去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们把这些地区叫做解放区，因



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地区内自由活动。他们宣布这些政策取得了成功，因为即使过去没有群众组织，现在他们却由于歼灭运动而控制了这些地方。杀掉多少阶级敌人已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衡量某地革命发展速度的标准。每当一个新地区发生了一起歼灭阶级敌人的活动，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刊物就认为革命发展到了那个地区。

游击队员不相信解放区的群众。暗杀是少数积极分子干的，农村中的犯罪分子被吸收到运动中去，而农民的经济要求却无人过问。所有这些使得纳萨尔巴里分子更加脱离群众。他们还低估了白色恐怖和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只有很少几支枪，弹药供应很不充足，几乎没有游击战争和思想方面的训练，最糟糕的是，当他们同警察冲突时，人民不站在他们一边。当警察进入这些“解放”区并残酷地镇压运动时，所遇到的抵抗是微弱的。他们杀死纳萨尔巴里运动领导人和残暴地拷打可疑的支持者。但是，纳萨尔巴里分子自己的暴虐行为和迷恋于血腥谋杀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使许多人认为警察的暴行是有道理的。同样的情况也曾一再出现在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和穆沙哈里。

## 注 释

①《人民日报》社论：《印度的春雷》，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②同上。

③萨·纳·辛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土地革命，《解放》，九六九年十一月号；以及《土地革命与反动阶级内部的危

- 机》，《解放》，一九六九年九月号。辛格认为，反对歼灭等于鼓吹地主和农民在农村中和平共处。
- ④查鲁·马宗达：《通过总结印度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向前迈进》，《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
- ⑤《西孟加拉邦德布拉的革命农民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
- ⑥同上。
- ⑦据《解放》登载的若干篇报告。
- ⑧《斯里卡库兰的游击斗争扩大到平原地区：一课》，《解放》，一九六九年十月号。
- ⑨查鲁·马宗达：《谈谈游击队活动》，《解放》，一九七〇年二月号。
- ⑩同④。
- ⑪《解放》的若干篇报道。
- ⑫同⑨。
- ⑬同⑤。
- ⑭同上。
- ⑮见注⑳、㉑、㉒。
- ⑯查鲁·马宗达：《彻底地反对修正主义，将农民斗争推向前进；反对经济主义，发展群众运动》，《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 ⑰查鲁·马宗达：《着手做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解放》，一九六八年十月号。
- ⑱查鲁·马宗达：《通过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发展农民的阶级斗争》，《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
- ⑲《穆沙哈里地区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 ⑳《拉金普尔的帕利亚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四月号。

- ②1 同⑨。
- ②2 同⑩。
- ②3 查鲁·马宗达：《使七十年代成为解放的年代》，《解放》，一九七〇年二月号。
- ②4 同④。
- ②5 同上。
- ②6 《由一个农民组织者领导的“游击战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 ②7 《解放》，一九六九年十月号。
- ②8 《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②9 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 ③0 同⑨。
- ③1 《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③2 同⑤、⑨。
- ③3 桑乔伊：《坦白地说》，《新地》，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 ③4 同⑩。
- ③5 同⑨。
- ③6 在内洛尔、贡土尔和克里希纳等县发生过零星的事件，参看《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③7 参看《特仑甘纳又起来了》，《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号，文中有段关于分裂运动的话：“英雄的特仑甘纳又起来造反了。整个特仑甘纳地区的人民在前进。我们要一个独立的特仑甘纳邦的呼声响彻现在属于安得拉邦的九个县。他们正在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推翻地主和其它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他们自己的邦，从而消除贫困、饥饿、失业、剥削和压迫。”
- ③8 《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③⑨《在斯里卡库兰的吉里江人的斗争》，《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
- ④⑩《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 ④⑪《革命的吉里江人从战争中学会战争》，《解放》，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 ④⑫《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 ④⑬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 ④⑭《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 ④⑮查鲁·马宗达：《斯里卡库兰——将成为印度的延安吗？》，《解放》，一九六九年三月号。
- ④⑯《解放》，一九六九年八月号。
- ④⑰《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 ④⑱《为被杀害的斯里卡库兰英勇的烈士们报仇》，《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④⑲《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 ④⑳《印度时报》，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 ⑤①《甘露市场报》，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
- ⑤②《迫害使斗争激化：斯里卡库兰的经验》，《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号。还可看《武装的游击斗争在斯里卡库兰扩展》，《解放》，一九七〇年五——七月号。
- ⑤③《解放》，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 ⑤④同上。
- ⑤⑤《印度时报》，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 ⑤⑥《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⑤⑦《印度共（马列）地区委员会关于斯里卡库兰的报告》，《新地》，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
- ⑤⑧同上。
- ⑤⑨《甘露市场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解放》，一九

六九年九月号。

- ⑥⑩ 莫希特·森：《纳萨尔巴里分子和纳萨尔巴里主义》，《经济和政治周刊》，一九七一年专刊。
- ⑥⑪ 《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⑥⑫ 《西孟加拉德布拉的革命农民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⑥⑬ 《西孟加拉德布拉的革命农民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
- ⑥⑭ 阿比詹·森：《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策略路线》，《新地》，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
- ⑥⑮ 《解放》，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 ⑥⑯ 《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一月六日和六月六日。
- ⑥⑰ 《穆沙哈里地区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 ⑥⑱ 同上。
- ⑥⑲ 萨·纳·辛格：《穆沙哈里及其教训》，《解放》，一九六九年十月号。还可参看N·K·辛格：《印度共（马列）报告》，《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
- ⑦⑰ N·K·辛格：《印度共（马列）报告》，《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还可参看《比哈尔农民游击斗争奋勇前进》，《解放》，一九七〇年五——七月号，文中提到发生在穆沙哈里、达尔班加、孟吉尔、普尔尼亚和兰契的七次歼灭。
- ⑦⑱ 萨·纳·辛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土地革命》，《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 ⑦⑲ 《拉金普尔的帕利亚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解放》，一九六九年四月号。
- ⑦⑳ 同上。
- ⑦㉑ 查鲁·马宗达：《新人的诞生》，《解放》，一九七〇年八月

号。

- ⑦⑤《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⑦⑥查鲁·马宗达：《通过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发展农民的阶级斗争》，《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
- ⑦⑦阿希姆·查特吉：《当前党的工作总结》（孟加拉文），一九七一年在党内散发。
- ⑦⑧卡努·桑亚尔：《关于特莱地区农民斗争的报告》，《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
- ⑦⑨萨·纳·辛格：《穆沙哈里及其教训》，《解放》，一九六九年十月号。
- ⑧⑩查特吉：前引文。
- ⑧⑪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 ⑧⑫《关于斯里卡库兰吉里江人的武装斗争》，《无产者道路》，第一期。又见莫汉·拉姆：《毛主义在印度：两条策略路线》，《防务研究和分析学会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
- ⑧⑬比哈尔组织发出的供其成员使用的一个文件。此文件也包含了马宗达的回答。
- ⑧⑭普尔纳：《关于学生青年运动》，其中包含有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普尔纳是他的化名）的批评和马宗达的答复。
- ⑧⑮查特吉：同前引文。
- ⑧⑯参看⑦⑧和⑧⑪，还可看库尼卡尔·纳拉亚南：《印度的马克思主义》，《新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⑧⑰同上。
- ⑧⑱《主流》，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 ⑧⑲《未来革命的儿童》，《经济和政治周刊》，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三日。

- ⑨⑩《印度共产党（马列）纲领》。
- ⑨⑪《印度的春雷》，《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 ⑨⑫《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
- ⑨⑬《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号。
- ⑨⑭查鲁·马宗达：《前进，胜利日子已经临近》，《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号。

## 第三章

# “文化革命”

本章叙述的是纳萨尔巴里运动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当时的活动限于在加尔各答进行的一次“文化革命”。这一时期从一九七〇年四月，即西孟加拉邦第二届联合阵线政府垮台和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农民起义失败后不久开始，以各种形式延续了一年左右。但在发动文化革命后的几个月，当他们决定大规模地实行歼灭计划时，加尔各答市的纳萨尔巴里活动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化革命纲领（在纳萨尔巴里分子中又称为“在教育机构中的行动”）较之歼灭计划来说，则被摆在第二位。

直到这一阶段开始时，加尔各答的纳萨尔巴里活动仅限于在墙上写标语和控制几个学生会。党组织仍然是合法的，有公开活动的余地。这也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明确地把农民起义摆在优先地位的一个时期。在加尔各答的活动主要是进行宣传和召开大型集会，纳萨尔巴里分子最大的一次动员集会，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广场举行，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盛大示威，纪念纳萨尔巴里起义两周年。

“文化革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袭击教育机构和号召抵制考试，来表示大中学校课程的阶级性，第二个方面是捣毁以往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的塑像和照片，使之名誉扫



地。

### 袭击教育机构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对贾达夫普尔大学的甘地中心进行了一次袭击，这场进攻就从这次袭击开始了。这一中心的家俱和其它财产被捣毁，甘地的塑像和著作遭到破坏<sup>①</sup>。接着对几个大中学校进行了类似的袭击。他们的作法通常是：一群年轻人进入教育机构领导人的办公室，捣毁家俱，烧掉档案和文件，然后在房间的墙壁上写上毛主义的口号。这一行动开始和结束时都是扔炸弹把人吓跑，这个过程一般不超过十分钟。有时，学院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也遭到破坏，一九七〇年四月下旬和五月，对教育机构搞了五十一次这样的袭击，仅在五月份，对包括孟加拉所有大学在内的三十四教育机构的袭击就达四十三次<sup>②</sup>。这些行动进行得迅速，组织得很好，成功率很高，袭击者遭到学生或其他人的反对和被赶跑的情况是极少见的。这些袭击造成极大的混乱，清楚地暴露了警察对保护这些被袭击的教育机构是无能为力的<sup>③</sup>。袭击教育机构后接着是进攻考试中心，考卷被撕毁，家俱被破坏。同时提出了一个总的抵制考试的口号<sup>④</sup>。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这些袭击时也毁掉以往的民族领袖的照片。

这种打了就跑的袭击，使纳萨尔巴里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袭击发生在加尔各答这个大都会和东印度的心脏，印度经济的神经中枢，而不是发生在农林密布和部族人居住的穷乡僻壤。多数报纸的头版新闻详细报道了这些袭击，使纳萨尔巴里分子成为全市谈话的题材。一个观察家写道：“大学生正在练习以速度、秘密和主动性为基础——这些东西是使青年人感到振奋的——的游击战术，并使之日趋完善。他们的突然袭击的战术，在

加尔各答引起一些不过问政治的人的好奇心。”他接着写道：

“毛主义分子认为，大中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机构已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应当炮轰它们，不论公众当前的反映如何。难道文化革命不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吗？难道毛泽东不是依靠那些不墨守成规而又充满活力和敢想敢干的年轻学生来发射文化革命的第一发炮弹的吗？”⑤

为什么进行这些袭击？

对纳萨尔巴里分子这些行动的目的有许多猜测。一般的解释是：它是个牵制战术，把警察力量牵制在加尔各答，以减轻警察和军队对农村的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的纳萨尔巴里基地的压力⑥。

另一种解释是，一九六九——七〇年到农村去的许多纳萨尔巴里分子感到难以适应农村的条件，并且由于村民对他们的反应很差，因而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幻想逐渐破灭。这些活动的意图是保持干部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忠诚，并尽可能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能力。第三种解释是：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吸引很大一批青年人参加纳萨尔巴里运动，由此引起的警察行动会迫使年轻的新成员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提出这种解释的人声称，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城市活动同他们农村起义的总纲领就是这样联系起来的⑦。

所以提出所有这些解释，是因为在加尔各答的活动不符合党对青年（特别是学生）在运动中的作用所表明的观点。仅在一年之前，即一九六九年四月，印度共（马列）关于革命学生和青年的政治纲领草案就提到，要把通过土地革命实现人民民主国家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它强调农村工作，并要求积极分子不参加工会选举而更多地集中力量于革命工作。在学生战线本身，发出了一

个就粮食、就业等等问题参加学生运动的号召<sup>⑧</sup>。一九六九年九月，马宗达再次号召学生和青年到农村去、到无地农民和贫农中去传播毛的思想<sup>⑨</sup>。

一九七〇年三月，在对学生和青年的另一个号召中，马宗达说：“在我们的学校里，这种年龄（十八——二十四岁）的学生和青年不得不学习反人民的课程和参加考试。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书越读越蠢。如果你们此时此地献身于革命斗争，而不是在考试中浪费你们的精力，这就会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青年和学生也离开了他们的学校和大专院校”<sup>⑩</sup>。虽然马宗达在这里提到了课程的阶级内容，并呼吁离开学校和大专院校，但这是向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积极分子提出来的。他不是要积极分子搞什么抵制考试和袭击教育机构，而是要求他们成千上万地到农村地区去宣传毛主席的思想。

显然，这些活动是在党的学生和青年干部的带动下自发地开始的<sup>⑪</sup>。对甘地中心的袭击是在丑化甘地形象的明确目标下进行的。这次袭击使纳萨尔巴里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宣传，而且这种行动方式最不需要人力，即只要七八个坚决为运动献身的人就够了。青年和学生积极分子在初步胜利的鼓舞下，对其它教育机构进行了类似的袭击。领导人在袭击成功后及时地表示赞许，“党的青年和学生不是坐等中央指示，而是根据主要的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开展这一运动的”<sup>⑫</sup>。一九七〇年十月，《爱国者报》刊登一篇文章，祝贺他们发动了“对殖民地教育制度的进攻”，祝贺他们宣布了“反对甘地和其它资产阶级领袖的战争”，祝贺他们“庆祝一个节日——捣毁偶像的节日”。这里没有提到青年积极分子到农村去组织武装起义的必要性<sup>⑬</sup>。领导人也断言“学生

和青年所干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不首先粉碎在印度流行的殖民地教育制度，不摧毁买办资产阶级建立的塑像，就不可能实行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⑭。

### “捣毁偶像”运动

与纳萨尔巴里分子对教育制度进行的改革运动同时发生的，是一场反对以往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十九世纪孟加拉复兴时期坚贞不屈的人物的运动。这个运动采取的方式是捣毁上述人的塑像或把他们的脸涂黑。纳萨尔巴里分子这样来证明他们的活动是正当的：“青年和学生打击万恶的教育制度时，除了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这些卖国贼的肖像踩在脚下之外，还捣毁了象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伊斯瓦·钱德拉·维迪亚萨加、维夫卡南达和阿苏托什·穆克吉爵士这许多‘杰出’人物的肖像和模拟像。长期以来，他们受到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赞扬。革命的青年和学生，从正在粉碎农村封建权力的革命农民斗争中并从印度共（马列）的纲领中得到鼓舞。他们用这样一把尺子去衡量这些‘可尊敬的人’：他们究竟是站在路障的哪一边的？……。背信弃义的修正主义者……盲目崇拜所谓孟加拉复兴的领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而这些人为帝国主义服务得如此到家，并充分地表达了英帝国主义一手造就的、能成为它在这个国家的支柱的新封建领主和新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愿望。在所有这些年代里，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走狗，……力图使人民忘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革命青年捣毁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树立起来的偶

像，有助于恢复阶级观点和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摧毁这些样板，就不能塑造出人民英雄的新样板。今天，青年和学生（他们主要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这场群众性文化运动正载入世界历史史册。青年和学生正在进攻一切反对农民的人”<sup>①</sup>。

## 影 响

在这两个问题上，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文款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在大学里进行的是一种错误的教育，它的观点是殖民地的，它用反动思想毒害青年人的心灵。必须对过去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坏思想进行斗争，代之以新的革命思想。

两个纲领中的第一个纲领——纳萨尔巴里分子称之为“在教育机构中的行动”，在一九七〇年是很成功的。加尔各答及附近地区的学校和大专院校，几乎没有不受到纳萨尔巴里运动抵制考试的影响。据粗略的估计，有三分之一或半数学校，其行政机构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袭击或害怕这种袭击而陷于混乱状态。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反对考试，许多学校放弃了这种考试，使另外许多学校采取了升级不需要考试的政策。有的学校不顾这种威胁，在市警察和中央后备警察的协助下安排考试，但最后仍不得不取消考试，因为它们收到新的威胁信，说考试过后警察离开时，学校的教学人员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然而，并非所有这种威胁都来自纳萨尔巴里分子。有时，一些不问政治的学生，为了同他们的老师开玩笑和逃避考试，便利用当时的恐惧气氛，给校长写带威胁性的便条。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必定会受到学生的欢迎。每个学校也有一些学生愿意采取战斗性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要求。过去也常听说考试时学生对教师

采取粗暴行动。现在，唯一的区别在于，可以在政治运动的名义下把学校那位“可恨的权威人士”——校长，作为攻击的靶子。

对参加抵制运动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与其说是为反对学校制度及其阶级性质而造反，还不如说是为了容易地得到一张升级的凭证。否则为什么一俟学校当局决定不举行考试，即使他们一如既往，仍以同样阶级内容的课程继续授课，运动就平息下去了呢？不仅一些在考试中沒有多少机会及格的人，而且那些眼下能避免考试所带来的紧张和忧虑的人，都团结在这个“革命的口号”之下。许多父母对此采取不热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最终所关心的问题毕竟是他们子女的升级问题。大约一九七〇年八、九月间，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发动歼灭运动时，他们从学校补充来的新人员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

许多人尖锐地批评了在革命前开展文化革命的政策。这些批评的实质是：运动的重点搞错了。现行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传授资产阶级的社会准则的，从革命运动的观点来看，有比在学校进行文化革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如果不首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文化革命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会因对教室、实验室和教师提出这样的一些口号或进行暴力行动而改变。此外，“抵制考试”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经济性”口号，而一个更诚实的（也许是不那么成功的）口号则是让学生抛弃他们的学习。这些批评也同时指出，受运动影响的学校是在穷苦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居住的区域里，而上层中等阶级的英语学校则未受到运动的影响。

这个运动取得的成就是短暂的。甚至在一九七〇年，许多学校举行考试时也都暗中作了这样的规定：对学生在考场里进行的

欺騙和抄襲不予注意。这样，学校当局既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又可以让学生在抵制考试之外另有一条容易的出路。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整个西孟加拉邦，这已成为从小学到大学研究院各级学校的一个普遍做法。这种办法有效地限制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在学生中间的影响，虽然它进一步贬低了考试制度。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方面——“捣毁偶像的节日”，在人民的任何阶层都不受欢迎。在运动内部，对于把孟加拉过去的伟大改革家维迪亚萨加和拉姆莫亨等描绘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反动派”的否定态度，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评价一个人的作用，是辩证地考虑到他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此外，仅仅因为有人把维迪亚萨加塑像的头砍去或脸涂黑了，就期望人民会把从他那里获得的社会准则抛弃掉，那也是错误的。

对“在教育机构中的行动”提出批评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马宗达。他问道：

“为了发动武装斗争，难道就必须首先把纳萨尔巴里的农民从拉姆其亨、拉宾德拉纳特和维迪亚萨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他对运动自发地开始而不听从领导人的决定这一点也持批评态度。并认为马宗达把这些活动同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的学生运动相比是毫无根据的。他应当搞一个改革课程内容的运动，而不应搞这些活动<sup>①⑥</sup>。

### 加尔各答大专院校的“优秀大学生”

在讨论纳萨尔巴里运动史上的文化革命阶段时，不提到在组织这次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大管区学院和加尔各答几个主要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上等家庭出身的”学生，讨论就是不够全面的。他

们参加运动，给运动增添了魅力和威信，尤其是因为他们除了是邦里青年中学业优良的人之外，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出身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优越的家庭。他们为运动带来了未预料到的那部分人的同情，甚至带来了完全不同意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目标、纲领和观点的那些人的同情。尽管运动采取暴力行动，只要这些上等家庭出身的分子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人们就不能把这一运动贬低为流氓和反社会分子所策划的。这些人被报刊描绘为“孟加拉青年的精华”或“孟加拉之花”，虽然这些报刊一向是反左翼的⑰。

直到一九七〇年四、五月间，这部分上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除了起着为运动“树立形象”的作用外，还是纳萨尔巴里活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纳萨尔巴里起义后不久，他们参加了运动，当时在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些小组，表示声援起义的农民，他们通过宣传画、著作和他们控制的学生会，有力地宣传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观点。他们口齿伶俐，诚恳而又聪明，这是甚至可以博得不过问政治的人们的同情的素质。因为这些学生的家庭有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运动转入地下后，他们易于在一些富裕的亲戚家里找到藏身之所。对他们说来，被捕后进行保释或得到假释也都是比较容易。尽管他们的亲戚对纳萨尔巴里的政策和做法缺乏热情，但还是帮助他们，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和警察冒着巨大的风险掩护了他们。

几个作家都注意到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思想中有一种“新左派”成份，这是上等家庭出身的学生对运动的影响的直接结果。同西方的新左翼分子一样，他们对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表示不信任，在进行革命过程中给学生分配重要的任务，号召抵制考试，



反对建立有纪律的集中的党的机构，并以同“党的官僚主义”斗争为名，宁愿要一个组织上松散的党组织。同他们的西方同伙一样，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很有学识，对报刊和其它群众性的宣传工具的影响，比他们的实力或活动范围应有的影响要大。象新左翼一样，他们最后也分裂成好多派别。

纳萨尔巴里运动中这部分人的上等家庭出身的特色，从它和学业上较差，但更有战斗传统和人数众多的下层中等阶级的学生的关系上看得出来。对后者说来，他们是以对自己的“先锋”作用过于自负的“学生贵族”的面貌出现的，上等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能够和他们建立起任何有成果和持久性的接触。在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和斯里卡库兰两地，这些学生在初期是成功的，但随后就同部族人发生了冲突<sup>⑮</sup>。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说，直到一九六六年，这部分人在加尔各答生气勃勃的学生运动中仅仅起了有限的作用，一九六六年他们在大学宿舍管理问题上同当局发生的一次纠纷，导致抗议性的示威、罢课和围困运动，并使他们同当时城市的学生运动更接近了。

一九六九——七〇年响应马宗达号召到农村去的大多数学生被捕了。逃脱警察追捕的人回到城市后，很少有人参加城市地区的活动。在乔杜里反对马宗达的派别斗争中，很多人站在乔杜里一边。他们被党扣上“怀疑派”的帽子，因为他们在执行城市的歼灭路线上犹豫不决。歼灭运动在加尔各答轰轰烈烈地展开，领导人由于退学青少年和反社会分子对恐怖主义更加狂热而鼓励这些人参加运动后，他们在运动内部就失去其特殊的地位了。

## 注 释

- ① 《印度时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 ② 根据新闻报道。
- ③ 阿索克·鲁德拉：《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烟火》，《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日，苏曼塔·班纳吉：《西孟加拉的前夕》，《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 ④ 《国民先驱报》，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阿龙·马宗达：《傲慢的造反者》（一封信），《新地》，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 ⑤ 桑乔伊：《坦白地说》，《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日。
- ⑥ 《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六日；还可参看班纳吉：前引文。
- ⑦ 印度共（马列）比哈尔组织流传的文件，这一文件也载有马宗达提到这一观点的答复。
- ⑧ 《解放》，一九六九年九月。
- ⑨ 查鲁·马宗达：《党对青年和学生的号召》，《解放》，一九六九年九月。
- ⑩ 查鲁·马宗达：《向革命学生和青年说几句话》，《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
- ⑪ 普尔纳：《关于学生—青年运动》（党内文件）。
- ⑫ 印度共（马列）加尔各答东北地方委员会，《捣毁塑像实行挑战》（党内文件）。
- ⑬ 《爱国者报》，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五日；《解放》，一九七〇年八月（《革命青年和学生进行英勇斗争》）。

⑭同上。

⑮同上。还可参看帕尔塔·乔杜里：《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德沙班杜及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解放》，一九七一年一——三月；《镜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⑯普尔纳：《关于学生——青年运动》（党内文件）。

⑰刊登在《甘露市场报》（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下述故事是这些学生“树立形象”作用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帕里马尔·戴的人之后，感到不能肯定这个人是不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因为他在学校两次期终考试中不及格。他们认为，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学生怎么能在考试中不及格呢。这个故事早于加尔各答的歼灭运动，运动是几个月以后发动的。

⑱《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第四章

## 城市游击活动

### 第一节 歼灭运动

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教育机构中的行动，或称“文化革命”，是在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多少有些自发地由运动的青年和学生干部采取主动而开始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城市地区进攻的第二阶段——歼灭运动——却是预谋之举。发动歼灭运动是一九七〇年四至五月间作出的决定，但是直到八月运动才开始全面开展起来。有一位知情的观察者在五月里提到对学校和大专院校的袭击时就曾写道：“据传，由于技巧更为完善，邦（政府）镇压机构已分散，因此，大戏还在后头”①。

一九七〇年八月以后，纳萨尔巴里行动小队在一年之内谋杀了许多人，但同期内，可能有同等数量的纳萨尔巴里分子也被警察和他们的政敌杀害了。由于通常算在他们帐上的谋杀并不全都出于他们之手，所以很难估计纳萨尔巴里分子袭击的受害者总共有多少人。既然纳萨尔巴里组织是分散性质的，又没有良好的联络系统，因此甚至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导人也没有可能确定，究竟哪些谋杀是他们的人干的，又有多少是反社会分子顶着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名义干的②。

使用的武器

历次谋杀先后使用过刀、炸弹、管枪、铁棍、斧子和长矛，但是谋杀个人时比较广泛使用的是刀子，打群架时比较有效的是炸弹和管枪。经过好几个月才臻于完善的炸弹仍不如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使用的炸弹威力大。纳萨尔巴里分子和爱尔兰共和军不一样，他们从来不搞用爆炸物炸毁建筑物或商店之类的事情。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杀人，而他们造的炸弹对杀人来说却是无效的，除非是近距离投掷，或者大量投掷，或者对一群人投掷。他们制造的火器只限于称为管枪的手工制造的枪，用这种枪杀人是非常不顶用的，因为必须拉一根绳子才能射出子弹，这就使得瞄准难以准确了。我从未听说有哪一次纳萨尔巴里分子使用了来福枪或其他优越武器。炸弹和管枪的子弹都是费用昂贵的。比较起来，刀子既容易制造，又是使用起来最便宜的武器，而且效果还更好。纳萨尔巴里分子还相信刀子比枪更富有革命性③。这些武器（特别是炸弹）有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自己制造的，但是管枪和刀却是乡间铁匠所制造，通过传统的地下渠道到了纳萨尔巴里分子手里。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内，纳萨尔巴里分子曾组织过夺取警察枪支的专门行动，他们在比尔布姆活动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夺取火器私有者的枪。但是在那个地区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些武器④。

### 谋杀的方式

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谋杀大多是照一定的公式干的。他们一群四、五个人，向受害者猛扑过去，连续用铁棒打他，用刀捅他，直到他昏厥为止。受害者大都在几十名旁观者的目击下，于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袭击。和在农村地区一样，他们谋杀的方法表现出虐待狂。一名女教师——帕鲁尔·鲍斯在教室里遭到袭击，当

当着学生的面，当着其他急迫要拯救她的教师的面，被剪掉头  
发，一把刀子戳穿了她的胸膛。还有一名大学教师——萨蒂恩·  
查克拉瓦蒂，在三十多名学生的目击下被砍成碎块，其后这些学  
生多数都因休克必须接受治疗。一个六十九岁的老妇人——左  
蒂·查克拉瓦蒂，在家里被戳了十二刀。包括有名的工会领袖吉  
班·迈蒂，在内的一些人，从公共汽车上被拉下去杀死了。卡斯  
巴的一名警官穿着便服和他妻子乘坐在人力车上时，被拉下车来  
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在豪拉，有一次公开展览了一颗受害者的脑  
袋。有时，行动小队守候在受害者住所的近旁，等他回家时加以  
伏击。一位教师领袖，桑托什·巴塔查里亚就遭到这种命运⑤。  
在这些谋杀案中，袭击者几乎每次都使袭击对象受伤达二十至五  
十处之多，虽然一、两处就足以致命了。纳萨尔巴里分子这样作，  
部分是由于他们要确保袭击对象已死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则是  
由于他们认为应该这样来表达“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⑥。

## 解放区

除了杀害个人之外，纳萨尔巴里分子还致力于在加尔各答工  
业地带控制一些地区，成立他们所称的解放区。这些地区多数在  
横贯加尔各答市的主要铁路线两侧。顾名思义，这些地方是他们的  
主要政敌——印度共（马）的党员和支持者足迹不到的地区，  
也是小股警察队伍以不进入为妙的地区。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些  
地方寻求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任何人，一旦被怀疑是警察的告  
密者或印度共（马）的积极分子，就有在还没来得及证明自己不是  
这种人以前遭到杀害的危险。在解放区有一些精神错乱的人就  
由于有奸细嫌疑而被杀了。纳萨尔巴里分子不愿意有太多外边  
的人到这些地区来访亲问友。装有电话机的人都是可疑分子，因为

没有办法检查通过电话传递了什么情报。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医院，为他们从其他地区被撵出来的同志们提供住所。

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各不相同。多数解放区都实行了对租户和房东以及对房屋少和房屋多的房东加以区别对待的某种形式的税收制。小店主和商人要缴付不同份额的捐税。除了税收之外，还要求当地人民为纳萨尔巴里分子提供住所和膳食。但是行动小队和居住在解放区的人民之间实际上没有社交联系。事实上，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导人切望思想幼稚的青少年积极分子不要与人交换意见或争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青少年自己住在一起，一般说来，本地人在激动地相互议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总是躲开他们。

加尔各答的人都知道哪个地区安全，哪个地区不安全。白天，解放区看起来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到夜晚，店铺就早早关门，路上见不到行人，出租汽车也不肯开到这些地区去。

纳萨尔巴里分子从这些解放区对毗邻地区发动袭击。袭击通常采取大量投掷烈性炸弹的方式，或者派遣“行动小队”突然袭击政敌的住所，把大家知道的印度共（马）干部吓跑。一九七〇年八月至十月，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各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这种胜利，把印度共（马）党员从有关地区赶走了。这一攻势在印度共（马）的队伍中造成了惊慌、洩气和混乱，他们不知如何应付这种新形势。直到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印度共（马）的加尔各答组织才从纳萨尔巴里分子进攻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成立了自己的防御机构。纳萨尔巴里分子靠的是对个人进行突然袭击，而印

度共（马）的工作人员则组织夜间警卫队，轮流值班，配备了炸弹和管枪来保护他们力量强大的地区。他们还动员人民群众支持他们反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进攻和抵制考试的号召。到一九七一年一、二月间，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扩大地盘方面的进展就被制止住了。

一九七一年选举的时候，在贝尔加奇亚、巴塔拉、马尼克塔拉、北贝利亚加塔、南贝利亚加塔、希安普库尔、维迪亚萨加尔、乔拉巴甘、锡尔达和科西普尔等加尔各答选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区域是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解放区。除了南加尔各答的七个选区受干扰较少外，纳萨尔巴里活动不十分显著的其他九个选区是那些有大量非孟加拉人居住的地区。和加尔各答毗连的许多选区，特别是在豪拉、二十四区县和纳迪亚的各选区中，也有大块大块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解放区。一九七〇年中之后加入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游民分子有助于运动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 “阶级敌人”

纳萨尔巴里运动袭击的受害者是谁？根据一项估计，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之间，纳萨尔巴里分子仅在加尔各答一地就杀死了一百三十九名阶级敌人，其类别如下：印度共（马）四十四人，国大党四人，前进同盟二人，印度共一人，政府雇员二人，民间卫队队员八人，有告密嫌疑者十二人，房主一人，警察二十八人，商人十四人，放债者二人，其他（但非富人）二十一人<sup>⑦</sup>。我们将在下列各段考察各类受害者的情况。

### 警察人员

以上情况说明，在此时期内有四十八名直接或间接与警察有关系的人或被怀疑为同警察有联系的人被杀掉了。在整个西孟加



拉邦，不算告密者和民间卫队队员，被杀的警察达六十人以上。杀死告密者和民间卫队队员（大半住在解放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警察无从获悉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些地区的动向。纳萨尔巴里分子杀死敢于进入他们据点的告密者，是要使其他告密者不敢再来。

在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杀死的警察大都是交通警或下级干部。副警长级以上的警官没有被杀的。发生过两、三次袭击警车的事例（一次是在辛蒂地区烧掉一辆警察吉普车，从远处投掷大量炸弹杀死三名警察），但这是颇为罕见的。通常的作法是袭击单独的警察，以及正在值勤的交通警。

纳萨尔巴里运动用下面的话说明杀死警察是合理的。

“在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年代里，警察如同军队一样，都是英帝奴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警察是一股反人民的、腐败透顶的、堕落下流的势力，它受英帝国主义者的训练，认为自己高于人民一等，除了服侍其帝国主义主子之外，它总是为本国的剥削者效劳。他们忠心耿耿地履行其职守——恐吓、折磨和杀害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人民恨之入骨。

“帝国主义以间接统治代替直接统治之后，情况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在国大党政府和所谓联合阵线政府的统治下，警察的本性依然如故，他们仍充当反动阶级恐吓和折磨劳动人民以便使之屈服的工具，或者秉承剥削阶级的旨意谋杀劳动人民……

“今天，在人民的抵抗运动面前，警察在印度共(马)的领导下，扮演了比以往更为恶毒的角色。因此，这些杀人者还能期望什么宽恕，什么同情呢？只有在革命人民接连不断的打击下，他们掉转枪口对准人民之敌的时候，才会得到宽大处理”⑧。

从这几段话引伸出来的、支持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待警察的政策的主要论点是，警察在过去和现在压迫过人民，所以正在受到惩罚。接近纳萨尔巴里分子的人士还提出了其它一些理由，其中之一是，这些袭击可以使警察丧失斗志<sup>⑨</sup>。一位评论家声称：这些袭击对城市行政管理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混乱，并使普通警察感到恐惧，所以可以说明警察当局不过是“纸老虎”而已<sup>⑩</sup>。另一位评论家指出，这种杀害正在打破人们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信赖，这是最后打垮国家机构的一个必要的步骤<sup>⑪</sup>。还有人提出，纳萨尔巴里分子采取这种行动来刺激当局，使他们进行更多的镇压，这样，他们的阶级本性就会暴露在人民面前，警察部队受到袭击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逮捕和迫害以示报复，从而使警察暴行的无辜受害者及其亲属同情纳萨尔巴里运动。

还有一些解释是对纳萨尔巴里分子不太友好的人士提出来的。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些谋杀是反社会分子干的，他们投靠纳萨尔巴里运动是为了对个别警察报私仇<sup>⑫</sup>。大家都知道，加尔各答有许多警察以各种方式参与走私、破坏货车以及其它罪行，并和罪犯一起分脏。有时在分脏问题上产生不和。一九七〇——七一年，纳萨尔巴里运动为这些罪犯提供了既可以对警察报私仇而又可以不引起当局注意的天赐良机。

还有的解释说，这些杀害是有些高级警官为了清洗警察部队中的“不良分子”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已解散的低级警察工会原书记声称：被杀警察多是联合阵线统治时期该工会的会员或积极工作人员<sup>⑬</sup>。这工会是在联合阵线当政时成立的，但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强行实施总统治理之后被解散了。它支持联合阵线的“警察政策”，其中包括重新起用以前由于组织一次罢工而遭解

雇的警察人员，不再继续对政府公务员和教师进行就业前的“警察审核”，不站在资方对劳资纠纷和土地纠纷进行干预。印度共（马）人士更进一步暗示，说杀人是为了取消左蒂·巴苏任警察厅长时的进步政策。巴苏曾试图制订出新的警察行为准则，以改变他们作为镇压工具的形象，使他们为福利服务，并以警察同公众之间友好相处的关系来代替敌对的关系。这个政策虽然得到低级警察的好评，却使高级警官大为惊慌。印度共（马）人士声称，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交通警察和其他低级警察人员的杀害破坏了这个政策的积极方面。

耐人寻味的是，杀害警察同纳萨尔巴里运动早期的思想并不相符。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斯里卡库兰抓了一名警察，把他带到“人民法庭”上。据报道，集合起来的全体村民都要求处死他，但是主审的法官却把他释放了，因为“他出身贫苦，当警察是为了谋生”。这篇刊登在《解放》上的报道接着还说，警察为这个判决所感动，当即“为革命事业”交了二十个卢比作印度共（马列）基金<sup>⑭</sup>。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件事是值得追述的，它也说明纳萨尔巴里分子对警察的态度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之后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一群对联合阵线政府的警察政策感到愤怒的警察进入邦立法会议大楼，捣毁家具，殴打一些邦立法议员，并呼喊反对左蒂·巴苏的口号。《解放》一九六九年八月号登载了同情示威警察的如下评论：“他们〔印度共（马）〕为了装出一副人民之友的姿态，有时就不得不让普通警察当替罪羊。这再次在普通警察中引起了不满，因为现政权要求他们去干对农民犯罪的各种事情”<sup>⑮</sup>。这里含义是清楚的，即：普通警察也是国家制度的受害者。

查特吉在他的报告中也说马宗达反对在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袭击警察和军队，马宗达的理由是：应当把歼灭“阶级敌人”放在优先地位，袭击国家专政机关会减弱“阶级仇恨”。查特吉在他批判马宗达的文件中，把这一点作为马宗达“左倾偏向”的证据提出来。查特吉声称，尽管在西孟加拉同比哈尔以及奥里萨毗邻的地区谋杀了一百二十名阶级敌人，但由于没有袭击警察和其他国家专政机关的计划，积极分子失去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甚至说，印度共（马列）的领导由于采取鼓励歼灭阶级敌人和阻止袭击警察和军队的政策，实际上奉行着保护国家机器使之不受游击队打击的修正主义政策。查特吉说，“他们没有胆量打击国家机器，还要用难以接受的高调来掩盖他们对敌人的惧怕”<sup>①⑥</sup>。马宗达向查特吉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劝告当然是不符合印度共（马列）支持杀害加尔各答警察的政策，除非是从这一点来看，即：纳萨尔巴里分子甚至在加尔各答也没有袭击警察局或谋杀高级警官。他们除了在袭击贝哈拉简易机场时抢夺了驻守在那里的八名警卫的枪枝之外，并没有在加尔各答地区对警察采取任何惊人的或者特别大胆的行动。

对警察个人进行袭击的结果是适得其反。除了第一次谋杀之后的几个月之外，这种作法并没有能够瓦解警察部队的士气。相反，还使普通警察对一般的左翼分子，特别是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态度更为坚定了，使警察部队增加了许多硬汉。邦内失业者如此之多，要找愿意在警察部队里工作的人从来就没有任何困难。普通市民感到难于理解这些暗杀，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杀人者比穷警察还要富裕，而且警察部队的上层人物安然无恙。普通市民同情受害者，在他们看来，由于杀了警察，所以其后警察对纳萨尔

巴里分子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暴行是有理由的。事实上，谋杀加强了镇压力量，并且为政府实行一整套反民主措施大开方便之门。

加尔各答警察被杀者共有四十五人，民间卫队队员未包括在内。不算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马宗达被捕之后随即被杀掉的两名警察，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第四十三名警察被杀时，实际上杀害警察便结束了⑰。

### 小商人成为“阶级敌人”

除了警察以及各政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之外，纳萨尔巴里歼灭运动的受害者大多是小商人、放债者和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被害者名单中还包括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和贾达夫普尔大学副校长；此外，被害者就全都是普通男女了。许多人注意到：加尔各答财运亨通的商界竟无一人遭到纳萨尔巴里分子杀害或袭击。

不幸成为袭击牺牲品的那些小店主和放债者所以丧命，主要并非由于纳萨尔巴里运动反对资本家，而是由于有关的人未能及时满足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他们提出的经济要求。恩塔利区有一名医生因为不肯向他们缴付五千卢比而被害。许多医生都定期缴付纳萨尔巴里基金，或者为他们免费医治伤员，以免冒出诊时被杀的危险。还有许多律师常常为纳萨尔巴里运动免费效劳和捐款。纳萨尔巴里分子向解放区居民征得的税收有一部分用来购买爆炸物、管枪、刀和其他维持其恐怖活动所需的材料，但是有一大笔钱无疑是反社会分子取用了，后者参加纳萨尔巴里运动，保卫解放区，并征收保护费。纳萨尔巴里分子把到期不交款的人杀死以警告其他捐款者，从而保证基金源源而来。但是也要看到，早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出现以前，有些地区已经有这样的惯例，即：当地店

主要定期向流氓地痞交钱，作为准许他们平安无事作生意的代价。

### 印度共（马）的干部

纳萨尔巴里分子把印度共（马）当作他们在加尔各答的主要靶子。印度共（马）的刊物（《人民民主》及其他）列举了五百二十八名党员和支持者于一九七〇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日在西孟加拉邦被杀，其中多数人无疑是纳萨尔巴里歼灭运动的受害者。为什么专挑印度共（马），而不挑其他党或者商人或者大警官当靶子，这是一个天大的谜。和他们谋杀警察的政策一样，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方面的政策同他们对待其他地方的印度共（马）的态度迥然不同，在其他地方，纳萨尔巴里分子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却不去杀害印度共（马）的党员和支持者。他们的报刊几乎不谈这方面的政策，因此也无助于揭开这个谜。一九七一年年底曾谣传纳萨尔巴里分子（特别是北加尔各答各支部）就这方面的政策作了详尽的自我批评，因为它导致他们去和“比印度共（马）更糟糕”的力量合作。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纳萨尔巴里进攻尚未展开之前，这两派在市內各地就已经发生暴力冲突了，虽然冲突的次数不多，也不激烈。这些冲突到一九七〇年七、八月之后就升级为对印度共（马）的歼灭运动。另一种解释是：和家族内部争执一样，出身于印度共（马）的那些纳萨尔巴里分子自然要对印度共（马）表示更为仇恨，以资证明他们单独存在是有理由的。第三种解释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想通过这些袭击来瓦解印度共（马）的组织，暴露其虚弱无能，并证明印度共（马）作为一个革命党已经破产了。他们希望在印度共（马）垮台之后，他们在加尔各答就

可以从该党得到新干部。无论是在文化革命阶段，还是歼灭阶段，纳萨尔巴里活动所遭到的反对主要均来自印度共（马）。印度共（马）方面有一种解释说：是渗入纳萨尔巴里组织的警察代理人指导对印度共（马）的袭击，这是警察镇压印度共（马）和邦内其他民主力量的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声称，统治阶级只能够用这个办法来制止印度共（马）在群众中的威望继续增长。既然到那时为止，从右面进行袭击没有希望成功，因此统治阶级便从左面进行袭击。他们断言：纳萨尔巴里进攻在第二届联合阵线政府倒台之后才开始，这不只是一种巧合。

不管纳萨尔巴里分子为什么要对印度共（马）的干部采取行动，但是这两个都宣称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总是一件使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以及一般左翼运动在不具有此等信仰的人们的心目中名誉扫地的事情。

### 同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和一九七一年选举

纳萨尔巴里分子很少同印度共（马）之外的其他政治派别发生冲突；而且他们在反对印度共（马）的运动中实际上还得到这些派别的鼓励和支持。一九七〇——七一年，这些势力一致决心不让印度共（马）有机会独自当政。这些党的干部在有些地区同纳萨尔巴里分子积极合作反对印度共（马），例如：贝利亚加塔和希安普库尔的前进同盟，乔拉巴甘的国大党和巴拉纳戈尔的印度共。尽管纳萨尔巴里分子在理论上反对参加选举，他们在一九七一年西孟加拉的选举中却与反印度共（马）的力量合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谨防印度共（马）袭击反印度共（马）阵线的志愿人员”。但是在有些地方，例如巴拉纳戈尔（左蒂·巴苏在那里同得到所有反印度共〔马〕政党支持的阿乔伊·穆克吉竞

选),纳萨尔巴里分子实际参加了游说拉票<sup>⑮</sup>。他们在多数选区都起了“消极作用”,就是说,他们不是实际去为反印度共(马)的各派进行工作,而是不准许印度共(马)在“解放区”游说、张贴标语、审查选举名单,或者召开集会。

结果,在加尔各答东部和北部的多数选区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选民是印度共(马)的选举机构所无法联系的,印度共(马)的人员试图在这些地区内进行选举工作时有二十人被杀<sup>⑯</sup>。同时,其他党派却被允许进入这些地区,其选举活动不受干扰。为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共(马)和对反印度共(马)的力量采取不同态度而辩护的理由是:印度共(马)对他们的革命生存构成最大的威胁<sup>⑰</sup>。许多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小组都害怕由于他们在一九七〇——七一年搞了反印度共(马)的谋杀运动,因此,如果后者于一九七一年经群众选举而当政,就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一九七一年选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有一些非印度共(马)的重要政治人物遭到谋杀,而最初却把谋杀归罪于印度共(马)。前进同盟的一位年高望重的领袖——赫曼塔·巴苏被害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在选举之前不到三个星期,巴苏在一个纳萨尔巴里解放区由他党内一位同事伴陪着正要登上汽车时被八名凶手杀死了<sup>⑱</sup>。但是情况尚未充分澄清时,印度共(马)之外的各党派,以及警察和政府就公开指责印度共(马)进行了谋杀。逮捕的两名嫌疑犯(选举后已释放)被说成是印度共(马)党员,尽管该党已正式加以否认。出殡成了呼喊反印度共(马)口号的竞选大会,各种各样的有广泛影响的通讯工具——特别是报纸和广播,都用来把印度共(马)描绘为搞谋杀的党<sup>⑲</sup>。纳萨尔巴里



分子一反其以进行政治谋杀为荣的常态，一直闷声不响。这一切都制造了罪责确在印度共（马）的印象。印度共（马）在加尔各答地区遭到失败（只赢得六个席位），未能在一九七一年选举中（同其伙伴——社会主义统一中心和革命社会党一起）获得绝对多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次谋杀。选举刚一结束，真相就大白了，杀害巴苏的八名凶手全部都是该地区知名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印度共（马）的领导人把赫曼塔·巴苏谋杀案和三十年代德国纳粹自己放火烧德国国会却归罪于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相比<sup>②③</sup>。

还有其他一些与各自地区的纳萨尔巴里积极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的、非印度共（马）的知名人士在选举过后遭到了谋杀。赫曼塔·巴苏死后接替他在希安普库尔任候选人的另一位前进同盟领袖阿吉特·比斯瓦斯在前往同纳萨尔巴里分子谈判时被杀。据说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他没有使他们一些遭警察拘留的同志获得释放感到不满<sup>②④</sup>。从乔拉巴甘选出的著名的国大党邦立法会议员，尼帕尔·罗易同包括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在内的许多纳萨尔巴里运动领袖都有密切关系，他是在同当地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发生某些争执之后死去的。

### 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结局

选举过后，纳萨尔巴里分子同反印度共（马）的各派之间的联盟就受到了压力。报道说，有些地方纳萨尔巴里分子同这些派别发生了冲突。加尔各答各派力量相互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九七一年六月，居住在解放区的一名国大党青年领袖——纳拉扬·卡尔遭到纳萨尔巴里分子谋杀<sup>②⑤</sup>。据报道，卡尔曾与该地区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不时帮助他们设法使遭警察拘

留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获释。谋杀他的人就是原先和他友好相处的人，有些凶手原先正是经他设法获得保释的。谣传卡尔尽管在国大党组织内颇有影响，但他未能更多地为纳萨尔巴里分子效劳，因而得罪了他们。

这次谋杀发生的时候，当政的是国大党领导的政府。但是青年国大党发出罢工的号召，并向政府发出要它下台的七十二小时最后通牒，理由是政府未能制止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暴力<sup>②⑥</sup>。限期未滿，政府就辞了职，西孟加拉邦在不到三年之内又第三次置于总统治理之下<sup>②⑦</sup>。几乎与此同时，青年国大党的武装人员袭击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贝利亚加塔——卡尔遭谋杀的地区中的据点。据报道，其它地区也发生了类似冲突，除印度共（马）之外，还涉及达姆达姆的前进同盟和巴拉纳戈尔的印度共等其它政党。

这一系列冲突的高潮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科西普尔——巴拉纳戈尔的可怕的屠杀。据报道，那几天约有二百至三百名武装人员把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这个据点扫荡数小时之久，搜索纳萨尔巴里分子并加以杀害。官方估计死者有十八人，非官方数字则为七十至一百人。有些受害者遭严重刀刺后被投入河里，事件过后数天仍可见恆河上漂浮着尸体<sup>②⑧</sup>。这事件中的伤亡者只有一人不是纳萨尔巴里分子，他是开办一所体育中心的国大党工作人员，此人遭纳萨尔巴里分子谋杀是这一場聚众暴乱的导火线<sup>②⑨</sup>。国大党之外的所有党派都要求调查这一事件，他们指控警察把该地区各个出口处封锁了十二个小时，从而参与了这一事件。继这次事件之后，青年国大党指挥下的武装打手把原纳萨尔巴里解放区一个接着一个地接管了。到十月份，最后一个纳萨尔巴里据点被拔除，各地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均四处逃亡。

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曾依靠游民来维持对他们地区的控制，因此，游民分子转而效忠于国大党（一九六七年以前，国大党一直是游民的传统保护人），就使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据点更容易地转变为国大党的据点。国大党在一九六七年选举中溃败之后，许多游民分子寻求并接受包括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内的一些左翼党派的保护，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七〇——七一年把大多数游民争取到他们一边。国家内政部国务部长K·C·潘特一九七一年七月向国会发表的声明提到纳萨尔巴里分子同政府当时正在进行的“对话”，并且断言他不相信“一旦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就永世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理论。内政部的一份报告也说，有一部分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七一年选举之后跑到国大党那边去了<sup>⑩</sup>。许多地区的纳萨尔巴里积极分子，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政治颜色。有人看到曾经在加尔各答大街道的墙壁上写“毛主席万岁”的人，就是现在写“甘地夫人万岁”的那些人<sup>⑪</sup>。

国大党有组织地接管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解放区之后，所剩无几的纳萨尔巴里组织又由于警察不断袭击和逮捕思想坚定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而进一步动摇了。他们的组织有这末多积极分子变节，因此，警察根据变节分子所提供有关其隐藏所、无线电站、临时武器库和医院的详细情报，追捕其他成员就很容易了。他们邦组织的书记萨丹·萨卡尔以及阿希姆·查特吉被捕了；《解放》的编辑萨罗杰·杜特疑为在警察拘留中被杀<sup>⑫</sup>。最后一个遭逮捕的领袖——查鲁·马宗达也在警察拘留时死去。据悉马宗达在被捕之前正在准备一份供党员传阅的文件。据报道，他在这份文件中评论说：“歼灭制运用过火，犯了许多错误。党内对此意见很多，将作出修正”<sup>⑬</sup>。马宗达一死，运动的脊梁骨就彻底折断

了。

虽然本章所谈主要是加尔各答发生的事，但各县也采取了类似方式来消灭纳萨尔巴里分子。豪拉各地的解放区（例如西布普尔和拜沙纳布帕拉），24区县（仅举巴拉萨特、巴希拉特，巴拉纳加尔、贾达夫普皮尔和哈布拉等少数几地区）和纳迪亚（克里希纳加尔），以及其他县的解放区都遭到大规模的袭击，最后均被忠于国大党的派别接管了。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力量弱小而国大党早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就建立自己的解放区的布德万国大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在全邦各地，青年国大党起而在政治上起突出的作用。

## 第二节 积极分子和支持者

加尔各答的纳萨尔巴里积极分子主要有三种人——大学生、退学学生和游民分子。大学生一般都出身于中等阶级上层而游民无产者则多数来自城市贫民区，这两种成分代表了两个形成对照的社会经济阶级。上学的少年则处于中间地位，他们多数出身于贫苦和中等阶级下层的家庭。然而这只是个粗略的概括，是根据同这三类人有直接接触的人所提供的已知的实例和报告做出的。确定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阶级成分的一个办法是对警察拘留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调查。根据警察对三百名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的一项调查，他们之中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很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大学生，约有百分之十六是退学学生。三十岁以上者只占百分之七，二十岁以下者有一半人。和人们的看法相反，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是难民家庭的子弟，其中又有一半人是在东孟加拉难民

力量涌进来之前就来到加尔各答的。调查还说明，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以前有犯罪的记录。但是无法得知这三百人的例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干部的状况，也无法得知这项调查报告的精确程度如何。以下几段是根据个人的了解以及同知情者谈话得来的有关纳萨尔巴里运动积极分子的情况。

虽然“优秀的”大学生在纳萨尔巴里运动早期——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起义以及文化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但是歼灭运动开始之后，他们就退到后面去了。谋杀小队的人员除少数之外都是十几岁的新手，而占领和保卫解放区的能手则属那些反社会分子。

### 退学青少年和在学青少年

和优秀的大学生相比较，退学的青少年一般在学业上都是很差的<sup>⑤</sup>。纳萨尔巴里运动则使他们有了一种自认为重要的感觉，有了一种加入了一个大组织的感觉，有了一种意识形态——不论他们对它理解得多么不完全。过去的学生运动只限于大学生。除了一些有关中小学的大范围问题之外，加尔各答的学生组织对中、小学生实际上是忽视的，而纳萨尔巴里分子却对这些学生表现了少有的兴趣，这种政策在扩大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组织和影响方面无疑收到了极大效果。

纳萨尔巴里分子能够吸引青少年参加他们的运动，可以说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这个运动使退学青少年感到自己重要。在重视权威的印度社会结构中，主宰社会关系的是尊重长者的原则，年幼者无权决定任何事情。少年不断遭到压制和受人支配——在家是受长辈的压制，在本地段是受比他大的少年的压制，在学校则是受老师的压制和支配。这使他的个性或是不能发展，

或是变成畸形。这个少年一旦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他周围的人就全都怕他了，他就成为人们谈论的人物，就可以命令其他人作他认为该作的事情了。

第二个因素是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行动方针”。纳萨尔巴里分子给学生安排了一整套行动——例如袭击校长的房间并且捣毁其家俱，组织对学校考试的抵制，以及最后是参加谋杀小队的行动。其他一切党派简直都不可能如此大胆、残忍、蛮干。这些少年荒废了学业，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就业的机会，但是他们还没有背上家庭负担。他们在一九七〇——七一年进行谋杀时的虐待狂使许多人为之震惊，他们平均对每一名受害者要杀伤大约二十处。但是，这难道真是如此令人惊奇的事情吗？一九四六——四七年加尔各答教派暴乱中，也可以看到青少年杀人者有同样的现象。青少年对暴力的崇拜也并非加尔各答所特有；西方世界的“快乐——美丽——音乐”、“地狱天使”以及“魔鬼的门徒”，在其成员的年龄以及对暴力的态度和兴趣方面，都和加尔各答的青少年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什么两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青少年追求暴力的欲望，都是由于报纸上对暴力事件所作的淋漓尽致和幸灾乐祸的报道而不断培养起来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还有一种竞赛的特色；如果贝利亚加塔的小组能够杀死这么多人，我们这些在希安普库尔的人为什么不能干得更漂亮呢？参加这些活动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这也是需要肯定的。运动的性质既然如此，只要有一小撮青少年就足以造成纳萨尔巴里分子所曾造成的那种影响了。但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只招募了干这行的少数几个能手。

这种青少年分子参与纳萨尔巴里运动使运动意想不到地增添

了战斗性。在用“赤色恐怖”反对被称为“白色恐怖”的运动中，这些青少年（同反社会分子一起）成了主要的工具。没有他们参与，运动会失掉其活力、势头和进取性。但是这些突击队也是运动的主要弱点。他们的鲁莽轻率堪与他们对运动思想内容的无知相比。他们首先是忠于行动，忠于本派，但把本派的意识形态置于次要地位。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少年积极分子被严禁同外人进行讨论，领导所切望的是保护其干部不为异己思想所污染。

同时，孤立的暴力行动也难以保持他们的兴趣了。有些青少年与同年龄的反社会分子发生密切联系——有时这两种人是无法区分的——，在为运动执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还去搞捣毁车厢这一类的活动。既然这些人不明白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们有时就会参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上级所不同意的谋杀。而且，在沒有健全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始终存在着运动会以一些重要人物为中心而分裂为几派的严重危险（类似恐怖主义派别在英国统治时期的遭遇那样），并会堕落为这些派别之间的帮派搏斗。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火器，又没有思想信念，没有对杀害个人的约束，所以甚至连单纯的争论都很容易变成干部之间的武力冲突。一九七〇——七一年西孟加拉发生的一些谋杀，毫无疑问，就是该运动各对立派别之间暴力冲突的不幸结果。最后，这些青年人的小组既然不能同老百姓联系，或用说服的办法把老百姓争取过来，因此，他们是不能胜任组织人民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参加运动使舆论对运动不利。

由这些青少年站在运动的前列，运动就具有了一种城市恐怖主义运动的形式，其纲领中很少有马克思、列宁或毛的痕迹。同时，

不能否认，由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政治路线，由于强调个人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由于采取歼灭阶级敌人的纲领，以及由于宣传扩大赤色恐怖的必要性，因此，这些鲁莽的青少年站到了运动的前列。他们证明自己在执行根据这条政治路线而提出的任务方面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能干。他们的不顾一切、胆大包天和狂热是政治水平较高的出身优越的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青少年杀人者参加运动之后造成运动堕落和混乱，对此，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导人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 游民分子

反社会分子通过几种方式来帮助纳萨尔巴里运动。他们变成了纳萨尔巴里分子获得隐蔽的工厂所制造的刀、剑、管枪和炸弹（炸弹要少些）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反社会分子中许多人的活动是破坏货车，所以他们实际上控制了穿过这个城市东部主要铁路两旁的地区。饶有兴趣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据点多半都在铁路线两侧。在纳萨尔巴里分子为了控制这些地区而同印度共（马）的支持者进行的激烈冲突中，货车破坏者的战略性支持是有决定性作用的<sup>③⑥</sup>。有时破坏货车的人和青少年是很难加以区分的，因为在破坏货车的人中间，那些在“前线”工作的人一般都和青少年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年龄一样。

人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反社会分子参加被称为革命运动这件事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反社会态度是他们在其中出生和成长的阶级社会的产物。他们并不比例如以更有害的方式去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比尔拉或塔塔更为反社会。在某些场合，这部分人在同当局的冲突中，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不顾一切的精神，这也是事实。这部分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没有什么前途，



对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有仇恨和鄙视。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六年的粮食运动中，他们在和军警的对抗中起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部分人的参加，对任何运动中的干部都可以产生腐蚀的效果。这些反社会分子中的一些人，在被吸收参加运动之后得到改造，并证明自己是具有好品质的好同志。就他们来说，除了从流氓主义的岁月保留下来的战斗性和活力使他们作为革命者的品质更加生色之外，他们的反社会的过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就那些甚至在参加了运动之后仍未能同反社会活动切断关系的人说，他们的参加则会对干部的组织纪律和思想统一产生有害的后果。这些人是被社会所排斥的人，他们同社会（包括人民在内）的疏远，是彻底的。他们不是适合于鼓舞群众参加革命的那种人。

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即不是运动吸收这些反社会分子参加到组织里边来，从而改造他们，反而是这部分人把运动接过去，并使之为其目的服务。这正是加尔各答纳萨尔巴里运动所发生的情况。反社会分子利用它来掩护他们的邪恶活动。他们和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联系使他们感到心安理得，并为他们继续进行罪恶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此外，在他们对解放区保持控制的同时，他们向当地居民征收保护费，而这些钱则大半被他们自己占用了。这是他们参加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动力。许多观察家认为，由于这些游民分子和城市的警察有密切联系，他们比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其他人更能成功地躲避警察和中央后备警察在解放区的扫荡，而更认真的和思想坚定的人则会被抓起来。

## 工人阶级

纳萨尔巴里活动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他们几乎不设法争取工人阶级或者拿薪水的中等阶级参加他们的运动。马宗达用这样的话恰当地总结了印度共（马列）对工会的态度：“我们的任务既不是组织工会或者把它们置于我们控制之下，也不是为工会选举操心”<sup>③⑦</sup>。他在另一处又说：“只有当国内不存在革命形势，当资产阶级看来十分强大而无产阶级认为自己非常弱小的时候，工会才是训练无产阶级的学校。”他说，在革命形势下，没有必要去参加工会斗争，从而不必要地浪费党的工作人员的精力和时间。由于印度共（马列）认为印度的形势对革命有利，工人阶级在同统治阶级对峙中是强大的，因此它劝工人立即参加革命运动。这个政策和纳萨尔巴里分子对群众组织的看法，即应当撤销群众组织、优先搞建党活动，是一致的。

但是，尽管说工人阶级是强大的，“今天以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武装起来的印度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sup>③⑧</sup>，但工人阶级和纳萨尔巴里分子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内部，党的领导人同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和阿希特·森等工会工作者之间的一个主要争执问题，就是运动对工会的冷淡态度，这最后导致森的退出组织<sup>③⑨</sup>。马宗达之所以反对工会，除了已提出的理论问题以外，还因为工会是在“修正主义领导”之下，而他却找不到赶走这些领导人的办法。虽然党的纲领提到“工人阶级领导”，但这仅仅是形式上表示忠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的作用的正统观点而已。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武装的农民起义，而工人阶级的任务则限于“开展支持革命阶级（主要是农民）的革命斗争的支援行动，以及派遣其有阶级觉

悟的先进部分去组织和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sup>④</sup>。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工会的冷淡态度有时竟发展为对解放区工厂工会的敌视。有几次他们竟然捣毁了印度共（马）控制的工会，例如贝尔加奇亚牛奶场的工会，并且对印度共（马）领导下的工人所组织的罢工和抗议从来没有表示过支援。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思想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纳萨尔巴里分子不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反而提出了旨在吸引加尔各答人数众多的、日益增加的失业青年的口号。有些口号提出了开展反工会运动，这些工会多半是在印度共（马）的领导下，它们鼓励“经济主义”，只关心其会员的福利。他们责备工会忽视没有任何就业机会的广大人民。这个口号的意图在于把加尔各答的失业青年团结在运动周围<sup>④</sup>。

在某些地区，纳萨尔巴里分子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即在同一个家庭里，丈夫和妻子不应当两人都工作，如果两人都已经工作的话，那么其中一人就应该辞职，为失业的人让出位置。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要说明纳萨尔巴里分子是失业青年的支持者，虽然它也有经济主义的味道，而且从社会意义来说，它肯定是一个倒退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实行起来是不利于劳动妇女的。

### 中等阶级

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他们的农村计划失败后之所以开始在加尔各答进行活动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的干部能够在他们所熟习和了解的中等阶级中开展活动。

起初，纳萨尔巴里分子赢得了这个城市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这个阶级把纳萨尔巴里分子看作是具有勇气和信念、不考虑个人前途甚至自己

生命、为一个高尚事业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青年人。孟加拉的恐怖主义历史——每一个孟加拉人都为之感到自豪——，也有利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同中等阶级中的这部分人在感情上的结合。

中等阶级中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些人感到难于为这个运动的许多行动辩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向纳萨尔巴里分子表示同情。下面是这种支持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这个作者被问及他相信哪个方向，他将依靠本能和感情而不是理智来回答：未来是属于纳萨尔巴里分子所主张的斗争路线的，虽然他难于对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如在大学里爆炸炸弹或爆竹，作出合理的解释”②。

对孟加拉中等阶级中支持纳萨尔巴里主义的许多人来说，纳萨尔巴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思想还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方式。在他们看来，纳萨尔巴里主义意味着某种激烈的、强大的东西，某种能够摧毁他们认为已腐朽不堪的现存社会结构的东西。闻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如B·M·比尔拉、普拉富拉·森和阿乔伊·穆克吉发表过如下声明：“有时我自己也想要变成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或者“如果我现在还年轻的话，我会变成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的”③，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思想内容比其活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些人甚至在不留神的时刻也从来没有企望成为共产党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公开宣布过他们对共产党人在感情上的依恋。他们公开表示要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愿望，是想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印度现状的绝望心情和强烈情绪。

然而，这种支持多半是虚伪的。只有在同情者自己不受纳萨尔巴里运动影响的情况下，他们才给予支持。只要纳萨尔巴里运

动没有强大到足以破坏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地步，上层商业管理人员、有学问的教授和高级官员对纳萨尔巴里分子便只表示同情和赞扬。

学业差但是狂热而残忍的退学学生取代优秀的大学生而成为运动的主要成份，以及他们和反社会分子公开结成联盟，是造成纳萨尔巴里运动终于同中等阶级疏远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积极分子所实行的不同群众交往的政策。这些积极分子和具有高度表达能力的先进的大学生不同，他们拒绝参加关于运动的目的和纲领的讨论。中等阶级也因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个人暴力行动而感到震惊和迷惑。只要纳萨尔巴里分子仅仅空谈革命，不去做超出在墙上写写标语之类天真的事情，或者不去做袭击校长办公室之类更有战斗性的事情，中等阶级中的这部分人是不难采用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语言的。但是，杀人的行为不仅使他们万分惊恐；而且他们也感到难于把这些行为和他们心目中的那些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的和生气勃勃的青年人的形象联系起来。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一般采取不相往来的政策，他们听不到纳萨尔巴里分子为这些杀人行为所作的辩护，他们的思想便被这些事件弄得更加混乱了。他们在私下议论中不断相互问这些问题：为什么纳萨尔巴里分子杀死交通警察，毁坏伟大的孟加拉人的塑像，并说中国的主席也是印度的主席等等。他们还问：参加杀人的这些小伙子是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学会杀人术的，他们怎么能以这样残忍的方式去杀害别的人。

那些住在被认为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据点的地区的人，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积极分子有更多的直接感受。他们也在许多方面受到损害：出租汽车不愿在他们的地区营业；他们的亲戚朋友不愿

去看望他们，因为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天一黑下来，商店和其他公共事业就关门；此外，由于住在这些地区，他们不得不付保护费。他们在恐惧中生活，特别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纳萨尔巴里分子，不了解他们的目的，或者他们是如何选择其打击对象的，这就使他们更为恐惧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会使纳萨尔巴里分子敌视他们的事来。对他们来说，纳萨尔巴里分子不是他们可以信任和依靠其帮助的革命先锋队。他们是一支实际控制该地区的占领军。

### 第三节 其他政党的态度

在加尔各答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这个特定阶段有一个饶有兴趣的方面，那就是其他政党对它的态度。最大的政党——印度共（马）对它是敌视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党之间的冲突是那个时候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将在本节回顾一下其他主要政党对纳萨尔巴里分子活动所采取的立场。

纳萨尔巴里事件发生的时候，除了印度共（马）之外，所有主要政党都谴责这次起义，主张用警察行动对付它。他们怀疑纳萨尔巴里分子是印度共（马）的武装人员，怀疑印度共（马）在保持议会门面来欺骗政府的同时，正在计划一次武装暴动<sup>④</sup>。当时的首席部长阿乔伊·穆克吉责备印度共（马）反对用警察行动对付纳萨尔巴里分子，还谴责它同中国密谋接管这个边境地区的政府<sup>⑤</sup>。

在印度共（马）和纳萨尔巴里分子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以后，反对印度共（马）的各政党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态度有了变化。

印度共的立場是几个这样的政党所采取的立場的典型。印度共一方面表示反对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情况所作的阶级分析，也反对对其武装斗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却不责备纳萨尔巴里分子参加暴力行动。它反而责备印度共(马)制造了“暴力气氛”导致了纳萨尔巴里派的成立。由于印度共(马列)领导人和一部分干部先前曾经是印度共(马)党员，因此印度共指出纳萨尔巴里主义的成长是印度共(马)所实行的“冒险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政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刊物不时地刊登对印度共领导人如什·阿·丹吉和英德拉吉特·古普塔的批评，但这些都未能激起印度共对纳萨尔巴里分子展开任何公开论战。党的领导人干脆不理睬这些评论。

在实际问题上，印度共用许多方式来帮助纳萨尔巴里分子，如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安排保释，并在他们遭受警察暴行之害时，出来公开保卫他们的民主权利<sup>④⑥</sup>。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声称纳萨尔巴里分子不应对暴力负责，责任主要在印度共(马)身上，这样，他们就为纳萨尔巴里分子创造了良好的公众关系。很清楚，印度共把纳萨尔巴里分子看作一支能够破坏或分裂在西孟加拉日益壮大的印度共(马)组织的力量<sup>④⑦</sup>。因此，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谴责纳萨尔巴里分子宣扬“政治谋杀”和“个人恐怖主义”，但他们对印度共(马)却不难提出这样的谴责。在一九七一年选举中他们在巴拉纳加尔、贾达夫普尔和托莱冈吉等地区和纳萨尔巴里分子密切合作，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帮助对于使印度共(马)的志愿人员离开这些地区是有极大用处的。据报道，虽然在选举期间和选举以后印度共和印度共(马列)的干部之间曾在地方上发生过几次冲突，但任何一方都没有让形势发展到失去控

制，而是友好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除印度共（马）外，其他政党总的说来也采取了印度共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路线。前进同盟的工作人员，在诸如加尔各答的贝利亚加塔、乔拉巴甘和希安普库尔以及二十四区县的巴拉萨特等地区同纳萨尔巴里分子密切配合工作，并给他们以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有一、两次，纳萨尔巴里分子和前进同盟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还有一次，加尔各答市议会的一位属于前进同盟的议员在选举日遭到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毒打，但双方的领导人都没有让形势恶化下去。赫曼塔·巴苏被谋杀，也在前进同盟的工作人员中引起很大混乱。一部分人认为巴苏是被印度共（马）谋杀的，并要求对该党采取报复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干的，他们在几个地方——如达姆达姆——和印度共（马）的工作人员一道对这次谋杀表示抗议。第三部分人确信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杀害了他们的领导人，但是，由于已临近选举，而他们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是印度共（马），他们就决定故意利用这次谋杀作为反对印度共（马）的宣传武器。

然而，在前进同盟的另一位领导人阿吉特·比斯瓦斯在同一地区被谋杀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出，比斯瓦斯是被纳萨尔巴里分子谋杀的，那天他曾去和他们交换意见。前进同盟的工作人员列队跟随在比斯瓦斯的遗体后面，他们高呼口号，指责阿乔伊·穆克吉和国大党领导人比乔伊·辛格·纳哈尔和这次谋杀有牵连，因为他们约束不了纳萨尔巴里分子。从此以后，前进同盟工作人员在一些地方就和印度共（马）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抵制纳萨尔巴里分子扩大其控制地区的活动。

另一个大党，孟加拉国大党对纳萨尔巴里分子采取了两面政



策。在该党的据点米德纳普尔县（在这个县，该党的基础是富农，该党领导人不能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农民起义纲领表示任何同情。事实上，阿乔伊·穆克吉（他自称是甘地和非暴力的信徒）在米德纳普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村民围捕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把他们交给警察之前先割掉他们的耳鼻。但是，穆克吉在加尔各答（在这里，他正在一个大部分处于纳萨尔巴里分子控制下的选区内和左蒂·巴苏竞选）发表的一些演说中，却把纳萨尔巴里分子描绘为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生气勃勃的青年人，虽然眼下他们被引入歧途了。在纳萨尔巴里起义的时候，穆克吉谴责印度共（马）保护纳萨尔巴里分子，使他们免遭警察行动之害，但在几个月之内他的态度就变了，到一九七〇——七一年，在印度共（马）非难纳萨尔巴里分子时他就为后者进行辩护了。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主要的非印度共（马）政党，对纳萨尔巴里分子都采取了类似的态度。但那些和印度共（马）在多数问题上联合一致地进行工作的政党，即印度革命共产党、印度革命工人党和前进同盟（马克思主义）则是例外。如果我们粗略地看一看各非印度共（马）政党的领导人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评论，就可发现这些评论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所用的词句实际上都相似得惊人。例如，几乎所有这些政党的领导人都发表过下面这样的一个或两个声明：（1）“如果我还年轻的话，今天我会是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2）“纳萨尔巴里分子是孟加拉青年的精华”。各政党，从人民同盟（哈里帕达·巴拉蒂）和国大党辛迪加派（普拉富拉·森）到统一社会党（卡希坎塔·莫伊特拉）、孟加拉国大党（阿乔伊·穆克吉）和印度共（希伦·穆克吉）都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如果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得到过其他主要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鼓励（直接的或含蓄的），如果他们遭到了印度整个政治界的反对，对他们说来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很难推测的。但是，在一九六七——一九七一年期间，所有这些党都拼命反对印度共（马）而不反对纳萨尔巴里分子，这一事实恰好证明：对他们来说，印度共（马）构成的危险比纳萨尔巴里分子更大。这些党把印度共（马）及其在各地区的发展看作是对他们的影响和组织的一个严重威胁，而把纳萨尔巴里分子看作是他们可以用来约束印度共（马）发展的一个武器。奇怪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他党在毫不犹疑地反对印度共（马）的时候，却对他们采取庇护的态度，这是出于什么动机。

国大党（除印度共〔马〕外，它是最大的政党）象其他政党（印度共〔马〕除外）一样，在最近四年中他几次改变了它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态度。起初，它给纳萨尔巴里分子戴上印度共（马）的武装代理人的帽子，但不久以后，它就采取了同印度共路线十分接近的立场，即认为纳萨尔巴里主义和暴力行动主要应由印度共（马）负责。执政的国大党多数领导人，从全国一级的英迪拉·甘地到邦一级的比乔伊·辛格·纳哈尔，都对纳萨尔巴里分子采取保护态度，把他们描绘为理想主义的但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纳哈尔在由纳萨尔巴里分子领导的比尔布姆农村起义时访问该县以后，于一九七一年年中所发表的声明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几乎所有的加尔各答报纸都广泛地登载了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比尔布姆县进行活动的报道，他却声明比尔布姆没有纳萨尔巴里分子，该县的暴力行动主要应由印度共（马）负责。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联邦内政部国务部长 K·C·潘特发表了两个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声明（已在本章前面引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到当时为止一直在纳萨尔巴里分子指导下工作的一大部分反社会分子转变立场，跑到青年国大党那边去了。在这事之后，这些声明的意义就变得清楚了。青年国大党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以后的几个月中，参加了许多次反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行动，并牢牢地控制了先前人所共知的由纳萨尔巴里分子控制的地区。

#### 第四节 结 束 语

给城市和工会规定什么任务，始终是纳萨尔巴里运动内部的一个有争论的重要问题。但是争论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起初，阿希特·森和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埋怨说，革命派在城市和工厂中的任务在组织农民武装土地暴动的名义下被忽略了。阿希特·森特别反对派遣学生到农村去，而赞成在城市发动局部的和经济性的斗争，使工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先锋队的作用。在阿希特·森看来，运动中存在着工人阶级受制于小资产阶级的现象，他对此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印度共（马列）则否定了这些批评意见，认为它们是违背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的思想的，而且是鼓励经济主义的。马宗达曾宣称，必须把党的建设而不是把工会放在优先地位<sup>④</sup>。

一九七〇——七一年间，当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加尔各答和周围地区开始活动的时候，城镇的作用和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又一次成了争论的题目。但这一次却是另一方批评党的领导人放弃了农

村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武装斗争。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一直到死都正同这条路线进行斗争<sup>⑩</sup>。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则批评在城市开展歼灭运动和提出在城市夺取政权的政策。在他和比哈尔的组织看来，这些政策是不符合持久游击斗争和以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对于主张在城市和农村都采取进攻性战略而不考虑到这两个地方革命的不平衡性的那些人，比哈尔组织是持批评态度的。这个组织也要党的领导人对在农村工作的青年加以指导，而不要一切都任其自流。马宗达在回答这些批评时，强调这些活动有利于吸收干部从事农村工作，但他的话只到此为止<sup>⑪</sup>。

印度共（马）的批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正被政府利用来分裂和破坏邦里的左翼运动和加强它的镇压权力。他们问道，否则，为什么要把印度共（马）而不是国大党的工作人员，要把小商人而不是大商人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呢？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为政府提供了各种借口，使它可以重新实行预防拘留和恢复一项英国统治时的反恐怖主义法，使它也可以推迟选举，并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邦里实行总统治理。

毫无疑问，这些活动有助于政府以镇压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名义建立某种“警察统治”。除了数以千计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拘留以外，还有更多的人在捏造的罪名下被捕和被关押六个月以上。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抓起来作为人质，因为警察正在搜捕他的两个哥哥找不到了。据说有时一个人会由于一系列罪名被捕，“拘留审查”几个月，然后释放，但旋即由于另一系列罪名而再次被捕。据说还有这样的事：有些人刚被释放就在法庭外面被捕了。

比这更为严重的是，警察拒绝对被警察枪杀或在警察拘留下发生的死亡事件由行政方面进行调查。通常对被捕以后发生的死亡事件的解释是：（1）死者自杀了；（2）死者已经被释放，以后警察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3）他是在警察牢房里被同狱犯人杀死的；（4）他是在设法逃跑时被枪杀的；（5）被捕的人同意给警察领路，到纳萨尔巴里分子躲藏的地方或者堆放武器的地方去，但在路上警察遭到被捕者朋友们的伏击，在双方交火时只有犯人被打死。这些借口出现得那么经常，以致它们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警察残忍地杀害了这些人，以避免法庭起诉的麻烦。有一次，一大批年轻的纳萨尔巴里分子深夜里在加尔各答东部的贝利亚加塔的CIT建筑物群中被围捕了，其中有四人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地方被枪毙了。另一次是在同一地区（乔拉曼迪尔），有五个人在一幢房子里被捕，但其后不久他们便在神秘的情况下死去了。还有约七十多人在监狱里死了，但警察却说这些人是在图谋越狱时死去的，或者是因为监狱里两部分犯人之间发生冲突时死去的。

警察在一九七〇——七一年期间经常的做法是在中央后备警察的帮助下，用警戒线围住一个地区，然后进行他们所谓的“扫荡”，使大批无辜的青少年遭受逮捕和暂时的折磨。在这些扫荡继续进行的时候，住在“解放区”内的人们常常说，应对制造恐怖负责的反社会分子总会得知扫荡的消息，在警察来到他们的地区之前就跑掉了。还有一些人相信如下“阴谋论”，即一九七〇——七一年期间在纳萨尔巴里主人名义下干的事情是由政府（通过其秘密联系渠道）秘密指导的。他们说：政府是在设法使纳萨尔巴里分子同印度共（马）相斗，相互摧毁，并使全体马克

忌主义者公众心目中名誉扫地。他们还说，警察只是挑中那些忌想坚定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而不是那些在解放区以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名义下搞谋杀和勒索保护费的人。他们还看到政府的手伸进了纳萨尔巴里分子之间日益增长的派别冲突。这些指责是无法核实的，但是政府的态度却无助于辨明真相。例如，令人迷惑的是：尽管警察加紧了行动，但为什么不能使一九七〇——七一年期间的谋杀案件数——有时一星期竟高达六十起——减少呢？又例如，为什么对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千多起谋杀案的绝大多数不进行适当的调查呢？当许多人不经过审判或以各种罪名而被拘留的时候，为什么警察在仅仅对少数几个案件进行调查之后就能对被告开始法律起诉呢？为什么政府对在科西普尔—巴拉纳加尔大屠杀发生时不进行干预的有关警官不采取严厉行动呢？有一天早上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巴拉萨特城里发现了八个青年人的尸体，他们又是被谁杀害的呢？“阴谋论”的支持者不肯接受关于警察不能把罪犯缉拿归案主要是由于他们无能的做法。他们争辩说，那么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警察为什么能在几个星期之间就把局势控制起来了呢？西孟加拉现任首席部长西达尔达·尚·卡尔·拉伊拒绝对这些谋杀案进行调查这一事实，证实了这样的怀疑：杀人犯多半得到国大党的庇护，进行调查就会暴露这个阴谋。

无论阴谋论是否有什么事实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这一点），但事实却依然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七〇——七一年间的进攻的最终结果是加强了政府和执政党，而削弱了左翼力量。

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这个特殊阶段，通常还有两个严厉的批

评。一个是：纳萨尔巴里分子采取了谋杀个人的政策和制造了恐惧气氛，因而使普通人民厌弃群众活动和政治。在联合阵线政府当政的日子里，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参加几乎任何示威或游行，还有更多的人会热情地参加各种群众组织，但歼灭运动在这个城市开始以后，这种反应就被恐惧和冷漠所代替。始终以爱好谈论世界上一切事情（特别是在公共汽车和公共交通工具上谈论）闻名的孟加拉人，现在则特别沉默，不愿在公共场合发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见解。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已达到挫伤群众对政治工作的热情的程度，这就等于是统治阶级的一个胜利。统治阶级利用了这个阶段人民的冷淡态度，通过了预防拘留法和建立起警察统治，而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这个邦的倾向民主的人民在决意反对统治阶级方面是团结一致的话。

另一个批评是：他们在一九七〇——七一年的残酷的谋杀运动使个人恐怖合法化。所以当纳萨尔巴里分子自己成了恐怖主义进攻的对象时，他们便不能从人民那里得到保护。在这些日子里，在纳萨尔巴里分子遭受最厉害的警察镇压的同时，其他左派政党，包括印度共（马）在内，也未能幸免。目前，由于预防拘留而被关押的四千名犯人中，大约有二千五百人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其余的都是属于印度共（马）的。这个城市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最后结果是：到了一九七二年初，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经被消灭了，并且被青年国大党所代替，而一九七二年青年国大党向所有左翼力量开展了空前未有的恐怖运动。青年国大党现在已在这个城市里牢牢地建立起来了，镇压也正在继续进行。

## 注 释

- ① 桑乔伊：《坦白地说》，《新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日。
- ② 《新地》，一九七一年二月六日，《谁干的》。
- ③ 桑乔伊：《坦白地说》，《新地》，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还可参看第二章第一节。
- ④ 参看第二章关于“比尔布姆起义”一节。
- ⑤ 根据各日报登载的报导。
- ⑥ 一位观察家写道，“孟加拉正在迅速地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人民可以由于最细小的原因被杀害，在这里，大批在杀人方面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到处走动，他们是那么缺少正常人类感情的人，以致他们可以以最可怕的方式在被害者的妻儿面前杀人，把刀子扎进他的身体，拔出来，又一次扎进去，这样大约干五十次，而对这样造成的血淋淋的场面或妻儿产生的反应，却丝毫不动于衷，……这是十足的野蛮行为，原始的杀戮欲和虐待狂。”（克·克·梅农：《一宗谋杀案的剖析》，《新地》，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 ⑦ 《加尔各答的城市游击队》，《经济和政治周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
- ⑧ 《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月。
- ⑨ 《自由新闻杂志》，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爱国者报》，一九七〇年十月；苏曼塔·班纳吉：《处于前夕的西孟加拉》，《新地》，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
- ⑩ 阿索克·鲁德拉：《杀人犯接管》，《经济和政治周刊》。
- ⑪ 苏曼塔·班纳吉：《处于前夕的西孟加拉》，《新地》，一



九七〇年八月八日。

- ⑫《加尔各答的城市游击队》，《经济和政治周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
- ⑬参看《镜报》。
- ⑭《解放》，一九六九年六月。
- ⑮《解放》，一九六九年八月。
- ⑯参看第五章。
- ⑰《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甘露市场报》，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 ⑱《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向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详细访问记为根据的报导）。
- ⑲《人民民主》，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 ⑳《印度斯坦时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 ㉑《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参看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八日同一报纸上关于反对印度共（马）的运动的报道。
- ㉒同上。
- ㉓《人民民主》，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力量》，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二十八日。
- ㉔《爱国者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镜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 ㉕《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三十日。
- ㉖同上。
- ㉗《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 ㉘《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十四日，和其他加尔各答日报。
- ㉙虽然对于在他死后发生的大屠杀没有进行调查，但要为他的死负责的五名纳萨尔巴里分子被判无期徒刑，参看《欢喜市

場报》，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

③⑩《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③⑪国大党领导人后来承认，大批纳萨尔巴里分子渗进了国大党。他们把这解释为纳萨尔巴里分子渗进了他们的队伍。但是，在某个阶段，特别是在一九七二年选举后，国大党的青年领导人——普里亚兰詹·达斯·孟希和苏布拉塔·穆克吉——向他们的支持者发出号召，要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参看《印度斯坦旗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和《孟加拉国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

③⑫警察否认他们知道关于萨罗杰·杜特的任何消息，虽然人们极大地怀疑他是被警察杀害的。参看《印度斯坦旗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

③⑬他是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捕的，在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的。参看《印度斯坦旗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参看《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社论）。

③⑭《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③⑮参看《未来革命的儿童》，《经济和政治周刊》，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三日。

③⑯也参看苏曼塔·班纳吉：《处于前夕的西孟加拉》，《新地》，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

③⑰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

③⑱查鲁·马宗达：《我们党在工人中的任务》，《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

③⑲参看《解放》，一九七〇年八月和一九七〇年三月（查鲁·马宗达：《致工人阶级》）。

④⑰桑乔伊：《坦白地说》，《新地》，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④⑱《星期日旗报》，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 ⑫参看例如S·纳索：《纳萨尔巴里倾向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评论》，一九七〇年八月。
- ⑬《政治家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六日。
- ⑭《甘露市场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
- ⑮《政治家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 ⑯《政治家报》和《爱国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二十日。
- ⑰《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 ⑱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也参看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土地革命》，《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 ⑲普尔纳：《关于学生——青年运动》(党内文件)。还可参看S·罗易：《两起死亡事件》，《新地》。
- ⑳印度共(马列)比哈尔组织传阅的文件。

## 第五章

### 什么是納薩尔巴里主义？

这一章是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批判。它分成几节，每一节讨论纳萨尔巴里意识形态中的某一特殊方面：印度国家政权的性质，对议会制的态度以及武装斗争的概念。附录包括印度共（马列）的纲领，印度共（马列）提交该党一九七〇年代表大会的政治组织报告草案。

我想向读者指出两点。第一：本章仅仅讨论印度共（马列）的正式政策，除了一两个地方，并没有考虑其他各派纳萨尔巴里分子或这个党内部不同倾向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下一章则考察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其它倾向。第二：对纳萨尔巴里主义的讨论，除去本章讨论到的问题以外，还应当包括一些其它问题，例如纳萨尔巴里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采用的工作方法，他们对群众组织的态度的作用的态度，歼灭运动，对青年和学生的态度，等等。这些问题大半已经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里讨论过了。

#### 第一节 印度国家政权的阶级性

印度共（马列）对印度国家政权阶级性质的分析，其核心是认为印度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sup>①</sup>。该党认为，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半殖民半封建制度取代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而已”。这是一个“假独立”，区别仅仅在于：帝国主义者现在是退居后座，虽然仍保持着控制的地位。这一变化是在面临人民革命高潮的“英帝国主义要它可靠的代理人——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共的领导人为其效劳”的时候发生的<sup>②</sup>。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民族运动以及包括印度共在内的其它重要力量的领导，是按照英帝国主义者的指示行事的。

第二，“国大党政府代表印度封建王公、大地主和官仔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是买办性的，它依赖外国的经济利益，是为他们服务的。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印度共（马列）指出印度对外国援助的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四百八十号公法的依赖，以及印度和外国大企业之间不断增长的合作关系。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个思想家认为，在工业方面，就不存在印度自己的非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印度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地道的买办资产阶级”<sup>③</sup>。

第三，经济的半封建性由这样一些事实表现出来：过份依赖农业维持生计，逃避土改法令，土地所有权集中在人数不多的人们手里，高地租，向佃户和雇农收回土地、放债人的高利率以及“令人回忆起中世纪”的对表列种姓的社会压迫<sup>④</sup>。理解对印度经济的性质和地主的统治地位所作的分析，是理解纳萨尔巴里分子许多策略口号所必需的。

第四，封建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在直接剥削印度群众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新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及其头号帮凶苏修统治集团”的统治，此外还受“原来的宗主国英帝国主义”的统

治，因此他们“竭尽卖国之能事”⑤。所以，这四种因素——“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官行卖办资本主义这几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头上”⑥。换上几个字，这也就是印度共（马列）的观点：“因此，印度人民现在不是受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而是受主要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行买办资本主义四座大山的压迫”⑦。其中，前两者是占统治地位的，而后两者“已经变成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⑧。

第五，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封建主义同印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⑨，因此，土地革命的任务，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地位。

### 批判印度共（马列）的阶级分析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国家政权的分析，是同印度共的分析完全对立的。后者认为“印度这个国家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大资产阶级有强大的影响。这种阶级统治同地主阶级有着有力的联系。这些因素使国家政权里产生了反动的联合”⑩。这一分析在几个方面不同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立场。第一，按照印度共的观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纳萨尔巴里分子则不承认这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存在。第二，印度共的分析没有提到外国的影响或控制，而纳萨尔巴里分子提纲的核心是，印度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第三，印度共的分析承认地主对国家政权的重大影响，但不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印度共（马）的立场是在这两者之间：“当前的印度国家是

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机构，这两个阶级日益同外国金融资本相勾结，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①。印度共（马）的这一分析，不同意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印度大企业从性质上来说是在买办性的那种观点，但承认印度大企业同外国经济利益相勾结。但是，它又不同于印度共的分析，而认为统治阶级是大资产阶级，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后者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此外，它还不同于印度共的分析，印度共（马）把封建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分析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未能承认在印度和外国经济界的关系中有矛盾的因素。它正确地指出了这两者关系互为补充的种种事例，但忽视了这一主要之点：印度大企业发现外国经济界是它在经济上控制这个国家的手。在英国统治时期，英国和印度的企业界，都同样反对导致要求结束一切剥削形式的群众斗争。但是印度的经济界也利用和操纵印度的舆论去反对英帝国主义，例如他们支持抵制外国货的运动，以求进一步从外国统治者那里取得关税保护和其它形式的让步。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给土生土长的经济界的发展让出地盘。独立后，这两者关系的竞争，可以从这些事情看出来：政府决定钢铁和机器制造这样一些重工业和基本工业只能国营（另外一种则是归外国私人所有，因为印度资本家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对这些企业进行投资），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剥夺外国公司拥有过半数股份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建立这样一些工业，是印度统治阶级手中对抗西方经济界的一种有用的讨价还价的武器。

的确，六十年代时，政府放松了外国向印度工业投资的许多

限制，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也由一九六六年卢比贬值、中断同古巴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协定的决定表现出来。但由此推论出印度已降到傀儡国的地位，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不象中国那样，印度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一个小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印度工业家集团，共产国际在其出版物中也注意到了这一因素。而在世界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自愿地让自己被降到买办地位的先例。此外，新订的印苏条约，如果不说明其它问题，至少说明印度的大企业对美国保持其独立和在对外关系上保持其选择自由的愿望。

正如资产阶级的分析一样，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农村状况的分析，也只包含了一方面的真理。但它忽视了影响印度当前农村经济的其它若干因素。比如，他们批评逃避土地改革法的现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即使有这些情况，这些土地改革法至少清除了特大地主那个阶级。交通事业在全国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和农业的商业化的过程，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印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减轻了，相反地，说收入差别扩大了，倒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剥削现已采取了新的形式，即通过取得对合作社、碾米厂、仓库和小工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通过富裕农民对金融机构和农村自治政府的控制，以及通过“绿色革命”来进行剥削。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他们的文献中描写的有大地主和“可恨的剥削者”的那种封建经济典型，已不再符合印度今天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看到，纳萨尔巴里分子把印度共称为独立前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合作者。对印度共的作用的这种分析，牵涉到对苏



联、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作用的问题，它们曾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年代里指导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纳萨尔巴里分子是否完全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作分析的严重含义，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sup>⑫</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国搞合作，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这种指责的根据是：苏联奉行了输出资本和武器、同其它国家进行竞争以夺取它国市场的政策<sup>⑬</sup>。如果这些理由能够作为识别帝国主义国家的尺度，那末，甚至中国也可能被称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纳萨尔巴里分子必须说明苏联国内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如何产生苏联帝国主义的。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分析中也看不出是些什么准则指导着美国和苏联为共同剥削象印度这样的国家而进行勾结。

最后，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能够说明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补充的地方是什么，以及这一切会怎样影响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 第二节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议会 选举的看法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共和印度共（马）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是：这两个党都放弃了武装斗争道路，已变成议会党。对比之下，他们宣称印度共（马列）是这个国家唯一革命的政党。它不为在议会取得的一些进展而陶醉，并且一贯主张以武装斗争来实现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变。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议会是一个畜圈”，来证明他们对议会的观点是正确的。

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党后不久所做的决定之一，就是抵制各级选举：国会、邦议会、县和地方评议会各级的选举<sup>⑮</sup>。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无条件地反对一些纳萨尔巴里派系的如下建议：他们在组织上弱小的地区，为了策略上的理由可以利用选举<sup>⑮</sup>。对选举进行全面抵制的问题，是最终导致安得拉派退出印度共（马列）的主要原因之一<sup>⑯</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选举的态度，同他们对印度国家政权性质的分析是一致的。如果印度的政权仅仅只是一个或几个外国政府的傀儡，在国内人民当中没有什么基础，那么，条件显然对武装行动是有利的。武装斗争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旦开始，它就会象森林之火一样，在短暂的时间里席卷全国。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没有群众基础，革命斗争一旦开始，人民会愈来愈多地前来参加斗争。在人民准备发动武装斗争推翻国家政权的时候去搞议会政治，就等于背叛人民。这个时候的议会活动，不是帮助革命斗争，而是制造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使人民脱离斗争。

在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几个地方的被选出来担任官职的纳萨尔巴里分子辞职了。加尔各答市议会的两个议员辞职了，但没有邦立法议会的议员辞职，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喀拉拉邦，一个非印度共（马列）的纳萨尔巴里分子K·R·高普兰，拒绝辞去他的邦议会席位，但是在安得拉邦，纳吉·雷迪则辞去邦议员的职务。就整个印度说来，在任何一级辞职的现象都是很少的，这主要是因为被选到各种机构的人中，纳萨尔巴里分子为数不多。

纳萨尔巴里分子还号召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举行的选举进行抵制。除了纳吉·雷迪所在的选区（这一选区在他辞职后进行

的补选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数是很少的），一般说来，没有人响应这个号召。一九六九年参加西孟加拉期中选举的人数很多，联合阵线在这次选举中再次当选上台，但一九七一年的投票百分比有少许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邦的一些地方发生了如凶杀、纵火等不安定的情况。在印度的其它地区，纳萨尔巴里分子抵制〔选举〕的号召，实际上并没有人注意。一九七一年西孟加拉邦的期中选举，纳萨尔巴里分子以消极的方式参加了加尔各答和其它几个地区的选举活动，即不允许印度共（马）在其据点进行竞选，但同时却并不阻止其它政党这样做①。

比较一下纳萨尔巴里分子同印度共和印度共（马）的立场，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共（马列）对选举的态度同印度共是根本相反的。后者认为存在着通过选举达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可能性，在选举中它宁可同执政党结成同盟，以反对如人民同盟、自由党和国大党组织派等反动政党。根据印度共的意见，国大党代表资本家中的进步的反垄断和反帝力量，能够被用来作为实现他们称之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在印度共的正式出版物中，并没有完全排斥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但强调的则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七一年的议会选举中，印度共同国大党在许多地方就选举达成了谅解，欢呼甘地夫人及其政党是一种“进步力量”，以换取执政党在选举中的公开支持，使它在竞选的二十三个席位中得到二十二个席位。它在喀拉拉邦同国大党结成同盟来管理政府，在西孟加拉邦，在一九七一年选举后的一个短时期里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由于同执政党的密切联系，印度共强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情了。

印度共（马）对参加议会机构的态度，政治观察家们还不十

分了解。有时，存在着这样的倾向：把印度共和印度共（马）统统都当作打算通过选举及和平手段来取得政权的议会党。但也还有相反的一种倾向：把印度共（马）描述为保持议会活动的门面来欺骗政府而暗中组织武装起义的一个政党。这种观察多半是这样的一些人作出来的：这些人不愿费心从印度共（马）的资料中去发现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党参加议会活动的。

印度共（马）不象纳萨尔巴里分子那样，并不规避参加议会选举。它在喀拉拉和西孟加拉两个邦里，已作为最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并且主要由于它在这些邦里的力量，也是国会的最大反对党。同时，这个党也认为，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是极不可能的。这个党把议会制看作印度统治阶级手里的工具，只有它继续对统治阶级有用处，它才会存在下去。如果统治阶级得出结论，认为议会制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用一个更加赤裸裸的压制性政权结构来代替它。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号召进行武装斗争还为时过早，因为人民主观上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最合适的战略是尽量利用现有的合法条件（只要它们存在的话），同时继续建立群众运动和工人、农民的组织，鼓励反对当局的局部斗争——有时是武装斗争，例如土地斗争<sup>⑱</sup>——，使人民为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作好准备。

纳萨尔巴里分子完全反对议会活动的立场，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认为它不符合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忠诚，使他们忽视了一个主要之点，那就是：中国的历史，对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寻找答案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向导，因为在那个国家议会制显然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

党人则曾不得不一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国家存在代议机构。他们把这个问题看作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因此，有几次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杜马，利用它来进行反对沙皇政权的宣传，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又号召对杜马进行抵制。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把议会制度“历史上过时”和“政治上过时”区分得很清楚。当资产阶级议会停止起任何进步作用，因而变成历史上过时的东西时，它们在政治上还是活着，而这个事实是共产党人不可忽视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也区分共产党人——人民中的先进部分——和群众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共产党人当然应当把议会制本来的欺骗面目看清，但是，为了制订革命策略，他们也应当考虑到普通人民对议会制的看法。共产党人宣传的口号应当不要太先进，使人民难于领会。列宁承认共产党人在革命“之前、当中和之后”参加议会的作用是揭露统治阶级的谎言<sup>①9</sup>。

同俄国革命前的议会制相比，印度的选举具有更广泛的基础。而如果共产党人能利用沙皇的议会制来促进革命的利益，为什么印度共产党人就不能这样做呢？甚至切·格瓦拉都强调过，在着手武装斗争之前，需要用尽斗争的各种和平手段<sup>②0</sup>。

不需要详尽的分析来证明，在沒有议会制的地方，那里的共产党人除了武装斗争之外，就极少有其它选择。一个国家沒有议会制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了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软弱，它不得不采取明显的压迫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或者反对当权者，或者至多保持中立，而共产党人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活动形式——游击活动，就会符合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武装斗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因为统治阶级政治

上软弱，只能通过显示其军事威力来维持政权。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以及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社会革命的中国、古巴和越南属于这一类型。

在议会制存在的地方，情况就复杂得多。议会制存在的本身，表明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强大，能够玩得起民主选举这个奢侈品。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和美国讲武装斗争还为时过早，这些地方的统治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在人民中间有重大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时候可以不使用军队和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通过政党制度和官僚政治进行统治。印度的情况同这类国家相似，但程度不同。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军事政权或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时候，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却已进行过四次半大选和能够自夸有一个选举的政府，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印度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而这一点是不应当低估的。这套策略显然不能运用于印度以及第三世界中受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家。在制订马克思主义党的革命战略时，选民大量参加选举以及公众对选举制度的反应，都是应当考虑的事情。印度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同时又是有限性的，这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印度统治阶级残酷无情地、毫无顾忌地根除如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等地的民主，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能利用议会制度来为自己谋利。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修正主义政党的区别，不在于它们参加议会的活动与否，主要是看它们如何看待议会制和利用议会设施做什么。修正主义者把议会政治本身作为目的，以议会为中心开展其一切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议会当作为革命利益服务的讲坛。他们在议会活动中指出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局限性，制造舆论来反对它。而另一方面，议会被看作开展

群众活动的许多讲坛之一，要使议会这一翼服从于农民、工会和其它斗争的需要。

纳萨尔巴里分子完全拒绝参加议会活动，因此未能利用选举提供的合法条件，也未能利用议会这个机器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发动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但他们对议会政治的态度同他们假设印度人民都在等待武装斗争的号召来进行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想法是一致的。如果人民都已经认识到这种议会制确实是欺骗人民的，是统治阶级引导人民走入迷途的工具，那么一个革命政党就确实没有理由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已过时的议会制上浪费时间。这同纳萨尔巴里分子总的说来不喜欢群众运动（包括工会和农民组织在内）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 第三节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 武装斗争的前景的看法

纳萨尔巴里分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同其它斗争形式相比，它把武装斗争放在首位。印度共（马列）的纲领宣称：“如同一切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一样，印度革命的道路，是人民战争的道路”<sup>①</sup>。中国《人民日报》评论说：“只有依靠暴力革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拯救印度，才能取得印度人民的彻底解放”<sup>②</sup>。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文献，一再引用林彪的著名提纲：“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世界上一切国家，即对于资本主义国家<sup>③</sup>、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及封建国家都一样，在今天是武装斗争的唯一策略”<sup>④</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别的选择。搞政治宣传、建立群众性组织这样一些作法，如同参加争取某些经济要求的斗争一样，都被纳萨尔巴里分子蔑视为“修正主义的”。工会和农民组织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只会引导人民离开革命的道路。议会斗争也被当作修正主义策略而予以放弃。在纳萨尔巴里主义的早期，对经济斗争还作了某些让步，但后来，正如我们在第二章里所见到的那样，连这些斗争也放弃了<sup>②5</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印度有进行革命斗争的“良好”条件<sup>②6</sup>。一九七一年三月发表在《解放》的一篇文章写道：“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麓到南方的河口，到西南的娑罗双树森林，到西孟加拉的农村，都回荡着勇敢的农民游击队的脚步声”<sup>②7</sup>。虽然也不时受到暂时的挫折，纳萨尔巴里分子却在一九七一年宣称他们的活动已扩展到西孟加拉邦的一切县和十一个邦。

一九七〇年七月，查鲁·马宗达在同党的学生和青年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你们能自觉地实现这个任务，我可以保证，人民解放军如果不是在一九七〇年，就会在一九七一年初，在孟加拉辽阔的平原上进军”<sup>②8</sup>。快到一九七〇年底时，他把他的声明修改为：“当我说把‘七十年代变成解放的年代’的时候，我想的并没有超过一九七五年”<sup>②9</sup>。

在靠近纳萨尔巴里的马古尔詹发生了据说有一些无地农民从警察那里夺了枪支的事件之后，马宗达在一九七〇年年底声明：“为此，我们今天宣布：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西孟加拉成立了”<sup>③0</sup>。他接着又说：“这可能使我们首先建立有六十支步枪和二百支管枪的人民解放军”。他还提醒他们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时只有三百二十支步枪<sup>③1</sup>。他预言，“革命的风暴将在



印度如此广阔的地区爆发，反动政府除了发几支步枪，便不能够再给每个警察所提供什么别的东西了”<sup>③②</sup>。同中国解放斗争的经验相比，印度革命派的处境好得多了。中国人常常受到敌军的包围，但是“当印度的各个角落都象一座火山的时候，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就不能只限制在那个地区。这个斗争正在蔓延，将非常迅速地蔓延到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sup>③③</sup>，因此，敌人军队要实行包围是不可能的。

其次，纳萨尔巴里分子对游击战成功前途的乐观主义，是他们对武装斗争看法的第二个特点。游击队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纳萨尔巴里分子中间颇为流行的说法，同样流行的是另一个坚定的看法，即认为：在这个国家的某地建立一个根据地，它就会象星火“燎原”那样，蔓延到整个国家。他们相信人民已做好准备并热切等待武装行动的开始，他们要求于游击队的不过是起催化剂的作用而已。

纳萨尔巴里关于武装斗争的概念的第三个特点，是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主力军的作用。印度共（马列）的纲领确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sup>③④</sup>。如同中国革命一样，印度革命将以农村和农民为基础。但在农民阶级内部，目标是使无地农民和贫农站到斗争的前列，同时也努力把中农和部分富农争取过来<sup>③⑤</sup>。

第四个特点是：在农村实行的革命战略是中国经验的翻版。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革命派力图建立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根据地，他们“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这样，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sup>③⑥</sup>。印度共（马列）的

翁贝也說：“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争，通过人民战争的强大浪潮，把武装斗争的小块根据地扩展为广大辽阔的根据地，并发展人民军队来推翻四座大山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包围并夺取城市，……”<sup>③⑤</sup>。总之，革命者力图在国内某个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一支军队，然后逐步扩大他们控制的地区，最后包围大小城市。

第五个特点是：游击战争的初期阶段是通过游击行动去歼灭阶级敌人的行动。这个歼灭运动会导致红色根据地建立，在这些根据地里游击队能够自由地移动，农民会前来支援游击队。而在稍后的一阶段，作为歼灭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会成立一支解放军<sup>③⑥</sup>。

第六个特点是：武装斗争将按照国际领导，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定的原则进行。人们要求游击队员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然后再教给农村的穷苦人。印度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从属于国际领导的<sup>③⑦</sup>。

我在另一个地方谈过上面概述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关于印度武装斗争的概念引起的某些问题。例如，虽然马宗达宣布过，快到一九七〇年底时要成立人民解放军，但除了游击行动小队以外，并没有成立这样的军队。在西孟加拉邦各地，特别是在比尔布姆，发生过几起夺枪的事，有一个时候，人们估计纳萨尔巴里分子采用这种方法大约搜集到一百六十支步枪和其它枪枝。然而，由于纳萨尔巴里运动高度分散性，这些枪支十分可能是保留在单个的行动小队手中。事实上，阿希姆·查特吉对马宗达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说他未能组成一支解放军<sup>④⑧</sup>。

此时，同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袖们的愿望相反，在这些小队

里，无地农民和贫农占的比例是小的。有好几次，运动的领袖们责备地方领导人没有给无地农民和贫农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和主动权。他们批评这种情况是“修正主义”和“依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sup>④1</sup>。查特吉在他的文件中也注意到，没有选拔出身于这些阶级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无论如何，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几个地方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超出第二章里详细讨论过的歼灭阶段。此外，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开始时接受了中国关于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最后包围城市的战略，但是他们后来却背离了这一战略，搬到城市里去，并把城市变成他们工作的中心，从而就贬低了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

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立场的基本弱点是：它确信印度人民主观上已经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纳萨尔巴里分子假定印度政府没有群众基础，因而尽量缩小政治宣传或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并把武装斗争作为目前条件下的唯一斗争形式。他们这样作，就过低估计了印度统治阶级的政治追随者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印度的革命可能性。印度人民贫穷，这是事实，但光是贫穷不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的意义上来解释群众的贫困，但右翼分子则按照蒙昧主义思想或教派理论来解释群众的贫困。既然人民文化水平低，经济落后，加之种姓制度的流行，语言和宗教感情盛行，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印度最不先进的地区最为微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纳萨尔巴里分子也忽视与当今斗争有关的历史背景。在独立以前，印度共产党是非常弱小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人民受到国大党阶级合作思想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未受到挑战。国大党作为一个组织，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动员千百万人民加入它的

反英运动，而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它背叛了运动，并把运动引入歧途。国大党的漫长历史和它对独立后印度的连续统治，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在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摒弃议会制度的时候，印度执政党却得以定期进行选举，这明显地表明国大党的政治力量。

另一方面，从整个印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仍然是很弱小的。如果选票可以作为标志的话，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印度人是支持各牌旗号的共产党人的，而且这种支持多半集中在喀拉拉和西孟加拉，这两个邦彼此相距一千五百多英里，加在一起也只占总面积和总人口的一小部分。纳萨尔巴里分子认为，目前的革命潜力是很高的，这种看法是没有实际基础的，而如果把印度共（马）、印度共这样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党一笔勾销，或者把支持他们的选票看作修正主义的而不予考虑，那么这种看法就更没有什么实际基础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斯里卡库兰等地组织的起义，只包括印度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全国五亿五千万人口中只占几十万（凡是住在那些地区的人都计算在内）。这不过是印度人口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独的水珠而已。

此外，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多数地方能够做到的只是搞了一些暗杀。每当在纳萨尔巴里分子赞助下发生一起暗杀事件，整个地区就被认为是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区。当纳萨尔巴里分子声明他们的游击运动扩展到十二个邦时，他们是说他们的追随者至少在这十二个邦的每一个邦里干了一起暗杀。暗杀一再被纳萨尔巴里分子用作衡量某一地区人民革命觉悟的尺度。

若干时候以前，纳萨尔巴里分子公布过一张用圆点标明革命活动地区的印度地图。整个地图上有许多圆点，但这些圆点，在

地理上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一个点可以表示一个村庄，一个税区，一个区，一个县或者一个邦。有八千万人口的北方邦，一个圆点只不过意味着纳萨尔巴里分子为了贯彻其歼灭运动在两个村子里杀死过几个人而已。但对于那些不了解印度地理或不懂得这些圆点的意义的人来说，这样的一张地图会产生纳萨尔巴里活动已经扩展到全国的印象。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运动许多干部都得到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的印象，而实际上却并无其事。

纳萨尔巴里分子关于武装斗争的概念的另一个根本弱点，是它认为在三十和四十年代进行中国革命的一些条件，也存在于七十年代的印度。但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工作的条件哪怕只进行表面的考察，也会看出，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与印度当前情况有着若干重大差别。首先，中国政府和行政管理是分散的，中央政府软弱，这个政府在有关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日本侵略而进一步削弱，而印度政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它的行政管理比起相应的中国政府是更有效率的。其次，虽然印度政府在其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它却花了很大一笔钱去建立一整套交通运输体系，使军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印度几乎所有的地方。这一点肯定同中国相应期间的情况不同。而且，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地形不同于东孟加拉和越南南方，它是便于军队迅速转移的。

第三，不能忽视在武器和作战方面的技术发展。印度军队是庞大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和装备得最好的军队之一，它的技术效能和军事效能在同巴基斯坦的两周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游击队长途进军而不遭到空军、炮兵和大兵团

的攻占和摧毁是不可能的。不论英勇的长征对全世界的革命者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的范例，但是在印度的国土上，要在不同的条件下重复长征的实践，例如从西孟加拉长征到喀拉拉，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印度当前条件下进行革命，除了这一切困难外，还必须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脱离群众，革命者通过抗日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而在印度，人民在主观上还没有准备进行武装革命，而统治阶级又还保持着很大一部分居民对它的忠诚。这一点也许是中国和印度的条件的最重要的区别。今天，除了少数弹丸之地，游击队在印度的广大农村还不是“如鱼得水”。

如果在这种条件下，在印度的一小块地方发动革命战争，那么军队无需费很大力气就能扑灭这一战火。只要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中立或者站在统治阶级一边，政府就能够动员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到一个地方去，狠狠打击革命力量，正如政府粉碎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特仑甘纳斗争时所作的那样。另一方面，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使用军队去对付纳萨尔巴里分子。

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期望国内某个地方一旦爆发武装起义，革命战争就会迅速扩大，这是错误的。在一个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能用自已的语言阅读和写作，只有小量的人看报，几乎没有电视，收音机又不多，居民流动性非常低的国家里，消息不能迅速向全国传播，而大部分消息只能靠口头传递。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和中国不同，印度缺少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就使消息难于越过语言的界限而得到传递。这种语言界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印度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性，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政治和社会认识水平极其参差不齐。

我们可以同样地考察印度同古巴和越南经验的差别，虽然印度象他们一样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就越南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的游击斗争，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甚至在那里，武装斗争也还只是全部事实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仅仅只是一场武器的比赛，贫穷的、装备不良的越南人面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先进技术和压倒的火力，就简直难以存在几个星期。越南游击队的最大资产，既不是大量武器，也不是士兵的质量（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而是本国人民的支持，他们供给游击队食品和住所，保护游击队免受敌人袭击，同时又替游击队监视敌人的活动。越南游击队在武装战斗中成功地抗击了美国，因为他们已经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争取到了人心。如果不考虑到越南人民过去三十年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日本、法国以及后来反吴庭艳傀儡政权的斗争，就不能理解或解释现阶段的游击战争。如果不考虑到越南共产党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不考虑到越南统治阶级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就把越南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运用于印度的条件下，就等于否定马克思、列宁和毛的全部重要教导。

从印度观点看，古巴的例子是更加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里的一部分中等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在斗争过程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巴蒂斯塔政权由于贪污无能而臭名昭著，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甚至被美国看作一个负担。华盛顿期望有人代替巴蒂斯塔，此人既会保护美国企业在古巴的基本利益，同时又能赋予哈瓦那政权一个体面得多的形象。美国政府没有阻

拦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因为它并不怀疑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巴蒂斯塔没有扎根于人民当中，而卡斯特罗分子却得到农民的支持。但印度同古巴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规模的不同。同印度军队相比较，巴蒂斯塔的军队既小而又装备不良、训练差。而古巴游击队，除了最后阶段外，都是同五至五十人的很小的队伍作战的。

那么，印度武装革命的前景是什么？在目前时期，前景肯定是不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似乎都还是强大的。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斗争应当占首要地位，虽然为了实现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取得群众的支持，而不是为了立刻夺取政权，开展象夺地那样的局部武装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是可能的。政治上战胜统治势力并使他们脱离群众应当是最优先考虑的事，因为不完成这个必要条件就号召武装起义，就等于自杀。政治宣传应当是宣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革命意识形态，同时应当以强调现有制度的根本缺陷为目的。

在组织方面，这种宣传应当通过诸如工会、农民组织、中等阶级的组织以及议会和其它选举机构这一类的群众讲坛来进行，应当开展保卫各阶层人民权利的积极战斗，也应当进行象粮食运动那样的、试图在一些共同问题上把各界人民中的大部分人动员起来的群众斗争。这些斗争，如果指导得当，应有助于提高很大一部分人的觉悟，而这一点，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我们在上面提出的任务的回答是：建立群众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并从而提高总的政治认识水平，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同于这条乏味而又消磨时日的纲领的另一作法，就是



现在号召进行武装斗争。人民会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经过多次失败之后革命就会取得胜利。我对这种论点的回答是：第一，虽然革命比建立工会或其它群众组织的工作（这工作要求有很大的耐心和从事艰苦的工作）更令人感兴趣，但不清楚的是：一次不合时宜的革命是否会在较短的期间里成功。要求走捷径乃是为人熟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征，但不合时宜地号召进行革命，不仅不能加速革命进程，反而实际上会使革命者脱离群众，并使统治阶级有巩固力量的时间，因而会延缓革命的进程。而且这种小规模起义的星星之火在发展为燎原大火以前，很容易被扑灭下去。

第二，无论马克思主义者目前在全国的总的力量如何，对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是没有理由悲观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直线地或者是以稳定的速度前进的。它的进展必然是断断续续，充满曲折的。就以印度的经验为例，直到一九五二年之前，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中还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力量。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在非常时期以及同中国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的年代里，共产党人得到的支持再次下降，组织上再度削弱。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的领导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无法组织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去反对工厂厂方或政府。人民强烈支持政府而反对他们认为的外来威胁，并准备作出牺牲。

这些年代也是经济停顿、发展缓慢，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和食品消费下降的年代。发生了灾荒和饥饿。但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政治条件迅速变化。一九六七年执政党在第四次大选中在半

教的邦里遭到失败。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这个时期，从印度政府的观点看来，是个政治不稳定、危机四伏的年代，国大党处于分裂状态，甘地夫人的少数派政府靠着两个共产党的支持过日子，反动党派表现得很强大，大批的人从一个党转到另一个党。这些年代也是共产党人恢复前七年的损失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特别是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

一九七一年的议会选举使甘地夫人取得了绝大多数选票，这就解决了前四年困扰执政党的政治危机。一九七二年的邦议会选举进一步巩固了国大党的地位，粉碎了左翼党派的支柱。在这两次选举中，国大党的主要竞选口号是“消灭贫困”，然而由于其支持者的阶级基础，这种保证是不能兑现的。虽然甘地夫人的党在这些选举中暂时占了上风，但从长远观点看，获得胜利的力量将是马克思主义者。甘地夫人的多数眼下虽然强大，但也是非常不稳固的，因为她那个党的政治成分中包括机会主义者和追求私利的人。他们参加这个党，为的是从她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中捞取个人的利益。如果她在政治赌博中失利而面临危机，这些人就会不声不响地抛弃她。在国大党今天的行列里，讲个人忠诚、正直和崇高理想的人是微乎其微的。国大党人还站在甘地夫人这一边，因为背叛国大党现在代价更大，但是情况变化后，他们的行为就会不同了。

从长远来看，由于政府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失望也就会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孟加拉国事件的发展，虽然在经济上代价昂贵，却为政府在经济战线上的失败提供了借口，从而帮助了政府。对巴基斯坦的胜利改善了政府的形象。但对政府以阶级为基础的政策的不满，迟早是可能增长的，而这一次用不到二十年就

能完成这一周期。

尽管有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选举，印度的政治局势仍是变化多端。谁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预言，一个月之内国大党在中央和各邦的政权由于第四次大选的结果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然而搞政治的专家们和政党却没有预见到，大部分既没有文化、消息又不灵通的普通男女决定放弃国大党而投其它党的票。一九七一年的选举结果，也使大多数选举和政治专家们感到惊讶。一九六七年之后的五年中，印度的政治发生了无法预计的质的变化。谁又能知道在未来的五年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眼下国大党政权看来很牢稳，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断失败，情况可能迅速发生变化。执政党可能再次分裂，可能出现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随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非议会统治阶段。而由于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人民的控制削弱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就会变得光明起来。

我们现在的讨论涉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队。如果军队（连同其全部装备）坚定地支持政府，革命成功的希望便是微乎其微的。要建立一支同当权的政府的军队旗鼓相当的红军，是颇费时日和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革命派在政治上得以孤立当权的政府，如同在越南南方那样，这样的一种政治现实就将会在军队里得到反映。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的战士都来自普通人民，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亲友的感情和思想的影响。巴基斯坦军队中的孟加拉族士兵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尽管他们受过英国的训练，具有不问政治的传统，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他们仍然背叛了，参加了解放军，并在随后的八个月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孟加拉人，他们不能置身于现在被称为

孟加拉国的这一政治现实之外。印度军队的大多数士兵来自旁遮普、哈里亚纳、拉贾斯坦和北方邦，这些邦的共产党力量薄弱，统治阶级政党的势力历来强大。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里扩展到这些区域，而统治阶级的政治影响又削弱下去，那末，尽管军队有实际上不问政治的传统，很大一部分军队也会受到这种政治变化的影响。这一点再次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比武装斗争优先的地位。

## 注 释

①参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政治决议》）。

②同上。

③T·达斯：《小资产阶级画像》，《新地》，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④《新华社英文电讯稿》，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印度农村的封建制度只能用武装的土地革命去摧毁》：S·古纳：《印度是真正独立的吗？》，《解放》，一九六八年八月；《政治决议》，《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查鲁·马宗达：《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⑤《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印度的春雷》。

⑥同上。

⑦参看注释①。

⑧同上。

⑨同上。

⑩印度共：《印度共产党纲领》。

⑪印度共（马）：《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纲领》。

⑫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纳萨尔巴里分子谴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从来就不是愉快的。参看《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

⑬阿吉特·库马尔·穆科帕迪亚亚：《共产党（马）马杜赖文件的实质》（孟加拉文），爱国者报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⑭“同志们，所以我们的号召是‘打倒选举’”，见一九六八年中，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解放》，一九六八年六月。

⑮参看安得拉邦革命派的《当前纲领》《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马利卡朱纳·拉奥：《印度的毛主义——两个派别》，《新地》，周年专号，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还可参看第六章《印度共（马列）同安得拉派的分歧》。

⑯同上。

⑰参看第三章。

⑱参看本章附录二。

⑲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可参看《苏联共产党历史》。

⑳切·格瓦拉：《论游击战》。

㉑参看注释①。

㉒同一篇文章也说：“印度革命的特点，同中国革命的特点一

样，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参看《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印度的春雷》。

②③奇怪的是这个提纲包括所有的国家，包括一些农民人口很少的资本主义国家。

②④观察家：《要赢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树立革命的权威》，《解放》，一九七〇年二月。

②⑤参看第二章，第三章。

②⑥《解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还可参看阿希特·森：《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吗》，《解放》，一九六八年二月。

②⑦《欢呼印度人民解放军的成立》，《解放》，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三月。

②⑧查鲁·马宗达：《向革命学生和青年说几句话》，《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

②⑨《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③⑩查鲁·马宗达：《把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的任务放在优先地位》，《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③⑪查鲁·马宗达：《前进，胜利的日子已经临近》，《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③⑫同上。

③⑬同上。

③⑭参看注释①和第二章。也参看查鲁·马宗达：《着手从事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解放》，一九六八年十月。

③⑮查鲁·马宗达：《充分依靠无地农民和贫农，反对修正主义》，《解放》，一九七〇年八月。

③⑯参看注释②②。

③⑦参看注释①。还可参看第六章《马宗达同阿希姆·查特吉的分歧》那一节，以了解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另一种观点。

③⑧参看第二章。

③⑨查鲁·马宗达：《着手从事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解放》，一九六八年十月。还可参看《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

④⑩参看第二章：《马宗达同阿希姆·查特吉的分歧》那一节。

④⑪查鲁·马宗达：《充分依靠无地农民和贫农，反对修正主义》，《解放》，一九七〇年八月。

## 第六章

# 納薩尔巴里主义的不同派別

### 第一节 导 言

前面一章叙述了印度共（马列）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正式路线。本章将概述印度共（马列）与纳吉·雷迪领导的安得拉派之间的各种分歧，以及印度共（马列）内部的不同倾向（多半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印度共（马列）和安得拉派以外，还有其它一些自称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组织。所有这些派别的两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同时他们都相信在印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这些派别也都认为印度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它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但是在策略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这引起了自一九六七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开始以来的几次分裂。

第一次交锋是在协调委员会中在诸如抵制选举、宣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关于经济主义等问题上展开的①。纳吉·雷迪反对不加区别地抵制选举。在许多人中间，对于把苏联同美国等同起来，称之为帝国主义也有犹豫。关于什么是经济主义的争论，则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初期阶段一直进行到最后。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建党的问题。马宗达大概是根据来自中



国党的指示，主张建党；纳吉·雷迪和其他人则主张不要在群众斗争未起来以前，就把党的机构自上而下地强加在干部身上<sup>②</sup>。印度共(马列)的报利用这样的语言激烈地批评了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今天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咀上高喊忠于毛主席，甚至忠于纳萨尔巴里。党认为，这些派别中的许多人代表了革命运动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宣扬‘现阶段出现派别的历史必然性’，‘自下而上地建党’和其他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力图靠自发性实现建党任务，并且蓄意阻挠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sup>③</sup>。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内部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要赋与城市工作和工会工作什么样的作用。运动中两个知名的工会工作者——阿希特·森和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抱怨说，在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名义下把革命者在城市和工厂中的工作忽略了。他们，特别是阿希特·森，反对把干部派到农村去，要求在工厂中进行局部的和经济的斗争，从而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革命中应起的领导作用。阿希特·森批评说，运动中的工人阶级领导已被小资产阶级领导所替代。另一方面印度共(马列)则说这些批评违反毛关于农民和农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和助长经济主义。应当给予优先地位的，是建党而不是工会。马宗达宣称，只有当工人阶级弱小的时候，工会才起有用的作用，但是在印度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在这里，革命派比资产阶级强大<sup>④</sup>。

在一九七〇——七一年，当纳萨尔巴里分子转移到城市地区的时候，关于城市的作用和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又成了争论的问题。不过对方这次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是说他们放弃了以农民为主力军在农村搞武装斗争的观点。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把党的

青年组织在城市中领导的文化革命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而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则批评脱离农村在城市夺取政权的观点。一些批评者还注意到：青年学生的活动，同在农民中的活动相比，其重要性已日益增长⑤。

争论的第四个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歼灭阶级敌人作为游击战争策略的问题⑥。但是对这一政策，存在着各种程度不同的反对意见。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阿希特·森和其他人称之为格瓦拉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认为它是违背人民战争的，是没有群众支持的⑦。纳吉·雷迪并不反对搞这种个人谋杀，但是要求把这种行动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印度共（马列）的指责是：它在开展这一运动之前，没有先把群众活动搞起来。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并不反对歼灭运动本身，实际上，他是这一政策的响亮鼓吹者之一，他在比哈尔的穆沙哈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小规模地执行了这一政策。他与马宗达的分歧是关于杀害富农的问题。罗易·乔杜里同样支持这个政策，只要这是针对警察、军队和告密分子以及一些有选择的阶级敌人。但是，他后来反对他认为是不加区别的杀害。阿希姆·查特吉也许是这一政策的最有力的执行者，后来他承认这一政策是完全失败了，因为它同群众活动缺少联系，而且印度共（马列）未能建立一支红军⑧。

歼灭问题，不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总是把它同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和经济运动对立起来。差不多所有批评印度共（马列）的人，除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外，都指出不加区别地禁止群众活动是运动的最严重的弱点。纳吉·雷迪、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库尼卡尔·纳拉亚南等人，对歼灭政策都提出了在目

前情况下进攻性策略是否适合的理论问题<sup>⑨</sup>。也提出了另一个同游击战争的原则有关的策略问题——同一策略可否同样地应用到全国各处，或者革命派是否应该注意到“印度革命的不平衡性”。马宗达采取了“普遍适用的”路线，照他的看法，歼灭运动是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在印度是到处适用；纳吉·雷迪、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和阿希姆·查特吉则反对这条路线。查特吉还对马宗达关于建立根据地 and 解放军的思想表示怀疑。

第五，在纳萨尔巴里分子中，关于两种倾向——右倾和左倾——究竟哪一种运动的主要危险，也有分歧。萨蒂亚·纳拉扬·辛格的看法是：在运动内部反对右的倾向的思想斗争已经获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另一种意见是：尽管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但是它有时是以“左倾冒险主义”的姿态表现出来的。查特吉认为党犯了右倾和左倾两种错误。但马宗达坚持他的老看法：两种危险中右倾是更严重的<sup>⑩</sup>。

最后，党的组织和行政以及领导——指马宗达——，也都受到所有批评者猛烈的攻击。

## 第二节 马宗达同安得拉派的分歧

第一章列举了导致安得拉派纳萨尔巴里分子被开除出印度共（马列）的若干因素。一个是纳吉·雷迪派同查鲁·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系列思想和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对此我将扼要地加以叙述。

在印度资产阶级的买办性、武装革命中农民的作用以及在思想上忠于毛主席思想等问题上，安得拉派基本上同意印度共（马

列)的观点,但是在印度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则有小的分歧。印度共(马列)认为封建主义同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安得拉共产党人则认为帝国主义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①①。

但是,两派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印度毛分子要采取的策略路线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待议会选举的态度①②。两派都接受武装斗争的思想,印度共(马列)从它成立的时候起就号召抵制选举①③,但是安得拉共产党人反对不加区别的抵制①④。安得拉共产党人要求考虑到革命的不平衡性,考虑到不同地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同,因而同一策略不可能到处都获得良好的效果。安得拉共产党人认为,在革命派取得多数的地区实行抵制选举的口号,是具有积极内容的,革命派能够组织平行的人民委员会去实施法律,征收赋税,组织防御。这样的委员会在这些地区可同政府支持的委员会竞争,并使群众做好人民战争的准备①⑤。但是在革命派力量薄弱的地区,大体上就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抵制选举并不意味着革命派单独地抵制。只有当我们的选民放弃投票,才能算得上是抵制选举”①⑥。

在经济斗争和群众活动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两派也有分歧。安得拉共产党人认为,游击斗争不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是不能胜利的。他们解释说:斯里卡库兰起义初期的胜利,大半是由于起义以前进行了经济斗争和群众斗争。但是,印度共(马列)的歼灭路线是以拒绝群众参加为基础的,这条路线,甚至在斯里卡库兰,最后也证明是产生相反效果的①⑦。安得拉共产党人认为,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发动了农村起义的其他地区,如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他们也失败了,因为他们忽视了这一情况。

第三,安得拉共产党人反对那种他们认为是进攻的行动。照

纳吉·雷迪的看法，人民战争总是以抵抗地主的进攻开始，而不是作为进攻开始的。他认为，“印度共（马列）的方法同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斗争没有联系。没有这样的联系，甚至在那些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的地区，他们就采取了向一切地主进攻的行动。简单地说，对我们来说是抵抗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进攻的问题”<sup>⑱</sup>。一位支持印度共（马列）的人，用下面的话概括了纳吉·雷迪同印度共（马列）在这一点上的分歧：“纳吉·雷迪路线在性质上是防御的，形式上是合法的，当前的目标是经济的，最终目标是政治的。印度共（马列）的路线在性质上是进攻的，形式上是非法的，当前的目标是政治的，最终目标是经济解放”<sup>⑲</sup>。

安得拉共产党人认为，把每一次农民斗争都说成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是错误的。农民只有通过一系列武装行动之后，他们才能结合到人民解放军里去。因此，安得拉共产党人根据群众运动的水平，把安得拉邦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地区，即运动已经到达武装斗争阶段的地区，有广泛群众基础、阶级斗争激化的地区，以及群众运动微弱的地区。安得拉共产党人对这些不同的地区定出了不同的计划。他们认为，纳尔冈达、瓦朗加尔、坎曼、东西戈达瓦里以及维萨卡帕特南的森林山区属于武装斗争区，特别是瓦朗加尔的三个税区<sup>⑳</sup>。但是，尽管安得拉共产党人宣称在这些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功，还看不到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这些地区有什么显著活动。虽然在大批党员退出印度共（马）时，这个组织一开始就相当大，但是，这个特种的纳萨尔巴里主义，看起来直到现在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他们自称忠于毛主席，但是中共却并不理睬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在其他几个邦，如马哈拉施特拉、喀拉

拉和西孟加拉的安得拉共产党人的同伴们，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削弱到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步。

了解印度共（马列）同安得拉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章说明了这两派即使在协调委员会时期也从未十分接近。当安得拉组织早先被开除出（协调）委员会的时候，委员会曾表示，希望两者的未来关系将是“非对抗性的”<sup>⑳</sup>。但是不久，这种态度改变了，安得拉纳萨尔巴里分子被称作敌人<sup>㉑</sup>。据他们说，印度共（马列）曾发出“歼灭”他们的领导人的号召<sup>㉒</sup>。同时，安得拉纳萨尔巴里分子一般地是赞成同印度共（马列）保持非对抗性的关系的<sup>㉓</sup>，尽管他们毫不犹豫地回击了“印度共（马列）的无中生有的指责和毫无根据的攻击”<sup>㉔</sup>。

### 第三节 馬宗达同比哈尔組織的分歧

第一、第二章提到了接近一九七〇年年底查鲁·马宗达同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在若干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这一节将对这些分歧作简短的叙述。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在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以前，是印度共（马）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比哈尔组织的领导人。他在比哈尔的工业区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他把其中很大一部分带到纳萨尔巴里分子方面去了。他是歼灭政策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也领导了没有成功的穆沙哈里起义。他同马宗达的爭持导致他被印度共（马列）开除，尽管他自称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在这一问题上是同他站在一起的<sup>㉕</sup>。看来，目前他在群众中或在纳萨尔巴里分子中都没有什么影响。

辛格同马宗达的分歧，是以比哈尔组织一九七〇年间向中央

委员会提交文件的形式提出来的。这个文件同马宗达的答复一起，曾在印度共（马列）党员中传阅<sup>②7</sup>。

比哈尔组织同马宗达分歧的主要点，是党内左右倾偏向中究竟哪一个为主要偏向的问题。比哈尔组织认为，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已告结束，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现在是主要危险，但马宗达则坚持修正主义依然是主要偏向。

主要的策略分歧是关于富农的作用问题。比哈尔组织赞成争取和中立富农，主要对地主开展斗争的政策。它指责印度共（马列）的领导人在歼灭运动中对地主与富农不加区别。比哈尔组织认为，对他们不加区别会使党孤立和失败。另一方面，马宗达认为，由于富农和封建分子有密切联系，富农同党的关系只能是对抗性的。他并且说，“如果贫农与无地农民无论如何坚持要歼灭一个富农，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从他的阶级成分方面而应当从他的政治观点方面去寻找歼灭他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歼灭他是对的”。

第二，比哈尔组织对于未能划清党在农村的任务和在城市的任务的界限提出了批评。它批评了在城市开展歼灭运动和提出夺取政权口号的政策。比哈尔组织认为，这些政策是不符合持久的农民游击斗争和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战略的。比哈尔组织严厉批评了那些鼓吹在城乡都采取进攻战略而看不到城乡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人。比哈尔组织还要求党的领导人引导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放手让他们工作。马宗达对这些论点——即基本上反对把纳萨尔巴里活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论点——没有作详细的回答，他只是强调了在城市造反对获得干部去农村工作是有益的。

第三，比哈尔组织提出了进攻行动与防御行动的问题，并批

讲了那些只相信进攻行动的人。文件大量地引用了毛泽东著作来表明，在战争中防御行动也是重要的，尽管总的说来，在战争中进攻战术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我们忽视防御，只讲进攻，我们就必然要遭受损失——可以避免的损失。有些同志首先就患了这个病。他们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文件引用了毛的话：当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也不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委员会说，“我们已经有中国同志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我们不要做十足的白痴”。文件也说到，在革命派思想中，为了反对自私自利，必须把自我牺牲当作神圣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能作为游击战争的策略加以应用。这种错误会使党遭受严重的损失。

马宗达回答说，“修正主义分子和革命派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在于，前者要求事先得到胜利的保票，才进行斗争，而革命派则勇敢地进行战斗并获得胜利。革命派是不畏惧失败的”。他认为进攻行动和防御行动都是重要的。

当这个文件在传阅的时候，一九七〇年九月到十二月《解放》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动荡时期》的长篇文章<sup>②⑧</sup>。这篇文章引用了马宗达的号召：“肩负起这个神圣任务（解放群众），丢掉一切自卫的思想，攻击并消灭敌人”，接着评论说，“当某个修正主义‘头号傻瓜’知道革命将要牺牲许多宝贵的生命的时候，难道他不是把牺牲自己同保卫自己和保存自己对立起来吗？革命的道路就是由许多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道路”。文章接着说，“宣扬保卫自己和保存自己，除了从策略上讲，除了关系到特定的战斗和战役，就是宣扬怯懦，所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文章用了这样的评语总结辩论：“事实上，党内党外正在



进行着一场斗争——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简言之，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斗私批修’和‘斗私而反对（和出卖）革命的斗争，是以毛主席的路线，即所有革命者的路线为一方，同以刘少奇的路线，即所有叛徒、内奸和工贼的路线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

第四，比哈尔组织对党的领导人和党组织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指责。它说各级组织盛行独裁作风。在许多地方，党委会议不是经常召开的，许多决定也不是集体作出的。作出决定或执行决定的时候，不征求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在一些上级委员会，书记实行个人统治，并在党员中鼓励“奴隶”态度。在组织问题上，独裁主义是机会主义的最庸俗的形式。在目前条件下，它意味着对下级委员会采取官仔主义态度。独裁主义的另一极端是多中心主义，它意味着不服从上级委员会，包括国际领导。

“不幸的是，我们某些领导同志把胜利归功于自己，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他们对批评泼冷水，在党内鼓励奴隶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和健康的党内生活就告终结，党员的主动性遭到摧残，领导与党员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这种状况助长了党员中的过分的民主，并终将破坏党的团结，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

“邦委会认为，党的中央领导是左倾机会主义和组织上官仔主义的根源，因此全党应当作出重大努力同这个领导进行斗争并击败它。邦委呼吁所有党员在一切政治、组织和军事问题上重视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或某些其他人的思想。”

这就是各方面对印度共（马列）领导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中的一例。第一，指出了某些严重的组织上的错误，包括纪律涣散

和各党委的不起作用。第二，党委会官僚主义的滋长被断定为左倾机会主义危险。第三，中央委员会（言外之意就是马宗达）要对官僚主义态度和党员中奴隶主义思想的滋长负责。

马宗达在他的答复中，为他的党组织实行非集中化的决定辩护。他说，“我认为，在目前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机构的集中化，既不可能而又有害。集中化限制党员的主动性，从而挫钝和削弱党的进攻能力。经常举行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会议是不可能的，那样做风险太大了”。他否认关于领导助长官僚主义或奴隶主义倾向的指责，同时提出将这些对领导的批评意见在党员中传阅。

后来比哈尔组织要求经常召开会议的意见，被领导人解释为要求建立一个公开组织和反对建立秘密的游击组织的必要性。

对比哈尔组织对马宗达的攻击，领导人给予了非常慎重的处理。一九七〇年九至十二月号《解放》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为马宗达在创建印度共（马列）方面的作用进行辩护，其中有下面一段话<sup>②9</sup>：

当修正主义似乎在印度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正是查鲁·马宗达同志在印度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地分析了印度社会和印度国家的性质、印度革命的阶段和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并坚决地断言，中国的道路就是印度的道路。正是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参加了世界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而进行的人民战争的行列。……正是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革命路线以及他在采取每一步时所作的指示，指导了我们的同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开展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并把它扩大到广大的地区。简言之，正是查鲁·马宗达同志在印度的具体条件下

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才使印度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革命的转变。这将受到各种修正主义者（公开的和暗藏的）即劳动人民和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恶毒攻击，并不是出人预料的。

#### 第四节 馬宗达同苏希塔尔·罗易· 乔杜里的分歧

长期以来，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同查鲁·马宗达一道工作，是他的亲密伙伴。他在成为纳萨尔巴里分子以前，先在《自由报》编辑委员会工作，后在《爱国者报》工作。在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积极干部的年代里，他是以一个说话柔和的诚实人著称的，尽管他在党外不为人所知。全印协调委员会成立之后，他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印度共（马列）成立以后，他是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也是机关刊《解放》的编辑。

他与马宗达的分歧，是在马宗达鼓励加尔各答青年活动并为这些活动辩护之后发展起来的。随后，他也同马宗达在若干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那时他已化名在一家医院治疗了几个星期。当时，许多人，特别是警察，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因为大家知道他与马宗达有分歧。迄今还不知道有任何迹象能证实这种怀疑，但更可能的是，他的战友们对他的摧残凌辱和怀疑加速了他的死亡。一位纳萨尔巴里分子说，“是这种背信弃义杀害了他”，又接着说，“党的领导拒绝给他汇报情况，不给他提供住所，在很长时间里不给他发津贴”<sup>③①</sup>。还有一些谣言说，马宗达曾雇了人去杀害他，有一两次

企图对他下毒手。

罗易·乔杜里与马宗达主要是在教育机构文化革命的范围和它对农民游击斗争的后果问题上有所分歧。第三章解释了文化革命的各个方面——抵制考试，捣毁过去孟加拉著名人物的塑像，以及捣毁学校家俱和实验室。罗易·乔杜里以一系列的理由反对这个计划（印度共〔马列〕孟加拉文周刊《爱国者报》给了这个计划一个总名称——“在教育机构中的行动”），他的理由可归纳如下<sup>③</sup>：

一、这个行动是根据学生的建议发动起来的，与领导人的决定无关。

二、袭击贾达夫普尔的甘地中心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袭击维迪亚萨加、拉突德拉纳特、拉姆莫亨以及其他同样有名望的人的塑像，则没有慎重考虑这些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

三、这种行动，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也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尽管马宗达把这些行动比作著名的中国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这种类比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罗易·乔杜里却把这种行动比作西欧工业化初期工人发动的捣毁机器运动，而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四、这些行动有歪曲运动重点的危险，这会损害反对阶级敌人的运动和削弱农村的武装斗争。“为了发动武装斗争的目的，难道就必须首先把纳萨尔巴里的农民从拉姆莫亨、拉宾德拉纳特和维迪亚萨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吗？”

五、尽管领导曾谈到要使青年与工农结合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少。甚至不能举行一次学生抗议美国干涉柬埔寨的行动。

六、对城市青年可以提出另外一些计划，如争取修改学校课程的运动，或者要求在政府已经修建了甘地纪念碑的巴拉克普尔建立一八五七年独立战争英雄曼加尔·潘地的塑像。

马宗达的回答是，象维迪亚萨加和拉宾德拉纳特这样的人物是不反帝的，并背叛了一八五七年（反英起义）。他重申了印度共（马列）全印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整个英国统治时期，印度资产阶级是买办性的；并且评论说，在印度的情况下，罗易·乔杜里关于“反帝的资产阶级”的话是背离党的路线的。罗易·乔杜里关于学生与文化活动的建议（参看上述第六点）被马宗达称为“改良主义的”。他为学生捣毁家俱和实验室辩护，并且坚持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阻止学生的这些活动，这些活动表达了他们对教育制度的强烈愤恨。事实上，他认为党有责任在学生中激发这种愤恨。在另一个地方，罗易·乔杜里引用了马宗达的话：“如果孩子们把整个大学用炸药炸掉，我才高兴哩”。

罗易·乔杜里把一件党内文件和马宗达的答复一同发了下去。他在这个文件中为歼灭运动辩护，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赞扬青年人进攻警察、中央后备警察、东部边境步枪队和警察密探的行动。但是当运动发展到暗杀非军事的、非警察的或非值勤警察的个人的时候，罗易·乔杜里就反对他们了。

罗易·乔杜里死后，他的一个纳萨尔巴里分子同伴写了一封信给《新地》，详细叙述了他与其他领导人在其他若干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关于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这封信对党的路线作了一个感情用事的但同时也是合乎逻辑的批评，下面是这封信的摘要<sup>③</sup>：

说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

死，或者说阿舒·马宗达<sup>③③</sup>是他们用五颗子弹打死的（包括他被捕之后并在他从被捕地点转移之后的两颗子弹），那仅仅接触到他们死亡的表面现象。他们是死于印度共（马列）部分领导人提出的一条危险的破坏性的路线。这部分领导人利用了我国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盲目的、献身的、热烈的忠诚，把党引导到死亡是唯一的报酬、流血是胜利的唯一标志这样一条路线上去。一九七〇——七一年有六个月可怕的日子，在那期间，孟加拉的花朵掉进了冒险主义的深渊。挫折却使他们有了信心。他们封建的殖民地的经历和文化，他们的强烈仇恨情绪，使他们不去审问是非，差不多疯狂了。同志们的牺牲和领导人富于感情的讲话，把他们推上了祭坛——好象上了流水作业线一样——这是壮烈的。但是这不是战争。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为反对这条路线斗争而死。阿苏·马宗达为执行这条路线而死。两个人都是由于这条路线而死。

印度共（马列）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左右两种偏向的种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必须记住：在革命时期，在革命前进过程中，在同修正主义战斗取得每一次胜利之后，右倾机会主义会以左倾冒险主义的姿态表现出来，并力图破坏党。一开始，印度共（马列）就有这种迹象。但是迹象不多：一些孤立的无理性的行动，突如其来的短暂的一阵狂热，对密谋的过分依靠，一种只依靠青年和学生而不是直接依靠劳动群众的倾向，这样就把重点转移

了。但是所有这些都，看来只不过是汹涌澎湃的、清洁的革命河流中的一些残存漂浮物而已。因此，这些东西没有被人注意到就流过去了。也许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事实依旧是：这些东西积累起来，集中起来，一系列“理论”出现了。这种理论开始是从性质上描写通过密谋实现个人暗杀的技巧的。在开始时，这种个人暗杀行为是要成为一个起飞点，成为政治宣传、组织工作和组织游击力量、建立解放区之间的一个环节。这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到四、五月间，它被提高为唯一的方法，唯一的环节。紧接着就宣布它是人民民主革命各个阶段的战略。那些在三月间接受这种理论的人没有能够看出，把密谋当作唯一的组织方法，把密谋组织置于党组织的控制之外，把歼灭的定义缩小为只意味着割断脖子——这种理论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条路线的迅速成功——以割断脖子这一点来衡量——，使一切问题化为乌有或者似乎是修正主义的。只要保持原来条款规定的先决条件，“胜利”是不多的；活动范围依旧限制在农村，偏差并不是惊人的，是能够纠正过来的。但是后来，来了个城市“行动”，接着是城市歼灭。各种新的理论开始纷纷出现。

- 1、整个印度的资产阶级是买办性的。
- 2、受一切知识分子或现代社会所尊敬的过去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 3、书越读越蠢。
- 4、捣毁塑像、学校、学院、实验室，是正确的、

革命的、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类似的。

5、一个积极分子代表他的整个阶级。一个无地贫农参加一次歼灭活动，就意味着整个无地贫农群众准备参加歼灭活动。

9、宣传和组织工作等等是不必要的，只要通过歼灭就可以做到这一切。歼灭必须摆在第一位。

7、为了使人民革命化，压迫是必要的。敌人杀害一个人，必须杀害一个敌人来抵偿。立刻报复成了信条。

8、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无需再到农村去了。通过捣毁塑像、学校、学院等等，他们就是与农村群众相结合。

9、在印度当今的时代，城市与农村、集镇与乡村是一样的，不可分的。城乡的工作是一样的，策略也将是一样的。城市中的唯一工作是武装游击进攻。

10、查鲁·马宗达同志是唯一的权威，只有他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就是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不服从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八年或者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并没有得到也没有要求过这种盲目的、迷信的、无理的服从。

11、富农是敌人，可以加以歼灭。

12、有把握取得胜利才进攻，是修正主义的。

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同这一切进行了斗争。他的希望和革命纪律使他长期保持缄默。后来，当他开始出来说话，就受到了侮辱、孤立和谩骂，说他是中派分



子和懦夫。他对党的热爱和他对国际领导坚定的忠诚，使他能够斗争下去。他没有其他想法。

## 第五节 馬宗达同阿希姆·查特吉的分歧

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中最为绚丽多采的人物之一——阿希姆·查特吉，在担任加尔各答大管区学院学生领导人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一九六六——六七年，这个学院为寄宿舍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举行罢课，他在这次罢课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参加了印度共（马）领导的学生阵线。在纳萨尔巴里运动时期，尽管他与印度共（马）组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还不是它的党员。与加尔各答其他纳萨尔巴里分子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农民武装起义的任务。他和桑托什·拉纳一起组织了戈皮巴拉布普尔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由来自加尔各答的大约二十名大学生领导的。随后，他在印度共（马列）的组织内组成了一个叫做西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边区委员会的新组织，在毗连这三个邦的地区积极进行歼灭阶级敌人的活动。他在一九七一年比尔布姆的起义中也起了主导作用。

查特吉在一段长时间内是马宗达的忠诚信徒，他曾是歼灭路线和农民起义的坚定信仰者，也肯定是马宗达路线在斯里卡库兰之外的最重要的活动家。但是，以后他们之间在范围广泛的许多问题上<sup>③④</sup>——从孟加拉国和国际领导的作用，到诸如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等问题——出现了分歧，最后查特吉发表和散发了一份对马宗达的领导大加批评的文件<sup>③⑤</sup>。此后不久，查特吉化名潜逃到兰契，被那里的警

察逮捕——他的追随者们怀疑是马宗达把他出卖给警察的。几乎在同时，人们知道了：北京电台在它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的一次广播——这是约十个月来该电台关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第一次广播——中，几次提到边区委员会，却一次也没提到马宗达，而且还批评了印度共（马列）领导者们的一些政策。

马宗达同查特吉之间的主要分歧是：

一、国际（即中国）领导的作用。查特吉声称，马宗达不忠实于中国的领导，并试图以他的领导代替中国的领导。作为例子，他举了东巴基斯坦共产党（马列）的声明，该声明说该党正在马宗达的指导下进行斗争。查特吉认为，马宗达指导东巴基斯坦革命者的行动，等于鼓励多中心主义，无视中国党的权威，并等于“孟加拉沙文主义”。马宗达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以来未能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反对“印度侵略”一事，也被举出来作为他不尊重中国领导人的又一例子。查特吉还声称，马宗达不愿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有关印度革命的问题拿到党委讨论或发给党员们传阅。查特吉在其文件中摘录了马宗达的话，以证明马宗达不尊重中国党<sup>③⑥</sup>。

二、查特吉还批评了进行歼灭运动的方式。据他说，因为马宗达不愿建立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歼灭）运动未能产生结果。尽管暗杀了一百二十个阶级敌人，还活着的敌人并没有离开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活动的地区，人民并没有起来支援党，而党的干部则一天天对运动失去兴趣。

雇农和贫农对运动没有响应，而且，从这些阶级中连一个能够长期积极工作的干部也找不到。这条路线只受到青年、中等阶级、土匪和游民无产者的欢迎。虽然查特吉不反对歼灭运动本

身，但他希望这个运动同群众活动结合起来，而这是马宗达反对的。

三、查特吉对歼灭运动的另一个方面也持批评态度，批评它强调杀阶级敌人，同时却以进攻警察和军事机构会挫伤革命派的阶级仇恨为理由而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进攻。查特吉评论说，这个不进攻国家强制力量的政策，削弱了运动，增强了敌人。

四、马宗达“迷恋”传统武器，反对使用火器，对此查特吉很为恼火。查特吉举了一个例子：游击队员们从戈皮巴拉布普尔的富农那里缴了九枝枪，并将它们交给了党，马宗达却指责那里暴动的领导人依赖火器，并建议他们销毁那些武器。他甚至到了这种程度，竟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我再也不要任何戈皮巴拉布普尔事件。”

五、马宗达同查特吉在游击战争的战略这个重要问题上也持不同意见。马宗达的分析是从这个假设出发的：在现今时代，帝国主义力量是软弱的、腐朽的，处于失败的边缘。这就是说，据他的看法，他们（帝国主义力量）将不可能对一块广大的地区实行控制。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南越的经验——在那里，帝国主义者已经撤到一些据点和城镇中，而把农村留在革命派手中——，他做出结论说：即使在印度，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力量的傀儡的统治阶级，也将同样被迫把他们自己限制在孤立的据点里。因此，革命派将有可能同样地在全国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查特吉则坚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的标准范例，认为这些根据地“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这样，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sup>③7</sup>。换句话说，争论可归

结为：纳萨尔巴里分子是否应建立红色根据地，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全国各不同地区的革命潜力是否平衡。查特吉指责马宗达不允许建立红色根据地，他坚持说，没有红色根据地，就无法保护革命的成果。

六、查特吉还尖锐地批评马宗达一方面预言印度将在一九七五年解放（他认为这反映了马宗达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又不做任何努力去建立一支解放军。马宗达要求这样一支军队的士兵个人应具备的条件过于苛刻。这就是为什么在纳萨尔巴里附近的马古尔詹的无地农民夺取警察步枪事件之后，尽管马宗达号召建立一支红军，军队却建立不起来。

由于在几个地方执行马宗达路线时查特吉曾起过重要作用，查特吉对马宗达的攻击就具有重大意义。查特吉争辩说，由于在活动地区没有群众起义的迹象，所以尽管他这一派杀死了一百二十个阶级敌人，路线还是失败了。他说，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忽视了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忽视了建立红色根据地和人民解放军的必要性，以及忽视了尊重中国党的国际领导的必要性。

## 注 释

①参看本章附录一。

②参看第一章。

③《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

④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土地革命》，《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还可参看第三章。

⑤参看前面几节。

⑥参看第二章。

⑦参看注释④。

⑧参看前几节。

⑨库尼卡尔·纳拉亚南：《印度的毛主义》，《新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⑩参看前几节。

⑪参看安得拉邦革命派的《当前纲领》，《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马利卡米纳·拉奥：《印度的毛主义——两个派别》，《新地》，周年号，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

⑫《关于政治组织报告》，见查鲁·马宗达的一次演说，《解放》，一九七〇年五——七月。

⑬《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决议》，《解放》，一九六八年六月。

⑭《大动荡时期》，《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⑮《当前纲领》，《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

⑯同上。

⑰《论斯里卡库兰吉里江人的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莫汉·拉姆：《印度的毛主义：两条策略路线》，《防务研究和分析》学会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

⑱参看莫汉·拉姆：同上。

⑲T·钦尼：《做什么》，《新地》，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⑳参看莫汉·拉姆，前引文。

㉑《是建党的时候了》，《解放》，一九六九年三月。

㉒《论同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分歧》，《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

㉓同上。

- ②④ 参看马利卡米纳·拉奥：《印度的毛主义——两个派别》，《新地》，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
- ②⑤ 《印度共（马列）对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无中生有的指责和无根据的攻击》，《无产阶级道路》，第一期。
- ②⑥ N·K·辛格：《意识形态斗争》，《新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
- ②⑦ 下面的摘录系引自该文件的孟加拉文本。
- ②⑧ 《大动荡时期》，《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 ②⑨ 同上。
- ③⑩ S·罗易：《两起死亡事件》，《新地》。
- ③⑪ 材料来源于一个党内文件《关于学生——青年运动》，此文件包括苏希塔尔·罗易·乔杜里的批评和查鲁·马宗达的答复。在这个文件中乔杜里用的是笔名普尔纳。
- ③⑫ S·罗易，前引文。
- ③⑬ 阿舒·马宗达是加尔各答的贾达夫普尔——加里亚地区的一名重要的纳萨尔巴里活动分子。他出身贫苦，先加入印度共（马），以后加入印度共（马列）。据说，他在一九六六年粮食运动中放火烧了《欢喜市场报》的运货车，对该报的一名记者之死负有责任。后来，他成了使他在贾达夫普尔地区的政敌恐惧的人物，但即使他们对手也赞赏他的许多品质，例如组织和发动人民的能力。他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西孟加拉议会选举日）同军队的一次遭遇中被打死。
- ③⑭ 在查特吉同马宗达的争执公开化很久以前，《解放》发表的一些报道中就有一、两个迹象，表明马宗达对边区委员会的不满。马宗达在一九七〇年年中某个时候致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谈到戈皮巴拉布普尔地区纳萨尔巴里运动某些干部的死亡时写道：“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我们能说不会犯错误吗？但现在不是忏悔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必须纠正……看来我们在那里的错误渊源于它的政治偏向，

即把人分为部族人和非部族人”。参看一九七〇年八月《解放》刊登的《新人的诞生》一文。在下一期《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里出现了如下的评论：“来自西孟加拉各县的报告还说明另一事实，即农民的武装斗争，只有在同志们十分认真地、无保留地坚持我们热爱的查鲁·马宗达同志的路线的那些县里才有可能变为燎原之火。”报道进而暗示：“在修正主义仍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同志们仍然迷恋于其它斗争形式、公开活动和在开始阶段使用火器的地方”，游击队正在碰壁。毫无疑问，这一批评部分地是针对阿希姆·查特吉的。

- ③⑤这个文件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前党的工作总结”，第二部分是“论孟加拉国”，均用孟加拉文写成，作为西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边区委员会提交印度共（马列）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发表。
- ③⑥查特吉引用了马宗达在县委会议上的讲话：“象坐在大人肩膀上的小孩一样，我们这些目前正在搞革命的人，现在能够比主席本人看到更多的东西。”
- ③⑦《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印度的春雷》。

# 第七章

## 中国共产党、印度共（馬）和 印度共（馬列）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馬）

六十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好几次，这些分裂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看法在其中起了作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分裂导致印度共（馬）的成立，一九六七年第二次分裂产生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和印度共（馬列）。其后，印度共（馬列）又因为对中国路线的各种不同解释而分裂成为更小的派别。

在五十年代，中印双方因西藏加入中国而引起冷淡关系和互相猜疑，但后来中国对印度政府的态度是友好的①。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一九五四年签订了周恩来—尼赫鲁协定，协定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接着就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亚洲会议，两国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在联合国为中国的会籍提出倡议，成为五十年代中这一机构每年例会上都要出现的一个特征。两国领导人进行互相访问，每次访问都有许多普通男女走上街头欢迎来自对方的贵宾。两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强调了这两个伟大和古老的文明在历史上的联系，以及他们在殖民统治下的共同经历。一九五九年，仅在两国边界争端公开化之前几个月，《北京周报》写道：“尼赫鲁是中国的朋



友，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的反对者。”②

一九五九年西藏封建分子暴动后，中国的态度就变了，在这以后，达赖喇嘛带着他手下的人、黄金和其它贵重物品逃到印度去了。对也好，错也好，中国怀疑印度反动派策划了这次叛乱。印度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它反对西藏加入中国，主张印度改变对西藏的政策。这次暴动增加了他们的运动的力量。中国对印度接待达赖喇嘛是不高兴的，并且也为象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这样的知名人士和人民同盟这样的团体在这个问题上的狂热活动而生气。还有一个报道说，达赖喇嘛的同伙正在外国的支持下建立一支队伍去收复西藏。可能这一切事态发展使中国人思想上产生了怀疑：印度在逐渐改变它以前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并正在转向美帝国主义的阵营。正是在这个时刻——一九五九年七月，一九五七年在喀拉拉邦上台的共产党政府，在基督教教会、穆斯林宗教团体和各种种姓组织参加并支持国大党而开展一次运动之后，被中央政府解散了。这一运动制造的反共歇斯底里一定不会不受到中国人的注意。

在这里讨论边界问题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已由印度政府早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用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了③。但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印中关系不是由于上述事态发展而恶化起来，边界问题是不会显得那么重要的。中国方面对边界争端来信的调子，开头是温和的，虽然中国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他们也许是准备谈判出一个紧紧沿着那条线划界的解决办法。一九六〇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德里谈判，但谈判失败了。争论一旦公开，印度政府就受到人民同盟集团强大的压力，要它采取强硬的立场，在这以后，政府要友好地解决争端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

两国之间的关系严重地恶化，最后导致了一九六二年短暂的边界战争。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纠纷，同时也使印度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派别斗争公开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两条路线之间的分歧涉及他们对印度统治阶级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占支配地位的那一派主张对执政的国大党采取和解的态度，把它看作是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不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封建分子和大企业的利益的。而反对派对国大党则采取不妥协的立场，把它看作大企业和地主分子的政治组织。这个分歧与边界纠纷和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是毫无关系的。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赞成占支配地位的那一派的纲领。但是在边界纠纷公开宣布之后，党内在印度革命纲领问题上的冲突，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到一九六二年战争的时候，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同党的纲领和边界问题就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五九年党内派别的阵线并不分明。例如，虽然象什·阿·丹吉这样的“右派”一开始对中国就采取敌对的态度，而其他人，象西孟加拉党组织的右派分子（除去波瓦尼·森这一突出的例外之外，包括这一派几乎所有其他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亲华的立场④。但当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争论和边界纠纷搅在一起，苏联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同印度政府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时候，右派在这一问题上就联合一致地反华了。除了象埃·马·森·南布迪里巴德和布佩希·古普塔这样一些党的领导人有一段时间采取“中派”立场外，在边界战争时这个党就明显地分成“右派”和“左派”。右派包括在苏中意识形态对抗中支持苏联、在边界问题上反对中国、主张同国大党采取统一行动

政策的那些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左派就不那么容易划分了。

战争后不久，党的左派成员就被警察围捕关到监狱里去了，一直关到一九六四年初。这次有选择的逮捕使一些左派支持者怀疑右派领导人曾伙同当局来辨认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他们也指责党的右派领导人除了作出要求释放营救左派同志的决议外，别的什么事也没有干。战争后不久，一个左派地下组织就开始活动，和党的正式机构平行开展工作，单独开会，散发自己的文件，开展运动争取释放其领导人。

一九六四年初左派领导人被释放后，曾做出努力，以弥合分歧，共同工作。但左派声称，右派领导人不愿放弃他们对组织的控制，不让一些左派分子进入制定政策的最高机构。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发生了正式的分裂：新德里国家档案馆的一名研究员提出了一些文件，说明丹吉在二十年代曾保证为印度的英国当局工作，作为他获释的条件，左派领导人于是要求党的主席丹吉辞职。新党——被称为印度共（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一九六四年较晚时候举行。

因此，印度共党内的分歧早于印中边界纠纷和中苏意识形态的争论。实际上，从一九四七年起，在印度共内部就始终存在着几种互相冲突的倾向，而且不论在什么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的倾向的主张被采纳为党的正式政策，其它倾向则继续同正式的领导进行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正式路线的拥护者们失去多数时，一种倾向就会代替另一倾向而成为党的政策。例如，一九四七年党号召建立一个包括从甘地到共产党人都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在独立后上台的新政府则被欢呼为“人民政府”。但是下一

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右的倾向”受到激烈攻击，当时的领导人就为那些把新政府称为“民族投降与合作”的政府的人们所代替。这次代表大会还号召群众起义，但在两年内，这条“左倾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路线”受到了批判，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右派和左派之间在对执政党的态度上一直有冲突。

但从一九六四年以后，事态发展已经脱离了党内斗争这种人们所熟悉的形式。过去，所有不同的倾向都在党内同时存在，但一九六四年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每一种倾向都成为一个有明确宣言和纲领的单独的政党。这样的事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统一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认为得到国际领导的承认是事关紧要的。如果他们决定脱离母党，就担心得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承认，这种担心使所有的人都留在同一个共产党内。一九六〇年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消除了这种束缚。国际承认（从其原有的意义说），对于一个党的活动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如果苏联不愿承认一个党，这个党可以到中国、北朝鲜或者越南去取得国际支持。

由于印度共（马）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对苏联党的批评，它成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由于苏联支持印度共，所以中国党以赞许的眼光看另一个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个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分裂成为支持苏联和支持中国的两部分人，印度事态的发展是与此世界现象有联系的。在印度，印度共（马）被戴上亲华的帽子。印度共（马）成立后不久，印度政府就把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关进监狱，理由是它们同情中国。在印度共（马）的党员中，中国是受欢迎的，

每一份新的中国出版物，都会在新党的队伍中找到现成的市场。

这两个党之间有许多分歧。虽然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在苏中两党意识形态争论上又有分歧。为了在党确定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之前有更多时间在党内进行充分讨论，印度共（马）决定，在为印度制定一个一致的纲领时，推迟进行有关国际问题的意识形态讨论。党把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分开，理由是：虽然对国际问题需要作详尽的研究，但党对国内问题是熟悉的，而且迫切需要根据有关国内问题的纲领划清新党同印度共之间的界限。印度共（马）在其一九六四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它只受两个国际性文件即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世界八十一个共产党声明的约束。

一九六四年印度共（马）公布的文件强调“开展党内讨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不要匆忙地把带有追随苏共或中共所主张的路线的味道的决定强加于党”。文件接着又说：

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许多同志认为某些党或某些领导人个人是绝对正确的马列主义者这一信念，现在完全破灭了。我党一些党员坚决认为，苏共所主张的思想政治路线背离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走向修正主义，而另外一些党员同样强调，中共的路线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还有另一些人认为，公开的辩论和论战正在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损害，双方都歪曲对方的真正立场，而辩论的水平从其现象和尊严来说则与日俱下，以致在那些在政治上追随我们的人中间引起惊慌和沮丧。人们问道：如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瓦解，特别是如果苏联和中国分裂（这种事情今天正

在发生),关于新时代的论断会留下什么呢?印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报纸都欣喜若狂地大肆宣传中苏分歧,并假惺惺地对苏联一方表示同情,对中国观点表示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样就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和震惊。对苏联共产主义表示“热爱”和对中国式共产主义表示憎恨的这种做法,是极其令人迷惑不解的。鉴于上述情况,由最高委员会把匆忙作出的决定强加于党是无效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决定既不会正当地加以贯彻,也无助于建立党的团结。我们的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自主的组织,在全党经过一次充分和民主的讨论后,将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不论我们的敌人怎样狂喊乱叫,对共产主义事业进行污蔑,“亲北京”或“亲莫斯科”的问题都不会产生。在我们结束党内讨论、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前,我们都不应当公开批评和攻击苏共或中共的立场⑤。

直到一九六七年较晚的时候,即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后,印度共(马)才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正式立场。除了党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外,这种拖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再次被捕,直到一九六六年年中以前还没有被释放。一九六七年文件所声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形式,民族民主的概念和非资本主义道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以及关于苏联的物质刺激和修正主义等问题上,同中国立场很相近⑥。印度共(马)对苏联的批评还没有走到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地步,也不承认在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集团。它指出：中国认为世界形势是资本主义处于“最后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阵营是十分强大的看法，是同认为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平地演变为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的看法不一致的。它同中共唯一主要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关于同苏联在越南采取“统一行动”的可能性问题。虽然印度共（马）认识到同修正主义政权合作是困难的，但它仍然要求中国党改变其立场，即认为这样的联合行动原则上是错误的。

这两个党之间的第二个分歧是关于一九六四年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印度共（马）纲领的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对纲领中的某些问题表示了疑虑这件事，那时并非广泛地为人所知，但印度共（马）在题为《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意见》这本书的导言中，承认了同中共的这一分歧：“我们也想提请您注意，在诸如当前印度国家的性质、现政府及其领导的性质等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同中共和苏共在他们某些文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是有一些分歧和保留的。我们力求做到尽量客观，不怕说我们亲苏共或反苏共、亲中共或反中共（我们的敌人是常常要这样说我们的）。”⑦印度共（马）同中共对印度纲领的主要分歧可以归结如下：

- 1、中共认为印度“在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的资本家是“官厅买办性”的并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印度的统治阶级代表“四座大山”：由两个外国控制的地主和买办资本家以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⑧。印度共（马）的观点是：印度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印度本土的大商人及其封建同盟者。虽然统治阶级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决不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因此在它同外国经济

利益的关系中，既有“冲突的”因素，又有“竞争的”因素。

2、根据中共的观点，印度的统治阶级缺乏人民的支持，人民站在革命派这一边。因此，“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印度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舍此没有任何其它的道路”⑨。需要在某一个地方点起“星星之火”，它很快就会“燎原，一定要燎原”⑩。另一方面，印度共（马）相信，印度的统治阶级不同于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它通过各种政策成功地欺骗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个党认为，要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以孤立统治阶级，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就有限的要求开展有战斗性的运动和局部武装斗争（不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直到武装斗争条件成熟。

3、中共认为，农民在武装斗争中起主要作用。中国党认为：“印度革命必须走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⑪另一方面，印度共（马）表示反对它认为是把中国经验机械地搬到印度而不考虑本国国家性质、工业发展程度、工人阶级数量和传统的做法。

最后的破裂发生在印度共（马）参加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反国大党联合阵线政府的问题上。这些政府刚成立时，中国杂志不加评论地报道了这些消息，但在纳萨尔巴里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公开地出来反对这两个政府。《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西孟加拉的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也公然同印度反动派一起，对大吉岭的革命农民实行血腥镇压。这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些伙叛徒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奴仆，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不



过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⑫另一篇报道写道：“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抢粮事件同国大党政府统治下的那些邦一样频繁。在这两个邦里掌权的印度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丹吉集团分子，一直在帮助国大党欺骗人民。他们扬言这两个‘非国大党人民政府能够‘解除’人民的‘不幸’。现在，粮食严重的不足再一次揭露了他们的谎言。”⑬中国杂志的其它文章对联合阵线政府也都作了类似的评论。另一方面，印度共（马）却把这些邦政府看作人民手中的武器，在他们存在的那段时期里，可以防止警察和军队干预土地或劳工纠纷的问题以及鼓励群众参加群众性活动而不用担心警察的报复，因而成功地使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失去作用。印度共（马）希望通过这些政府进行工作，来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局限性和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而无须用虚假的诺言欺骗人民。印度共（马）希望，政府的活动会揭露联盟中的富农党，这些富农党虽然同意了一个共同纲领，但一旦出现实行纲领的问题时，他们就会拖后腿。参加这些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而且还充分认识到这些政府的寿命不会很长⑭。

第一章已说明，纳萨尔巴里起义开始后，中国党曾鼓动印度共产党即印度共（马）内部的“革命派”退出该党，成立一个新党；同时也说明，虽然这一号召在喀拉拉和西孟加拉影响甚微，但在其它一些邦里，特别是在安得拉邦，印度共（马）有相当多的党员加入了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行列。虽然在某些邦里印度共（马）的很大一部分党员这样做是有多种原因的，但鉴于印度共（马）的意识形态、阶级分析和纲领，鉴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直到一九六六年较晚时印度共（马）的领导人才能公

开活动，因此，有些人退党向左转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印度共（马）在多数问题上支持中间立场，避免走极端。因此，它的立场，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始终不能容易地被归纳为一套简单化的行动口号。以下几个例子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印度共声称，印度的统治阶级是进步的、反垄断资本和反帝国主义的；印度共（马列）说，印度的统治阶级是买办性的，是完全依赖帝国主义生存的；印度共（马）则认为：印度统治阶级不是买办性的，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傀儡，但同时又不是进步的或反垄断资本和反帝国主义的。印度共（马）认为，由大商人和封建分子组成的印度统治阶级同外国的经济利益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不能简单地用完全依赖或完全独立的字眼来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共是支持议会的，印度共（马列）是反对议会的，而印度共（马）则认为，在一些有议会的国家里，参加议会是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它指出中国、越南和其它大多数贫穷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此无关，因为他们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维持某种形式的民主来装饰门面。印度共（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工作场所应当是象工会和农民组织这样一些群众战线，议会则应当被视为进行宣传的另一个群众战线，而不应当把议会本身作为目的。

在这两个问题上，都能够把印度共或印度共（马列）的观点变为简短、明确而又易于被人理解的口号，但要把印度共（马）的观点表达出来可并不那末容易。如果人们记住，在纳萨尔巴里事件之前，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向干部

提出和阐明这个立场，那么，不论人们如何看待印度共（马）的政策，他们都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共（马）有些人退党向左转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支持对鼓动印度共（马）党员退党所以能起如此关键的作用，还有另一个原因。从一九四九年革命之日起，中国党在印度党的干部中就一直很有威望。虽然苏联党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受到高度的尊敬，但是中国有与印度相近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中国在地理上的接近，这就使印度党的党员更易于把他们自己同中国党等同起来。第一章讲到特仑甘纳斗争的领导者们如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教益，力图把这些教益同他们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七年的关键年代，印度共（马）的领导人拒绝参加那个时期的反华大合唱，并承受那一政策的后果，从而在自己的干部中为中国党的可尊敬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因此，当这个同一的中国党公开指责印度共（马）和鼓动共产党员退出它的队伍时，一部分党员会响应这个号召，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安得拉邦纳萨尔巴里分子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在印度共（马）布德万全会上，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不更早一些对印度共（马）的纲领提出异议时，他们承认，只是在听到中国对党的路线的批评后，他们才开始重新考虑党的路线<sup>⑮</sup>。此外，在印度成立一个亲华的党，是从一九六二年后不久开始的世界范围的进程的一部分。由于这一章里列举的原因，印度共（马）设有适应这一世界范围的进程。

印度共（马）的领导人对中国对其政策和纲领的攻击反应迟缓。他们在三个多星期之后，才对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电台广播的第一次攻击作出反应，但甚至这个回答也不过是关于两党对纳

萨尔巴里事件的分歧的一个六行字的声明<sup>①⑥</sup>。印度共（马）几个月后发表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温和地批评了苏共和中共的“使非执政党的国内阶级政策服从于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大国及其执政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关系的需要的倾向”<sup>①⑦</sup>。它注意到这些大党有干涉其它政党内部事务的倾向，并且声明：“曾为反对苏共领导人的这个危险倾向而正确地进行过斗争，并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首当其冲的中共，有时也无视这一原则”<sup>①⑧</sup>。

在印度共（马）发表的其它几个文件中，对于干涉还有更多的具体指责。在《我党同中共在纲领和政策的某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中，印度共（马）反对中国没有经过事先交换意见和讨论，就对它提出指责这种做法，印度共（马）还声明它愿意接受其它国家的劝告和学习他们的经验，但与此同时，只有党才是唯一能够根据它对印度情况的理解来判断它应接受什么劝告和拒绝什么劝告。然而，印度共（马）领导人指示其党员不要超过那个文件的调门去批评中国党<sup>①⑨</sup>。

在这个文件和其它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中，印度共（马）的领导人赞同地引用了中国的刊物和毛主席的著作来概括它自己对“兄弟党之间的正确关系”的观点。它引用了如下一段话：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sup>②⑩</sup>。

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九六五年北京出版）中引用这一段话，暗示中国党在同苏联党的关系上是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但与此同时，它在同印度共（马）的关系上，则力图仿效这个党的权威架势，并企图通过使许多人退出印度共（马）的做法来在印度建立一个附属党。

随后几年，印度共（马）在诸如孟加拉国、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等其它某些问题上公开表示不同意中国党的观点。在中国方面，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反印度共（马）的文章，到一九七〇年后期这类文章就为数甚少了。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馬列）

纳萨尔巴里分子从不掩饰他们对中国党及其主席的忠诚。印度共（马列）的纲领声明：“印度的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可靠根据地。我们的革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团结和胜利的大会——极大地鼓舞国际无产阶级的时候进行的。它是在以毛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领国际无产阶级完成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全人类、在地球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的时候进行的。我们是这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一支分遣队。”<sup>②1</sup>

一九六九年党代表大会的政治组织报告也反映了同样的感情，它声明：“我党——印度共（马列）的成立，是印度革命人

民的胜利，也是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在印度国土上的胜利。”<sup>②②</sup>报告强调指出：“我们的领导人和干部应当有条理地和认真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制定的工作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维护我们的革命斗争并使之取得胜利。”<sup>②③</sup>报告接着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着人类最后的解放前进。”它最后说：“有毛主席，胜利就是我们的”，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sup>②④</sup>

对纳萨尔巴里分子来说，“国际主义”是他们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提出象“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等口号，向“民族沙文主义”作斗争并以此为荣<sup>②⑤</sup>。对纳萨尔巴里分子说来，保卫中国就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共产党人保卫苏联一样重要。“（毛）主席的中国可能受到攻击，因此要加速（印度）革命的任务”，是刷在加尔各答墙上的为运动最宠爱的两个口号之一。他们非常关心中国的安全，因此，纳萨尔巴里分子会互相指责没有恰当地估计美国以及苏联对中国安全造成的真正威胁<sup>②⑥</sup>。大约和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印度开展活动同时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成为鼓舞他们的一个巨大源泉。

因此，中国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相应的经验，就成为衡量印度任何一个行动纲领的尺度。印度当前的情况被认为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相似之处：统治阶级是由不过是外国商业剥削利益的附庸——买办资产阶级和建立在农奴制、高利贷和压迫基础上的封建阶级组成的。反对这些“可恨的压迫者”的，是革命的农民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解放军。他们把斯里卡库兰的起义同延安相比，把一九七〇年在加尔各答对教育机构进行的袭击同中国一九

一九年五四学生运动相比。他们把歼灭阶级敌人的运动同中日战争时中国党发动的歼灭战相比<sup>②7</sup>。在印度，每件事是否站得住脚，就要看它同中国的经验的关联了。

中国党的强大影响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甚至在他们使用的词句和词藻中看到。每一个党员要学习毛主席和×副主席的著作，要在农民中宣传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党在几篇文章中，特别是《人民日报》著名的社论《印度的春雷》中为他们概括的纲领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翻版。在阐明印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性时，他们讲到四座大山，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成为一条座右铭，在他们杂志的每篇重要文章中几乎都可以发现象“欢呼正在兴起的革命风暴”这一类词句。卡努·桑亚尔关于纳萨尔巴里经验的特莱报告，是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报告为蓝本的，他们的杂志上也出现了几篇忠实于中国传统的个别农村调查。

对中国共产党表示的这种忠诚，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特别是印度共（马列）说来，有利也有弊。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因为没有中国的庇护，印度共（马列）也就会同这个次大陆上许许多多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差别。象印度革命共产党、革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统一中心这样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在印度进行活动有好多年了，但它们对国内的政治没有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承认。国际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生命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共产党国家之一，有着丰富和相当新鲜的革命斗争经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始终是来自外部的一个鼓舞源泉。随着苏联党的战略和策

略在革命斗争中重要性的下降，随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出现，以及它对其它国家革命运动表示的同情和支持，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本国革命时愿意遵循中国党的指导，这不过是意料中的事。当我们把印度共（马列）同其它纳萨尔巴里派特别是同安得拉派比较时，就可以看出中国党的庇护作用对印度共（马列）的成長的重要性。在开头，纳吉·雷迪领导下的这一派是协调委员会中最大的纳萨尔巴里组织，它有更多的知名的领导人，但它自从退出协调委员会和印度共（马列）之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承认了印度共（马列），而对安得拉派则视而不见。

中国党的这种支持对印度共（马列）的成長，还有其它几个积极作用。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几百个官方和非官方报纸杂志的宣传，印度共（马列）成立后，几乎马上就得到全世界极大的注意。虽然查鲁·马宗达不过是共产党里一个小地区组织的领导人，而且在他参加印度共（马）期间，在他所在的县之外，甚至在西孟加拉邦的党员中，也很少人知道他，但当他的名字在中国刊物上首次被提到后不久，对于全世界几千万敬仰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他就变成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马宗达和他的党在各国左翼人士中，远比那个在印度拥有多得多的追随者但没有类似国际上的依附关系的印度共（马）出名。

在国内，纳萨尔巴里分子也得到比他们的活动应得的更大的注意，因为人们把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们讲到印度武装斗争时，政府和报界的许多人把这类言论解释为中国政府打算颠覆印度政府的声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所有活动和声明，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目的反映。



但对中国党的忠诚，也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最大弱点。他们感到有义务去证明中国党和政府对印度和全世界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和政策声明都是正当的。而在某些场合下，对中国路线相互矛盾的解释使党内产生了不同派别，各派彼此谴责对方是反华的。下面列举的一些问题说明，纳萨尔巴里分子由于力图解释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一九六六年，约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前一年，中国报纸支持由圣僧（一些被认为是看破红尘的人）在德里组织的并为几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支持的一次激烈的示威。组织这次示威的目的是强迫政府禁止宰牛，结果引起暴乱。由于中国党支持一个反动的教派，在印度受到了批评，纳萨尔巴里分子就难以为这种支持辩护了。他们是这样解释中国的政策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回想起：一九六六年在圣僧这种十足的反动派领导下的一次骚动，自发地转为对印度反动政府和执政的国大党的斗争。我们的中国同志在北京广播电台报道这一事件时声称，这次抗议示威反映了我国人民对象大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印度人民头上的国大党及其政府的深刻不满和愤怒<sup>②⑧</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从这一事件得出结论：“所有针对政府的暴动都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而“对领导者的作用的详细分析，无助于这一任务，反而加强了反动派的力量”。<sup>②⑨</sup>

这一原则——反对政府的任何暴动都是好的，即使暴动的领导者的作用和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被用来估价喀拉拉邦库尼卡尔·纳拉亚南派对警察的袭击。从个人来说，库尼卡尔是一个被纳萨尔巴里运动抛弃的人物，因此，在纳萨尔巴里分子看来，他

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但这并不妨碍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巴里分子支持这些袭击<sup>30</sup>。同样，他们支持了琴纳·雷迪和当地其他封建头目领导的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在特仑甘纳进行的单独设邦的斗争，根据的原则是：在判断一次反政府的群众暴动时，领导者是谁，是无关紧要的<sup>31</sup>。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一切场合下都始终如一地应用这一原则的。对印度共（马）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罢工，即使中国报纸和电台提到过一两次，也是不能加以支持的，而且，孟加拉国的斗争也不能加以支持，因为它的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是以反共出名的。

关于中国对孟加拉国的路线的争论，是扩大马宗达和查特吉这两个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心人物之间的裂痕的重大因素。第六章概述了他们两人之间在包括孟加拉国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但是，比双方提出的实质性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对孟加拉国问题进行辩论的方式。马宗达提出的正式路线并不反对解放斗争本身。这条路线是以敌视穆吉布·拉赫曼为基础的，拉赫曼被描述为印度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而印度和帝国主义是力图使运动脱离武装斗争道路的。这条路线把中国立场解释为从根本上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而不是反对对巴基斯坦军事集团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穆罕默德·杜哈派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孟加拉国的思想上的同党人，在反对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中，他们力求提供另一个领导来代替穆吉布·拉赫曼<sup>32</sup>。

这一路线的主要反对者是阿希姆·查特吉，他把这条路线称之为“中派主义”和“反华”，因为，印度共（马列）不是支持叶海亚·汗政权反对他所认为的印度对巴基斯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他认为这同中国对此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却

鼓动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他争辩说，这条路线有助于帝国主义的事业，虽则是不自觉的。查特吉也反对马宗达的“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表现在他对“一个孟加拉”这个口号的支持和自称他是通过杜哈派指导着孟加拉国的武装斗争。查特吉问道：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派被认为是在中国党和它的主席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马宗达怎么能自称他在指导另一个国家的革命进程呢？查特吉认为，这等于越过“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sup>③③</sup>。

使纳萨尔巴里分子十分放心不下的另一个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景：美国和苏联一起进攻中国，而印度政府在这次侵略中将作为这些超级大国的同谋者行事。印度共（马列）领导人在几个文件里提醒他们的干部要记住毛主席的警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马宗达责备比哈尔邦组织不认真对待这一口号<sup>③④</sup>，而查特吉则批评马宗达夸大这些话的含意<sup>③⑤</sup>。纳萨尔巴里分子，正象其它国家的革命派一样，认为加强他们自己的活动，以削弱帝国主义者们的战争准备，是个神圣任务。马宗达甚至迟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他在《解放》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还重申了这一口号，他说：“主席的中国很可能在一九七一年受到进攻。”<sup>③⑥</sup>然后他接着说，这次侵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核战争。他向党员发出了下列指示：

从今天起，我们应当告诉农民群众挖地道的必要性。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还不能认识到地道的重要性。因此，应当向他们阐明地道长期的用处，这就是，应当告诉他们，从地道里挖出来的土可以用来筑坝，解决灌溉问题<sup>③⑦</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中国党的政策和实践的这种不可动摇的忠诚，最终证明它是致命的。中国对叶海亚政权的支持和对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国的大屠杀采取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使许多纳萨尔巴里分子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由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在一九七一——七二年发生转变，特别是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认真对待美苏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因此纳萨尔巴里分子中幻想破灭的人就进一步增加了。此外，再加上中国党对印度共（马列）领导人的批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的派别斗争<sup>③⑧</sup>。

从纳萨尔巴里起义起直到一九七〇年年中，中国杂志经常地报道了纳萨尔巴里的活动。这是印度共（马列）接受农村起义的思想的时期，他们在斯里卡库兰、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举行了起义。但是，中国人对运动的文化革命或者城市游击阶段从未表示任何热情，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城市活动也都完全被中国报纸忽视了。也许中国党期望纳萨尔巴里分子会从它对他们在加尔各答行动表示的沉默得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改变运动的重点，使之回到农村去。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而且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之后的时期中，纳萨尔巴里活动仍然几乎完全限于加尔各答市及其市郊工业区，这样，中国的杂志和电台除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发表了一条表扬查特吉的边区委员会而不提及马宗达的委员会的简短新闻以外，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起就停止广播有关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消息<sup>③⑨</sup>。

一九七〇——七一年某个时候，中国党的确给马宗达寄过一封信，对印度共（马列）活动的某些方面表示了保留意见，现在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查特吉在被捕前向党提出的文件中，谴责马宗达封锁了中国党的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批评了他的政策<sup>④⑩</sup>。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个由卡努·桑亚尔和钱·特杰斯瓦拉·拉奥以及其他四个人签名的文件在印度共（马列）党员中传阅，这个文件概括了中国文件的主要点。这个文件暗示，虽然印度共（马列）的总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制订政策上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例如把毛泽东称作印度的主席，在中国党的“歼灭战”的名义下采用秘密暗杀的手段，忽视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和土地纲领的任务，把流血作为衡量党员革命热情的尺度，把游击战争的军事问题同政治、组织问题混淆起来，以及错误解释统一战线的战略①。

这些批评等于说，虽然印度共（马列）声明它自己是一个亲华的党，但它的活动和政策却是违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的。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堪称国际主义者，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问题，并把这些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国家的经验联系起来。中国党在它的斗争时期，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它决不可能想到要提出“苏联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样的口号。下面的一段毛语录就是他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典型的态度：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

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sup>④2</sup>。

从这一段话来看，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形式违背了中国革命的精神。这是同印度社会具体情况没有联系的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但是为纳萨尔巴里分子说句公道话，中国党一九七〇——七一年的批评来得太晚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如今受到鼓舞的源泉不是中国解放斗争的经验，而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个时候对中国党和毛主席形式上的忠诚超过了对党的政策内容的忠诚。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在中国党注意到“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个口号的缺点以前，中国有几个杂志就发表过马宗达的以这个口号为题的文章，在全世界为它作了宣传。同时，也值得指出，中国党虽然曾一度把马宗达欢呼为印度革命的领导人并赞扬过他在斯里卡库兰起义中的“个人指导作用”，但在上述文件中却间接地提到他的领导并写道：“一个领导者的权威和威信是不能制造出来的，而是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sup>④3</sup>马宗达死后，中国报刊就再也没有片语只字提到他了。

## 注 释

- ①参看普勒门·阿迪：《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南亚》，《当代亚洲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二卷，第四期。
- ②《北京周报》，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
- ③详见内维尔·马克斯威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九七〇年。
- ④拉希里有一次在加尔各答广场发表演说支持中国的边界要求。
- ⑤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一个党内文件。
- ⑥印度共（马），《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一九六七年。
- ⑦印度共（马），《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意见》，一九六四年。
- ⑧《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和印度共（马）《我党同中共的分歧意见》，一九六七年。
- ⑨同上。
- ⑩同上。
- ⑪同上。
- ⑫《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 ⑬《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 ⑭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西孟加拉的甘地主义》，《当代亚洲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二卷，第三期。
- ⑮印度共（马），《致安得拉同志们的信》，一九六八年。
- ⑯《人民民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 ⑰印度共（马），《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一九六七年。
- ⑱同上。
- ⑲印度共（马），《我党同中共的分歧意见》，一九六七年。

- 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九六五年北京出版。
- ㉑印度共（马列），《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一九六九年。
- ㉒印度共（马列），《政治——组织报告》，一九六九年。
- ㉓同上。
- ㉔同上。
- ㉕这一口号出自马宗达的同名文章《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该文是在《解放》上发表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 ㉖印度共（马列）——比哈尔组织，《新的潮流和在某些问题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 ㉗普尔纳：《关于学生——青年运动》，一九七〇年，党内文件。
- ㉘《解放》，一九六九年一月。
- ㉙同上。
- ㉚参看第一章。
- ㉛《解放》，一九六九年五月。
- ㉜《解放》，一九七一年一——三月；《爱国者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
- ㉝阿希姆·查特吉：《论孟加拉国》（孟加拉文），党内文件。
- ㉞印度共（马列）——比哈尔组织，前引文。
- ㉟阿希姆·查特吉：《当前党的工作总结》（孟加拉文），党内文件。
- ㊱查鲁·马宗达：《前进，胜利的日子已经临近》，《解放》，一九七〇年九——十二月。
- ㊲同上。
- ㊳《主流》，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③⑨《政治家报》，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④⑩查特吉：前引文。

④⑪《主流》，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④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④⑬《主流》，前引文。

# 第八章

## 結 束 語

以上各章分析和调查研究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各个方面、激励他们的思想和他们在其短暂历史各个时期所采取的各种做法。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我们现在有可能试图对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性质及其对印度政治的影响做出某些总结。在这一章，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但并不认为这些回答都一定是正确的。纳萨尔巴里主义是一个涉及许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渊源、发展和最后的瓦解，是复杂多变的局势的产物；我提出的解释，虽然对了解这一运动还是有用的，却也只能是不全面的。首先，纳萨尔巴里分子到底组成了政党，还是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具有良好的意图，纳萨尔巴里主义仍主要是一个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的运动？他们的组织怎样不同于各个共产党的组织？印度共（马列）是一个毛主义的党吗？为什么会产生纳萨尔巴里主义，什么因素促进它成长并决定它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发生的？最后，纳萨尔巴里主义的前途如何？

### 运动的梗概

如我们已看到的，运动是由西孟加拉邦北部的一个小区域纳

萨尔巴里的起义开始的，继续了大约两个月。当时邦政府是由几个政党的联合阵线管理的，而印度共（马）则是参加联合阵线的政党之一。虽然警察一开进这个地区运动就结束了，但这一事件却结束了印度共（马）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促进了联合阵线政府的瓦解。印度共（马）以外的政党，猜疑这一事件是用暴力接管印度政府的更大计划的开端。

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宣称忠诚于中国党和立即开展武装斗争的纲领的小组成立起来了。一九六八年五月，这些小组成立了协调委员会。这些小组中最大的是纳吉·雷迪领导下的安得拉派。正是在安得拉邦，就退出印度共（马）的人数说，纳萨尔巴里分子取得了最好的结果；但是在协调委员会内部，查鲁·马宗达的西孟加拉小组影响较大。在其他小组的心目中，安得拉小组对运动的赞助是可疑的，因为起初它在离开母党方面表现了犹豫。开头，协调委员会反对仓促建党，可是到了一九六九年初，它改变了态度，向全国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发出了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号召。一九六九年四月，印度共（马列）成立了，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党的承认。印度共（马列）声明它支持在农村开展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武装斗争，表示完全反对议会制度。安得拉组织被开除了，可是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组织得到了新党的直接承认。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这一时期，强调的是宣传和建党活动，只有斯里卡库兰的部族地区是例外，在那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旬开始了起义。

纳萨尔巴里运动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它企图在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把“歼灭阶级敌人”的政策作为它在农村地区唯一的行动纲领。武装斗争按照这种想法在几个地方开始了，明显的是在

斯里卡库兰县的帕尔瓦蒂普兰部族特区、西孟加拉邦的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但是这些斗争没有一个持续了很久。到一九七〇年年中，在农村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实际上已被消灭了。进行歼灭运动的重大后果是摒弃了经济斗争和群众活动，并在党内使政治组织从属于游击组织。

在第四阶段（从一九七〇年四月起，持续一年之久），加尔各答及其郊区成了纳萨尔巴里分子活动的主要地区。起初，活动限于袭击教育机构、毁坏民族领袖的塑像、抵制考试等。可是后来，歼灭政策在城市里也实行起来了，行动小队的主要对象是非武装警察、小商人、印度共（马）的工作人员。纳萨尔巴里分子也控制了几个地区——称作“解放区”，他们的政敌都被赶出了这些地区。城市地区的这些活动，吸引了退学的青少年、在学青少年和反社会分子参加到运动中去，这些新成分把到当时一直是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先锋的大学生排到后面去了。城市地区的这些活动，在全国各地对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宣传工具反过来又引起更多的活动，给运动带来了新的干部。自从开始城市的进攻以后，运动的力量在城市及毗邻地区就稳步增强，到一九七一年西孟加拉期中选举的时候，它已是邦内的一支公认的政治力量。

但是，加尔各答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纲领的两个主要方面——歼灭运动和放弃农村，在运动内部成了热烈争论的问题。最后，马宗达管理党组织的方式也成了党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结果是运动分裂成为许多派别。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组织脱离了马宗达的印度共（马列），斯里卡库兰组织也不准备再接受马宗达的“个人指导”了，在西孟加拉，党的一些忠诚分子，特别是苏希

塔尔·罗易·乔杜里，发言反对运动在城市的纲领。所以，到邦政府决定粉碎运动的时候（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八月），纳萨尔巴里分子已经是一支没有领导人、士气完全瓦解的力量了。他们的负责干部在同得到警察支持的反社会分子的一系列武装遭遇中被消灭了；非政治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则被争取到执政党那边去了。倖免于死的人员中，许多人被警察围捕。查鲁·马宗达（运动的创始人）一九七二年七月被捕后不久，在被警察拘押期间离奇地死去了。

这仅仅是前四章谈到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各个阶段的详情的一个概要。但是，这也就足以突出地说明运动的多方面的性质。不论是纳萨尔巴里主义的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不容易下定义的。印度共（马列）的正式政策，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改变；在该党内有许多股相互冲突的思潮；在各种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上，其它的纳萨尔巴里派别的看法彼此不同，而且又都不同于印度共（马列）。此外，随着党的政策的偶然改变，党的组织和干部成分也变化了。

## 党的組織

到现在我还没有详细地讨论过印度共（马列）的组织情况，而为了理解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性质，现在就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了。第一章说明了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建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党应当是从参加斗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共同经验中自然地发展起来；党应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而不是从上面强加下来。有些人说，按照苏联和欧洲的经验，在开始阶段

社会有许多派别的，它们在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次要问题上则彼此意见不同。另一方面，马宗达及其支持者则持以下意见：为了进行阶级斗争，“集中制”和“纪律观念”是必要的；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工作的协调委员会，从组织上说，是不适合于促进纳萨尔巴里活动的。中国党的建议也赞成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上的纪律严密的党去代替联系松弛的协调委员会①。当马宗达宣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时，他只不过是重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十分受到尊重的原理而已②。一个党，有建立在各级组织对一切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选举产生领导这种基础上的党内民主，又有铁的纪律，对上级党委的服从，对党的既定路线的忠实的坚持——这也许就是纳萨尔巴里领导人希望建立的那种党组织。一九六九年四月印度共（马列）的建立，显然是那些反对使运动组织松散的人们的胜利。

在运动的农民起义阶段，领导人强调了组织工作的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密谋的③。它的积极分子要秘密地进行工作，党的机构依旧处于地下。然而，并不是印度共（马列）的一切组织都同时转入地下。斯里卡库兰组织实际上处于地下，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它发动袭击住宅的计划的时候开始的。一九六七年在西孟加拉被捕的那些纳萨尔巴里分子，在第二届联合阵线政府上台后几乎立即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被释放了。党的成立大会是公开举行的，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在加尔各答广场举行的会议上宣布了印度共（马列）的诞生。在第二届联合阵线政府当政的整个时期，没有禁止纳萨尔巴里组织，印度共（马列）的出版物可以公开地买到。唯一的例外是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布普尔地区，在那里印度共（马列）是在地下指导一次起义的。在西孟加拉邦，第

二届联合阵线政府垮台后不久，党就转入地下，紧接着，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文化革命”就在加尔各答开始了。

在这一时期，印度共（马列）组织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它摒弃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党反对在有限要求的基础上开展群众斗争。虽然，在斯里卡库兰、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等地，农民组织是由纳萨尔巴里分子发起的，可是这些组织实际上是党的机器的附属物，而且致力于同一目标——夺取政权。

第三个方面是歼灭活动同党的正常机器分离。党的机器对于吸收游击队员的工作没有控制权。这种游击队的成分和暗杀对象的选择，是由城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志”决定的。游击小队内部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对个人”的基础之上的，有关小队的成分和密谋活动的情报，不能报告给政治组织。印度共（马列）组织的这种政治组织从属于歼灭小队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已确立的准则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苏联和在中国，在其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武装部队总是受政党的指导和其纪律约束的。此外，因为党对于吸收什么人去从事歼灭活动没有控制权，犯罪分子和警察密探便能够通过这些暗杀小队打入党组织。再者，因为党对于暗杀对象的选择一无所知，这就产生一种异常现象：党要对错误选择的后果负责，却对选择没有控制权。事实上，纳萨尔巴里分子由于对于象暗杀某人这样严肃的事情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们暗杀对象的绝大多数，很难说得上是老百姓对其死亡无不称快的“为人痛恨的压迫者”。

虽然党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成立了，各级都选出了党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进行过工作。马宗达在党内统治机构中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由于他对斯里卡库兰和纳萨尔巴里起

义的领导和指导，他对党的创立的贡献，他是运动之父。但中央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则不那么易为人接受，而中央委员会很少开会讨论重要问题和做出决定。实际上，马宗达是党内的最高权威④；他发表在党刊上的文章和讲话，就成了党的路线⑤。党的政策的一些重大改变，并未经过中央委员会。例如，歼灭阶级敌人的路线，就是由十名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六九年二月搞起来的。当时他们袭击了一个地主，意在杀死他，可是他逃跑了。马宗达听到这件事时，评论说：“这应当是我们唤起农民群众的唯一方法”⑥。同样，运动的活动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是在参加运动的学生们的倡议下搞起来的；但是，党的政策本身却由于在各级院校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改变了。马宗达热情地支持这种行动，为学生和青年进行辩护，反驳象罗易·乔杜里、辛格等人的批评，甚至修改林彪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断言在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不需要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据来思考问题了⑦。

纳萨尔巴里分子组织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自发性和马宗达的权威。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在一九七〇年指出，最高决策机构已经一年多没有开会了，当时马宗达回答说：“我认为，在目前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机构的集中化，既不可能而又有害。集中化限制党员的主动性，从而磨钝和削弱党的进攻能力。经常举行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会议是不可能的，这样作风险太大了。”⑧不只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下级党委也难于以纪律约束党员。一九七〇年二月，党刊报道说，党内反对党的路线的人，对党的领导进行了狡猾的攻击，“其内容包括：在党内同志之间制造猜疑，削弱党的权威，即查鲁·马宗达同志的权威，说什么：查鲁·马宗



达同志沒有錯，我們當然跟他走，至於其他人，我們就是不承認，更不用說跟他們走了。”⑨

在一九七〇年年中，加爾各答的活動開始後不久，黨組織的權力被分散了⑩。這包含這樣的意思：每個地方組織可行使“充分的民主權利”，制定它的行動計劃和執行這些計劃而無需來自上面的指導。領導上的期望是在黨的公認的政策廣泛範圍內實現這種權力分散。用來為黨的這種組織上的變化辯護的理由是：這樣做會有效地迷惑警察的偵探體系⑪。雖然這種辯解可能有些道理，然而毫無疑問，這種機構上的變化只不過是正式承認實踐中已存在的東西罷了。雖然領導者們企圖在集中控制下加強組織，並控訴那些反對這種做法的人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傾向”和“不過是用‘左’的詞句打扮起來的”修正主義⑫，可是他們失敗了。普通成員不願意接受由“民主集中制”指導的黨通常要求的那種紀律的約束。

## 印度共（馬列）

### 為什麼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政黨

印度共（馬列）從未成為一個政黨；不論領導人多么希望建立一個集中的黨的機器，它仍舊是一個運動。造成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黨的政策和做法，以及它所吸收的黨員。這個黨依靠自發性來取得其武裝鬥爭綱領的成功。納薩爾巴里分子發起的起義，不是集中指導的；不論在那裡，只要個別的納薩爾巴里分子小組認為他們有足夠的力量進行起義，不顧其它地方的情況怎樣，起

义就开始了。这些活动不是相互配合得很好的，也不是夺取政权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纳萨尔巴里分子受到“星星之火”足以使武装斗争的思想象“燎原之火”一般地传播开来的信念的鼓舞<sup>⑬</sup>。歼灭运动和文化革命，都是由某些党员自发地先搞起来，然后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的。在加尔各答和郊区，为响应运动的口号，纳萨尔巴里小组在各处自发地成立起来了<sup>⑭</sup>。

运动的自发性及其口号，吸引了那些不愿意在活动中受纪律约束的人们。人们看到，这个运动没有能够吸引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这两个阶级在传统上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相连系的。印度共（马列）的领导者们，从来都不信任工人阶级，他们虽然在建立某些部族农民的组织方面获得成功，可是非部族农民却依然置身于运动之外，甚至无地农民也不参加。纳萨尔巴里分子要求农民拿起武器，夺取政权，却对他们眼前有限的经济要求不感兴趣。

立即发动武装斗争的号召和迴避枯燥无味的建立群众组织的工作，吸引了优秀大学的年轻的、理想主义的、诚实的学生。抵制考试的口号，把学校的青少年带进了运动。歼灭运动，把那些思想上虽然很差劲却能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们推到运动的最前列。在控制解放区方面，这些游民分子是有效的。运动的反工会口号，有助于发动一部分失业青年，这些青年甚至可以被用来反对现有的工会。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生长在城市，而且除了一部分反社会分子外，全都出身于中等阶级。这个阶级的组织得最好的部分——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办事员，依旧处于运动之外。优秀的大学生，认真地对待农村起义的任务，在一九七〇年年中以前是运动的推动力量，可是随后，他们成了“怀疑主义者”，他

们对毛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过于认真，使领导人感到不舒服<sup>⑮</sup>。马宗达把在农村组织歼灭小队的重大责任交给这部分人，可是当运动在城市发动以后，退学学生和青少年学生代替了这部分人，成了运动的突击队员。“书越读越蠢”现在成了座右铭<sup>⑯</sup>，因为这部分人不提问题。虽然他们在执行歼灭政策方面比大学生有成效得多，他们主要是忠诚于行动和地方小组，而不是忠诚于思想或党。只要这些分子占成员的绝大多数，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纪律良好的党组织<sup>⑰</sup>。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组织得最好的成员，是斯里卡库兰和德布拉的部族<sup>⑱</sup>。

纳萨尔巴里干部的个人主义的特征，更表现于几乎从一开始运动内部就存在着的派系斗争，以及最后分化为以重要人物为中心的几个派别。诸如对选举的态度、党的建立、工会的作用、歼灭运动、阶级敌人的定义、在中小学和大学的行动、在城市“捣毁偶像”的活动、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军的建立等问题，无不导致人们一批接着一批地离开运动的核心<sup>⑲</sup>。对他人意见的容忍，同那些在一两个关键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许多次要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在一个党内一起工作的思想，这些都是各个纳萨尔巴里分子不能容忍的。结果，在一起组成这个运动的各个派别瓦解了，他们不是集中力量进攻主要敌人，而是把他们的大量精力和物力用于同运动内部的对立派别进行论战，有时甚至兵戎相见。

虽然这运动是由一系列退出印度共（马）的行动开始的，但纳萨尔巴里干部的绝大多数，以前却未接触过共产主义运动。从它的纲领、国际从属关系和干部成分看，它是一个新的运动，同印度共、印度共（马）或统一的印度共产党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事实上，纳萨尔巴里分子把印度共描绘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印度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工作的政党，全然不考虑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了。印度共同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纲领是没有关系的。

## 是毛主义运动嗎？

纳萨尔巴里主义是毛主义运动吗？从它接受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它活动的指导原则，并承认中国党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这方面说，它是毛主义运动。印度共（马列）的纲领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反映了中国党的思想，而且它肯定中国解放战争的经验适用于印度。中国共产党承认了印度共（马列）。但在实践上，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同中国党在其解放斗争中的活动却甚少相似之处。这最明显地表现于：他们完全摒弃群众路线和群众组织，否定同一部分阶级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敌人的做法，不能在印度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印度的具体条件。他们坚持中国式的武装革命，但中国人自己却反对任何旧框框②。

纳萨尔巴里分子判断一切活动时，是以“国际领导”对这些活动的认可为根据的，而中国党在决定某项特定政策同中国条件的关系时，却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对其它共产党的独立性，而又不放弃国际主义。等于暗杀的歼灭政策，大概是他们对毛主义的最突出的偏离，使他们脱离了群众。中国共产党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就象“如鱼得水”一样。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同，纳萨尔巴里分子却采取了拒群众于千里之外的纲领。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发动以后，尽管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文化革命是鼓舞纳萨尔巴里分子

的两个主要源泉，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这些区别。

当我们在下文说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渊源时，我们将看出，有许多不同的而且时常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影响着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行动，毛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加尔各答的文化革命是西方的新左派运动和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联合产物。第三章曾谈到加尔各答的上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同新左派活动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号召抵制考试，都同样不相信工人阶级和“党的官僚主义”，都相信大学生的先锋作用等。象红卫兵一样，他们冲进学校和大学，对那里的当权派进行苛刻的审查，积极地在全市的墙壁上贴标语。象红卫兵在中国所干的那样，他们想要通过捣毁偶像的运动来把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有些人发现，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杀人狂和嗜血成性，同一度流行于孟加拉的对暗杀的崇拜有相似之处<sup>②1</sup>。有一些评论家提到马宗达对卡莉圣母——一位用敌人的断头作装饰的印度教女神——的信仰，来解释纳萨尔巴里式的暗杀<sup>②2</sup>。美国的一群颓废派按照仪式杀死了沙隆·塔特和她的朋友们，对于看过关于这次杀害的报道和关于纳萨尔巴里歼灭运动的报道的人们，必然会去进行比较的。在运动的城市阶段，它很类似阿拉伯黑九月集团对非武装的以色列人进行的袭击，或日本狂热分子的一个小组在洛德机场开枪射击旅客，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北爱尔兰进行的教派暗杀运动。在以上各事例中，都是一群人袭击和杀死属于另一方的非武装人员。

拿它同西德的巴德尔—梅因霍夫恐怖主义团体，或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或拉丁美洲城市游击队作类比，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些团体大半把它们袭击对象限制于财产、建筑物

和军事设施，而不是袭击个人。和这些城市团体不同，纳萨尔巴里分子从来没有绑架过当权的要人或外交官员，或对政府机关或军事基地进行过勇敢的袭击<sup>②③</sup>。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以后转移到城市，他们却从未接受这些城市恐怖主义者的思想。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歼灭理论的一个方面是：起初，游击战争要由少数人发动，一旦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接着便是群众的参加。这同古巴武装斗争的经验很相似<sup>②④</sup>。在古巴，象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一样，斗争是由少数出身于中等阶级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发动的，但是不久农民便大量参加进去了。古巴的经验同纳萨尔巴里斗争中赋予青年人的作用，很有一致的地方，尽管纳萨尔巴里分子不同于古巴人，没有能够把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古巴人也不同于纳萨尔巴里分子，从未杀害个人。此外，格瓦拉反对在用尽一切和平手段之前就进行武装斗争<sup>②⑤</sup>。

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于暴力的态度，是违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工人阶级对暴力并不感兴趣。事实上，没有什么事能比不流血而能够结束剥削更使工人阶级高兴。反之，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是压迫人的，并通过他们的强制性权力用暴力去对付人民。工人、农民及其同盟者，为了“防御”才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以结束暴力和压迫。工人是不害怕暴力的，然而并不为了暴力本身而爱暴力。此外，采取武装斗争是为了反对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强制性工具，而不是反对统治阶级的个人成员。一个个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也是他在其中成长并为之工作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不是主要

的敌人。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剥削阶级，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使革命者离开“群众行动”的路线。被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同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的对抗，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寻求的。列宁同恐怖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信任群众。毛的歼灭战，是针对日本的武装部队进行的，而不是针对地主的。地主受到中国解放军的种种惩罚——罚他们站在太阳下，吃掉他们的家畜，等等——，但是他们却很少被杀。只有经过公审才能杀人，而且大半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近年来，越南人证实他们是忠于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他们对杀害数以千计的非武装儿童、妇女、老人的被俘美国飞行员不加杀害，他们宽待俘虏，不仇恨美国人个人（不论其见解如何）。

纳萨尔巴里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它从许多方面吸取力量。说它是一个毛主义运动，就只是看到了他的外表和它对中国共产党忠诚，而忽视了它的实践。

## 为什么会出現納薩尔巴里主义？

为纳萨尔巴里运动打下基础并使之能支持四年之久的是些什么因素？为什么它发生在一九六七年，而不是在那一年以前？为什么它在一九七一年以后垮台了？

使纳萨尔巴里运动诞生的最根本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纳萨尔巴里主义是几个可供选择的形式之一，人民对于自身生活条件的不满，就是通过这些形式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来的。印度是一个穷人的富饶国家；它富有矿产资源，但是象它的人力一样，它的自然财富还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它

的广阔领土为它获得规模广泛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象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要建一座小工厂就感到困难，而印度则存在着建立大的从而是成本低廉的炼钢、炼油、化肥、小工具和机器制造等工业企业的广阔天地。广大的国内市场（尽管人民购买力是低的）、充足的原料和数量可观的技术人员——这些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印度全都具备。没有理由认为印度不会成为象四个大陆型国家（苏联、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那样的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印度仍旧是不发达世界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更不用去同发达的国家比较了②⑥。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印度（经济）的增长率也是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年不到百分之四②⑦。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即使做个最不现实的假定：其它国家不增长，停留在原地），印度赶上斯里兰卡要二十八年，赶上马来西亚要六十五年，赶上日本则要一百四十一年②⑧。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大于印度，这样，除非印度的增长率得到提高，否则印度在经济上就会越来越落在其他国家后面②⑨。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所取得的小小的经济进展，不是均匀地加以分配的，富人比穷人得的多，经济上的不平等扩大了③⑩。增加了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在扩大无地农民、小农为一方同富农为另一方之间的鸿沟方面，也起了作用③⑪。失业人数增加了，数量越来越大的医生、工程师和其他毕业生目前已难于找到工作③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食物不足，约一半人口营养不良③⑬，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③⑭。

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在六十年代的前一半时间里是更加尖锐了。这是同理解纳萨尔巴里主义的诞生有关的时期，当时，按



人口计算的收入和粮食消费量下降了，工业发展停滞，由于几年连续的坏收成，经济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这一时期的顶峰是比哈尔一九六七年的饥荒。对于支持印度政府的发达世界的救济机构来说，印度成了贫困和饥饿的同义语。在前些年政府关于计划、社会主义、解决失业和收入悬殊等问题的宣传这一背景下，人民变得更加灰心丧气了。虽然政府在五十年代曾谈论自力更生、不结盟和独立的外交政策，曾对外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加以限制，可是在六十年代，这一切全改变了。国民经济被抵押给外国利益集团，外援在第三个计划的预算中所占份额竟高达三分之一，根据第四百八十号公法进口了一千万吨粮食，使好几百万人不致饿死。

十分自然，经济上对于外国利益的依赖，会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上反映出来。所以，为了使美国债主满意，卢比在一九六六年贬值了，进口放宽了，对外国私营企业在印度工业中活动的一些限制取消了。美国政府的强大影响在其它领域也能感觉到：印度政府被迫放弃同越南和古巴的贸易，对美国侵略越南保持沉默。五十年代，印度在对外关系上曾发挥过刚健有力的作用；而在六十年代的多数年份里，印度的外交政策，至多不过是被动的。一九六二年印度在军事上败于中国人手下，也使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失；虽然可以用监禁的办法使左翼力量保持沉默，然而批评政府的右翼分子却得到支持。在这些年份里，占上风的政治气氛是一种不景气的、黯淡的气氛。

一九六七年选举引进了一个新要素——政治危机。到那时为止，政治制度是稳定的。这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国大党的优势，保持议会形式的政府，带有某些联邦特色但基本上是中央集

权制的行政管理，本国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分子结成强大联盟。在不发达国家的政党中，国大党由于历史悠久而有其独特性。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它在各级政府执政，从中央到邦、从城市和市镇直到村庄。

实行和保持了议会制，定期举行了选举，因为统治阶级相信他们可以通过选举来保持权力。在其它政党有可能上台执政或实际上已上台执政的地方，中央政府为了击败反对派，并非不乐于蔑视根深蒂固的议会规章；但是执政党从整个国家看，可把这些事件作为无关大局的事而不予置理。人民是支持执政党的，许多反对党在性质上同国大党并无区别。退出国大党和其它小党同国大党合并的事，在五十年代经常发生，然而对政治制度却没有什麼影响。中央和各邦之间的权力分配有利于中央；特别是，对于各邦说，中央在财政上是很强大的，并负责把工业企业分配给各邦。

国大党在各个邦的支配地位，意味着有关中央同各邦的关系问题，可以在执政党的组织内部加以解决，而无需提交法院。只要国大党是强大的，中央也就是强大的，不论其经济工作如何，政治制度是稳定的。国大党议员改换门庭、加入其它政党的例子，是极少的。变节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这意味着，在下次选举中，他的名字将不会列上国大党候选人名单，也意味着他将丧失种种官方支持。国大党就是政府，只有傻子才会冒犯国大党<sup>③⑤</sup>。

国大党内的大企业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这说明了何以强调计划性、工业化和公营企业（工业是需要的，但是由印度私营大企业用自己的钱去建立这些工业则花钱太多了）；但是在邦一

级，富农具有极其巨大的夺取选票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总的说来，这个联盟还行得通，虽然在象土地改革和谷物的采办等问题上，有时候执政党内这两个主要成分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一九六七年选举之后，这一政治制度暂时黯然失色约达四年之久。国大党在半数的邦里被击败了，在国会的多数地位大为削弱，在下次选举中，似乎很有失败的可能。一党占优势的日子已经逝去了。中央同各邦的关系已不能够再在党的结构之内加以解决。在国大党内，地方派起而与全国领导抗衡了。一九六七年选举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几个持不同意见的国大党在起作用，如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国大党、喀拉拉邦国大党、奥里萨邦的人民国大党，都是几个能取得一部分富农支持的政党。持不同意见的国大党组织的数目，在选举之后增加了。

背叛国大党，已不再是代价高昂的了。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得到这个党的支持现在已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了。在各邦和在中央，背叛国大党现在已成为典范行为。选出的人民代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一个邦的首席部长，两天内三跳其槽。到一九六九年，国大党自身分裂了，甘地夫人的政府在国会失去了多数，靠其它几个党的支持才勉强维持下去。政治上的动荡，同邦议会议员、国会议员进行讨价还价达成的交易，政党的增多，使议会制度的威信扫地以尽。当时，人们广泛地议论着军事接管或极权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性。

## 外部因素

纳萨尔巴里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政府的经济

工作存在着不满，收入的差别在扩大，国家的经济过份地依赖外援，存在着政治危机和动荡，议会制度威信扫地。纳萨尔巴里分子从国大党的失败中看出，人民不是站在执政党一边；他们从随着选举而来的党内争吵中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机会<sup>③⑥</sup>。议会制度的现状证实了他们认为它是“畜圈”的信念<sup>③⑦</sup>。印度经济对美国和苏联援助的依赖，使他们得出如下结论：印度资产阶级是买办性的。越过边界，他们看到了中国——一个有七亿人口的大国——在沒有外援的条件下向前迈进。外面的世界，或热爱中国，或痛恨中国，但是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和印度不同，尽管发生了文化革命，中国还是在推行一种生气勃勃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一个世界大国。那里沒有失业或饥饿，那里生气蓬勃。然而仅仅二十年以前，中国如果不比印度更穷也是和印度一样穷。他们用中国武装土地革命的成就来解释中印两国的差别，由毛泽东指导的这场革命消灭了剥削和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治制度。印度想要取得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用中国的方式进行一次革命。

这时候也正是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红卫兵正在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对在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个机构中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炮打司令部”是著名的毛主义口号。青年是运动的先锋；他们向一切人挑战，从地方党组织的干部到外交部长和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是不会犯错误的，或者还有林彪——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明显的接班人。按林彪的解释，中国方式的游击战，对世界上所有穷国都是普遍适用的<sup>③⑧</sup>。其它斗争形式是次要的。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为了保护革命的理想不受实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污染，必须继续保持警惕。“行动”是主要的字

眼，毛主席的思想是激励红卫兵的源泉。所有这些，对于年轻的纳萨尔巴里分子都具有极大的意义。苏联——列宁的国家，已经把革命置诸脑后，用物质刺激去提高生产，而中国则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正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

当代的另外两个发展，对于纳萨尔巴里思想也是有影响的。一九六五年美国出动重兵直接干预越南冲突之后，越南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九六八年新年攻势向世界证明：越南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尽管他们国土很小，而敌人又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越南，是一个英雄人民的英勇气概和决心在对抗一个优势的军事大国的侵略。这成了一个震撼世界良心的道德问题。对于发达国家的青年来说，这场战争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怀疑他们自己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他们是反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但很快就变成了反对这个“压制中有容忍”的社会的其它许多方面。一九六八年巴黎的学生运动，几乎使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国政府垮台。在西欧、美国和日本，到处都发生校园骚动。学生们反对各项课程都注重考试，憎恨把课程的内容同工商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要联系起来，怀疑作为教育制度基础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新左派——人们这样称呼学生运动——依靠自己的能量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并对这些国家的正统共产党保持独立。学生们看不起这些党，因为它们全神贯注于当前要求和在现制度之内进行工作。新左派谋求从外面改变现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国际运动，虽然各成员国在组织上彼此没有联系。他们中间有些人宣称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大多数其他人则是“革命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即使第一类人，在正统的意义上说，也是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sup>③⑨</sup>。然而越南战争的英雄气概和新左派提出的学生权力观，在印度的上

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思想上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们跑到纳萨尔巴里分子那边去了④⑩。

## 五十年代的右倾偏向

印度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如中国的文化革命、越南战争、新左派运动等大事，都帮助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从印度的情况说，联系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起源和成长，也是重要的。一九六四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分裂，就提出了有关印度马克思主义党的作用的某些根本问题（例如，按照印度共正式领导所持的见解，可以通过议会取得政权），但从印度共（马）诞生的时候起，则包含着“左的偏向”的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经验是：党在反对左倾偏向时，容易犯右倾的错误，反之，在反对右倾偏向时，则易犯左倾的错误④⑪。印度共（马）的成立，是党内十年来反右斗争的顶点，一部分党员要把党进一步向左推进到超过领导认为可以达到的限度，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五十年代多年推行议会主义而毫无成效之后，党现在分裂了，印度共（马）中的“左”翼分子要求抛弃一切议会活动，从而按照他们的看法使分裂达到其合乎逻辑的结局。另一方面，领导者在承认议会道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时，却又强调：为了策略的理由，在目前，议会活动仍应作为群众活动的一部分。同样，由分裂而使印度共（马）左翼产生的期望——党会号召开展武装斗争，并完全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也没有实现④⑫。为了对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联合阵线、采取更左的立场，纳萨尔巴里起义发动起来了；这个目

的沒达到，他们就以鼓励干部推翻领导人作为目的了。而中国党对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支持和他们对印度共（马）的反对，使得形成一个完全新的运动成为可能了。沒有中国党，便不会有印度共（马列）<sup>⑬</sup>。

## 为什么发生在西孟加拉？

为了理解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出现和成长，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它的最强大的基础在西孟加拉邦。它在比哈尔、北方邦、喀拉拉和旁遮普等邦的活动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安得拉邦，斯里卡库兰县帕尔瓦蒂布兰特区的起义对于邦政治也沒有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只有在西孟加拉邦，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间，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开展了城市运动的时候，他们才发展强大到被看作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为什么是在西孟加拉邦呢？

部分的解释是：孟加拉中等阶级缅怀其搞恐怖主义的同胞——如库迪兰，普拉富拉·查基，苏里亚·森，卡赖拉尔，普里蒂拉塔以及众多的其他烈士——在本世纪头三十年反对英国统治的英勇活动。这些革命者是孟加拉的民间英雄，每个男女儿童在学校里和家里，都读到关于他们的书籍和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在其他各邦中，只有马哈拉施特拉和旁遮普的活动可以同孟加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活动媲美。

可是，比恐怖主义的过去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五十年代左翼群众运动的战斗传统，关于这些运动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这些运动是在所有左翼政党几乎全参加的联合阵线的倡导下开展起来

的，开始是和平的，把群众集会、群众请愿、非暴力反抗和类似的行动作为它们的纲领。运动的力量日渐增长，终于以加尔各答的巨大示威而达到最高潮，全邦各地都有人前来参加这一示威。警察象经常一样失去了耐性，开始向示威者开枪或用警棍殴打他们，或两者兼施。示威于是分散成许多小队伍，分散到全市各处，同警察对抗。警察被迫躲进驻所，全市实际上由群众控制。这种状态继续了两三天，许多示威者被杀被捕，随后调进军队，夺回了该市的控制权，同时运动的要求至少也部分地满足了，左翼运动的领导者们（他们是在运动实际开始前被捕的）被释放了。

从一九五二年的粮食运动开始，以后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如一九五三年关于增加电车费的运动，一九五四年关于学校教师工资的运动，一九五六年关于西孟加拉同邻邦比哈尔合并问题的运动（这次没有发生开枪和武装对抗），以及一九五九年再次关于粮食的运动等。由于多种理由，这些运动对于该邦左翼运动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并给予它一个英勇的形象。这些有关单纯的、大众的问题然而在左翼旗帜下开展的运动，有助于反国大党的激进意见围绕联合阵线集中起来，这个联合阵线现在成了可以代替执政党的另一选择了。这些斗争的激进化影响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右翼教派政党从该邦政治领域中消失。这些因素也使联合阵线成为西孟加拉邦政治传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其它邦的联合阵线是由不同观点的政党在选举前夕组成的，和这些联合阵线不同，西孟加拉邦的联合阵线是以共同的群众活动为基础的④。



## 城市的不满：纳萨尔巴里主义和希瓦军

五十年代的这些经验同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关系，是不能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联合阵线策略中找到的，因为他们拒绝联合阵线的思想。但孟加拉政治的左倾性质及其同当局勇敢对抗的传统，是纳萨尔巴里主义成长的重要因素。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左翼政党只是在加尔各答及其邻近的相当城市化的地区才是有力量和有影响的。纳萨尔巴里主义本质上是城市的和中等阶级的现象。在孟买，城市中等阶级的不满通过希瓦军——一个右翼的法西斯组织——表现出来；而在加尔各答，纳萨尔巴里分子则成为表现此种不满的工具。在两种情况下，不满是共同的因素，运动都具有城市的性质<sup>④</sup>，但是有了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出现在加尔各答的那种局势和该城市的左倾历史，不满就容易表现出极左的外表。象纳萨尔巴里分子一样，孟买的希瓦军吸引了失业青年和贫民窟中的游民成分，参加个人的暴力行动。用社会——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两个运动属于同一种类，虽然采取了大不相同的政治态度。他们进攻的主要对象是工会和左翼力量——孟买的印度共，加尔各答的印度共（马）——，而最后两个运动的净结果也是相同的——加强了这两个邦的国大党执政派的政治力量和强制力量。这两个运动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活跃于各自的邦里，并在大约相同的时候结束。

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希瓦军用非马哈拉施特拉人流入孟买一事来说明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贫困，因为前者同后者竞争就业机会；而纳萨尔巴里分子则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西孟

加拉邦的形势。还有，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目标是在德里夺取政权，而希瓦军的目标就比较有节制得多，即把非马哈拉施特拉人排除在就业之外。但这差别依旧可能不象看起来那么大。在纳萨尔巴里分子思想中有一股孟加拉民族主义的强大暗流，凡是有机会同运动的“上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积极分子”谈话的人，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孟加拉国危机开始以后。纳萨尔巴里分子对于印度各邦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感到不耐烦。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在政治上是先进的，而在它们同其余各邦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们问道：“先进邦要等待多久印度其余邦才能赶上来？这真的可能发生吗？难道武装斗争自身不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革命的思想吗？难道革命派不应当在西孟加拉邦开始革命而不等待其它的邦，希望这些邦有一天会照样干起来吗④⑥？在孟加拉国成立之后，在一部分纳萨尔巴里分子思想中，“分离主义因素”表现出来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的《爱国者报》的一篇社论说：“象孟加拉一样，在东孟加拉的一场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在马列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始了，通过这两个孟加拉的农民战争，就产生了这两个孟加拉联合起来的可能性”④⑦。然而，在纳萨尔巴里运动中，这不是为人普遍接受的立场，而且有些领导人，如查特吉，就从来都是坚持他们运动的“全国性”④⑧。

如果西孟加拉邦左倾传统对纳萨尔巴里运动有强大的影响，那么就有必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运动不发生在印度另一个有广大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邦，即喀拉拉邦？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差别，在于两个邦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得到的政治支持具有极大不同的性质。到一九六七年以前，西孟加拉邦的马克思主义

者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有影响；而在喀拉拉邦，运动一向是以农村的无地农民和贫农为基础的。在喀拉拉邦，马克思主义者在城镇里和中等阶级中间的影响，则比较弱，邦的工业化程度低，它的都市在面积上和经济力量上，简直就没有能同加尔各答相比的。城市不满和左倾影响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纳萨尔巴里主义。在中央邦或拉贾斯坦邦，或都市化程度低、左翼运动进展小的邦里，都不会产生纳萨尔巴里主义。虽然纳萨尔巴里分子一笔勾销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所起的作用，摈弃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然而他们能够蓬勃发展的地区，却仅仅限于过去在共产党指导下的群众活动有一定传统的那些地区，这可说是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嘲弄。

再者，鉴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特点是它本质上是城市不满的一种表现，我们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运动在部族——运动的支持者中间的仅有的非城市成分——能得到相对的成功。首先，应着重指出，印度的部族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受了纳萨尔巴里的影响。纳萨尔巴里的人口是四万二千人，安得拉邦斯里卡库兰县的帕尔瓦蒂普兰特区的人口大约二十万，而全国五亿二千万人口中大约十分之一是部族人。在这些地区，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受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控制，各村庄的村民，也并不全是部族人，也并不是所有的部族人都主动地或被动地卷入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由于本书已经讲到的各种原因，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持者的范围。

第二，和非部族农民不同，部族人不属于印度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的风俗、耕种方法和社会生活的内部组织是不同的，而且是独特的。更重要的是：部族人认为他们不同于印度的其它社

会。全国各地的部族人，一致抱怨来到他们地区的身为高利贷者、地主或林务官的平原人，抱怨这些人破坏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第三，在过去，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对各种剥削的真正不满，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部族人曾同英国人打过仗，也有部族人用弓箭反对政府官员和地主的例子。在许多情况下，领导人都是外来的。在前土邦、现在是中央邦一部分的巴斯塔，一位反复无常的右翼王子甚至能够领导部族人同邦政府进行暴力对抗。

在斯里卡库兰，外来的催化剂是一位学校教师，在德布拉是一位律师，在纳萨尔巴里是一位专职的政治工作者——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部族人对于长期以来同他们的社会有着联系并对他们进行鼓动的领导人的个人忠诚，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部族人不大理解夺取政权这几个字的意思，但是他们却能比较容易地同在当地为人熟知和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站在一起。和处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的其它部族地区发生的情况一样，领导人决定加入印度共、印度共(马)或者纳萨尔巴里分子。在纳萨尔巴里，部族人跟着桑亚尔走，因为他们信任他。当桑亚尔是印度共的党员时，他们也和印度共在一起；桑亚尔参加了印度共(马)，他们跟着他，同样，桑亚尔加入纳萨尔巴里分子，他们还是和他在一起。可是，在城里的大学生来到村庄、纳萨尔巴里领导人忽视易为部族人理解的问题以后，在那些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仍旧能够保持部族人的忠诚。这些学生尽管做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和部族人打成一片，部族人对他们的来到是反感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都市性质，以及它所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同部族村庄的生活条件毫无联系，终于使他们脱离了部族人。

## 西孟加拉邦和加尔各答的社会经济状况

西孟加拉邦，特别是加尔各答的现有社会经济状况，对于理解这个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是很重要的。虽然六十年代前七年整个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可是西孟加拉邦的情况却比其余大多数邦更坏。作为一个工业化的邦，由于缺乏购买力，缺少使工业开动的零件<sup>④</sup>，特别是该邦最重要工业黄麻纺织业和机器业的零件，它遭到衰退的打击最沉重。在这期间，暂时解雇和关厂的数字创了纪录，工业纠纷达到历史上最高数字。在取得独立的时候，就工业产量、识字人数、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以及其它发展标志说，西孟加拉邦是几个最高的邦之一。独立后的头二十年，是西孟加拉邦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的时期。到六十年代的末尾，它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甚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数，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工业生产上远远超过了它，另外几个邦则也落后不多，就识字人数说，它只居第六位<sup>⑤</sup>。另一方面，西孟加拉邦在大学毕业失业方面，则远居其它邦之上。取得工科、医科和其它专业学位、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也难于找到工作<sup>⑥</sup>。

西孟加拉邦的危险的经济状态，也从加尔各答市政状况的恶化反映出来了。加尔各答是邦的经济、政治神经中枢，是一个大都会，是孟加拉人引为骄傲和钟爱的地方。到六十年代，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的交通系统是一团糟，其他公用事业如水、电、下水道、排水系统等，则处于全部崩溃的边缘。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贫民窟。有时，用砖修建的住宅内部比贫民窟还要糟，还有人住在人行道上。生活是不健康的，空气中充满细菌。这座城市

是世界上霍乱病的主要中心。到处是垃圾，乞丐和狗在垃圾堆上寻找食物和相互厮打。一度是印度最大港口的加尔各答港，显然正在死亡。人们有理由指责德里政府的忽视和歧视。成百万的钱用来美化这个国家的首都，修建五彩缤纷的喷泉、青翠的公园、阔宽的马路，可是中央政府对加尔各答的基本需要却始终无动于衷。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也正经历着危机。它的各个著名的电影制片厂，由于得不到支持而奄奄待毙，它的大学已没落到成为授予学位的工厂。在那么多人失业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学位，而不是教育。全世界都有人到加尔各答来，但不是为了欣赏它的美丽或历史，而是因为它是举世无双的赤贫的象征。

## 印度共（馬）和納薩尔巴里分子

西孟加拉邦有高度表达能力的、有政治觉悟的居民，对于这种歧视的、漠不关心的行动感到愤怒，乃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国大党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的选举中一再失败，左翼政党的出现，尤其是印度共(马)成为邦政治中的支配力量——这些反映了人民反对国大党执政派的高潮。到一九六九年底，国大党在这个邦的政治追随者降到最低点。虽然到一九七〇年三月，第二次联合阵线垮台了，实行了总统的统治，然而国大党并不是从联合阵线的瓦解得到好处的党。很清楚，如果举行选举，印度共（马）在其小盟友的支持下会赢得全胜，尽管有国大党的反对，以及孟加拉国大党、印度共及联合阵线中其它一些先前的伙伴的反对<sup>⑤2</sup>。

考虑到印度共（马）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间在西孟加拉邦

政治中拥有强有力的地位，纳萨尔巴里在该邦活动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它给印度共(马)造成的困难，大于给国大党或其任加尔各答和德里的政府造成的困难。首先，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该邦组织的四次农村起义中，纳萨尔巴里、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三次起义，是在联合阵线政府（印度共〔马〕是主要成员）执政时发动的；比尔布姆起义则发生在一九七一年选举几个月之后，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在该县被印度共(马)击败了。而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九六九年三月，一九七〇年三月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当邦政府由国大党掌管或者由邦长掌管的时候，却没有发动农村起义。

第二，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期间，印度共(马)同印度共(马列)的干部之间发生了几次严重冲突，而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纳萨尔巴里分子同国大党党员之间才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因为纳萨尔巴里运动是由于印度共(马)领导人同纳萨尔巴里分子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所以他们的关系紧张和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象在西孟加拉邦，这两派在其它邦的积极分子，虽然有时也有论战，却很少以兵戎相见。甚至在安得拉邦，印度共(马)由于其成员跑到纳萨尔巴里分子那边去而损失最重，可是两派的追随者也不曾发生武装冲突。在喀拉拉邦，政治上的对立和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存在于两派之间。即使在西孟加拉邦，到一九七〇年四月以前，他们之间也很少发生武装冲突，而且据报道只有一人因冲突死亡<sup>⑤③</sup>。但是在那时间以后，当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城市里发动了进攻，冲突的次数和激烈程度便突然增长了。

第三，纳萨尔巴里分子，一般地不同国家的强制力量进行武装冲突，并且约束自己不去袭击资本家的房屋和财产。马宗达强

谓的是杀死“阶级敌人”，而不是袭击警察或军事设施，因为他认为后一种行动会减弱进行阶级战争的热情。加尔各答的阶级敌人，不是大商人或执政党的政客们，也不包括高级警官，而印度共（马）的干部，交通警察和小商人则成了对象<sup>⑤4</sup>。

纳萨尔巴里活动，从未成为对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反之，当印度共（马）迅速壮大而且邦内政治情绪向左转的时候，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对印度共（马）所持的态度，纳萨尔巴里分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国大党反对印度共（马）夺取该邦政治控制权的同盟者。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思想上和人身上对印度共（马）的攻击，正好发生在印度共（马）的左的口号已证明能有效地反对国大党的时候。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联合阵线政府所属的农村地区的起义，削弱了印度共（马）的道义上的地位。它被迫或者支持这些起义，而这将意味着他们接受纳萨尔巴里的思想立场；或者镇压这些起义，而这对于一个献身于社会革命的党来说则是一项极度痛苦的工作；或者加以限制而不镇压，而这是印度共（马）在德布拉和戈皮巴拉布普尔所采取的路线，结果使它成为右派和左派的攻击目标。纳萨尔巴里分子曾期望他们在加尔各答对印度共（马）的进攻将证明，尽管印度共（马）具有革命声势，它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纳萨尔巴里分子还希望这会产生印度共（马）党员转到他们方面去的山崩。由于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印度共（马）必然在两方面都受到损失。它同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冲突，使每一个贴上共产党标志的组织都威信扫地，从而帮助了反共势力。德里政府借口纳萨尔巴里活动而不在一九七〇——七一年举行西孟加拉选举（当时印度共〔马〕是最有可能上台的政党），本是用来对付暴力的专断措施，也用来反对一切左翼党



派，包括印度共（马）和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内。最后，不可能的事发生了：这些活动，在保证国大党一九七一年以后在该邦政治上东山再起，是起了作用的。

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反对印度共（马）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从国大党和其它政党得到道义上的支持，他们在西孟加拉能否象一九七〇——七一年那样发展，则是一个疑问。

## 报刊的作用

同上一段提到的问题有关的最后一点，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传统的反共报刊，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各个日报，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诞生及其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纳萨尔巴里插曲引出了由印度各报记者写的几辑专门故事，这些记者访问了那个地区，会见了一些领导人和当地人。这些报道大大地夸大了游击活动的水平和为武装斗争进行的准备。通过这些报道，在人们中间制造了一种印象：广泛的武装起义即将在全国各地爆发。对于在德布拉、戈皮巴拉布普尔和比尔布姆发生的事，也作了相似的报道，对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后的加尔各答进攻，报刊一连好几个月进行了极细致的报道。在《解放》和《爱国者报》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各日报对这两个刊物刊载的重要文件和消息广泛地作了报道。此外，在报道这些活动时，不仅纳萨尔巴里分子没有因这些活动而受到指责，而且新闻报道或社论总是要把这些活动同印度共（马）的活动加以比较，做出结论说：印度共（马）的活动更为激烈、更为过分、更为危险，而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活动，则是一些起来反对母党的议会主义的浪漫的、有才华的革命

青年的“受错误引导的行动”。当时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作法：报纸的新闻报道和社论都要印度共（马）对一切政治要人的被暗杀负责，而不去发表相矛盾的消息，即使已明白证实印度共（马）同这些暗杀毫无关系。这种滥用报刊享有的特权的最突出事例，是有关赫曼塔·巴苏被暗杀的报道<sup>⑤⑤</sup>。

有时，为了使公众保持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兴趣，报刊甚至不惜编造故事。例如，伦敦《泰晤士报》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的社论中注意到，在纳萨尔巴里分子除了写写口号和在斯里卡库兰进行了一些袭击外实际上没有干什么的时候<sup>⑤⑥</sup>，“纳萨尔巴里分子上了头条新闻，似乎活动于西孟加拉、安得拉、喀拉拉和其它六个邦里。”它在“粗略地看了印度报纸”以后，问了这些问题：“星星之火——借用毛主席的话——已经在印度原野上点起了大火吗？”“在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政权终究也是要出自枪杆子吗？”<sup>⑤⑦</sup>在一九七〇年到七一年间写的许多报告，暗示纳萨尔巴里分子已开始为“长征”做准备。这些报道作为依据的实际证据不过是查鲁·马宗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当他说到一九七〇年——七一年期间一支人民解放军将在西孟加拉的广大平原上进军时，他并不是白日做梦<sup>⑤⑧</sup>。另一次，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名记者宣称，马宗达有一次突然走进他在孟吉尔（比哈尔邦）的小屋，会见了客人，然后立即离开了。这篇报道引证马宗达的话，说他曾说“在（一九四九年）当时的形势下是唯一正确的原理的兰那地夫主义，被共产党抛在一边了”<sup>⑤⑨</sup>。凡是读过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解放》头三期<sup>⑥⑩</sup>上谴责兰那地夫的文章的人，都会对这篇报道感到惊讶的。

为什么报刊对纳萨尔巴里活动作了这么多的报道呢？对报刊

如果表示最大的仁慈，那么解释就是：这类报道——关于秘密运动、神秘事件、阴谋、凶杀等等——是激动人心和耸人听闻的，读起来给人以刺激。如果不那么仁慈，那么解释则是：鉴于印度报刊的反共传统，发表这些报道是为了吓唬那些不受约束的人，为了巩固反共意见，也是为了进一步分裂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印度报刊关于纳萨尔巴里活动的报道，如果不起别的什么作用，毫无疑问，它在关于印度革命的可能性方面有助于把中国党引入错误的看法。因为，中国人不见得会在这个国家保持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很可能中国人会这样想：如果反共的报刊对于革命的潜在力量是如此害怕，那么其中一定有些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中国报纸广泛地引用印度报刊，来证明北京关于武装斗争的烈火正在这个国家扩展的论断。例如，新华社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农民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的报道，报道说，“据印度报纸报道，在大吉岭县的许多山区里，‘纳萨尔巴里式的运动，正在悄悄地展开。’”<sup>⑥1</sup>这篇报道引用《甘露市场报》，暗示革命的形势存在于西孟加拉（桑蒂普尔、萨尔班南达普尔、纳巴德威普、拉纳加特）、安得拉（纳尔冈达、斯里卡库兰）、比哈尔（普尔尼亚）和喀拉拉（舍塔拉伊）的许多地方。一些不出名的印度报纸也不时被引用来支持中国的理论。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引用孟买的《印度之光》，说该报称“在纳萨尔巴里发生的是农民斗争的高潮，它正在为遍及全国的总革命铺平道路”。这篇报道称赞纳萨尔巴里为“新的特仑甘纳”<sup>⑥2</sup>。

对于文化革命阶段纳萨尔巴里分子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详细报道，在加尔各答的一部分青少年中形成一种风气，即称自己为纳

萨尔巴里分子，而不去理会运动的思想内容。如同青少年的崇拜通过报刊广播而在其它国家传播开来——如“快乐—美丽—音乐”在英国的传播，“嬉皮士—地狱的天使”在美国的传播——，纳萨尔巴里主义，由于报刊的宣传，而得以在加尔各答的青少年中流行起来。正当以加尔各答为基地的纳萨尔巴里分子想要相信运动在农村的影响正在增长的时候，关于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农村活动的夸大报道，也助长了他们自我欺骗的习惯。

## 运动为什么失败了？

纳萨尔巴里主义失败了，大半是因为它对印度局势的估量和对统治阶级的分析是错误的。印度的统治阶级不是买办性的，并不缺乏人民的支持；尽管人民贫穷、收入悬殊，但是人民还不准备革命。虽然人民的处境是悲惨的，可是大多数人民在政治上还没有觉悟。争取群众政治上忠于自己的斗争，反对忠于种姓、宗教、语言等旧传统的斗争，以至反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公众记忆中大党的斗争，均未结束。西孟加拉邦不是印度，然而即使是在西孟加拉邦，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做的主观准备也被过高估计了。

一九六九年发生的事情表明，尽管有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经济危机，以及一九六七年选举造成的政治危机，统治阶级依旧保持有足够的活力恢复过来。连续几年的好收成和绿色革命，暂时制止了经济危机；孟加拉国的胜利带来了政治威信；甘地夫人采用分裂国大党把“老战士”开除出党的办法，改变了执政党的形象。从印度共和苏联得到的支持，使“消除贫困”这个口号有

了威信；在外交方面，经过了几年时间以后，政府从一九七一年起表现了新的主动精神。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选举，证明执政党在这个国家中仍然得到很大的支持。只有在西孟加拉它的政治优势才受到威胁，它因此被迫采取半法西斯方法来赢得胜利<sup>⑥③</sup>。经过一九七二年选举，从全国来看，执政党的权力和影响，同为人熟悉的一九六七年以前的情况是相似的，各个地方和各级都由它统治。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的政治危机眼下是过去了。

在外部世界也发生了几件重要的变化。到一九七〇年，西方的新左翼跑完了它的历程；到一九七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中国，已辨认不出了。文化革命的主要激励者、一度被公认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在同毛发生分歧后逃往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坠毁而死亡。中国党公开承认，它在爆炸性的革命年代里犯了左倾的错误<sup>⑥④</sup>。中国改变了它在六十年代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现在向每个国家，甚至美国伸出友谊之手。美苏合作阴谋摧毁中国的理论，已不再有说服力了。尽管出现了孟加拉国，它同印度的关系也在改善。中国对孟加拉国的态度，使一些纳萨尔巴里分子感到沮丧；另一些人知道了中国对于印度共（马列）的某些主要方面所做的批评后，对纳萨尔巴里主义丧失了兴趣。“收听北京广播”的口号仍旧写在加尔各答的一些墙壁上，可是却听不到有关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广播。

纳萨尔巴里分子由于夺取政权的口号行不通，于是退而搞起了歼灭运动，这歼灭运动使他们进一步脱离群众，并终于导致运动在城乡的毁灭。党纲和政策的多次改变，在运动内部引起了激

烈的派系斗争，并使运动的一般成员灰心丧气，随后，警察和反社会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的一系列行动中围捕了他们，或杀死了他们。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间热衷于报道纳萨尔巴里活动的报刊，在纳萨尔巴里分子成为残酷进攻的对象时却一言不发<sup>⑤</sup>。

### 查鲁·马宗达

如果不说几句有关查鲁·马宗达的话，这一章便不能说是完整的。他是纳萨尔巴里运动之父式的人物，是印度范围内相当于毛主席的人物。《解放》的一篇文章说，“从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发端到党的建立，通过对暗藏在党内的敌人的斗争来加强党，党对于全印度武装斗争给予的领导……这些大事的每一件都铭刻着我们敬爱的领袖查鲁·马宗达在党和革命的各个阶段进行的有才干的、正确的、成功的领导的不可磨灭的印记”<sup>⑥</sup>。“马宗达因为把毛泽东思想创造性的应用于印度的条件而得到称赞<sup>⑦</sup>。他控制着组织，他是党的“革命权威”。起草文件或写文章而不提到马宗达的名字，就等于蔑视革命权威<sup>⑧</sup>。另一方面，他的谈话和评论，就成了党的路线。

因为马宗达是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化身，对党的政策的任何批评，总是导致对马宗达的批评。人们批评他在党内鼓励官僚主义，压制对领导人的批评，在党员中间鼓励奴隶般的服从。人们批评他把自己立为印度革命的预言者，以毛主义的名义把他自己的思想塞进运动。他的政策受到攻击，认为偏离了毛主席的思想。他的工作作风，包括他对政治星占学的运用，也受到批评<sup>⑨</sup>。

同马宗达在私人方面和政策上的分歧，使许多人离开了党，到一九七一年年中，党的所有其他主要负责人，要么离开了党，要么被杀害或被逮捕了。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以前，只有马宗达还活着，倖免于被捕。

随着马宗达之死，运动的一个特殊阶段结束了。纳萨尔巴里主义不仅号召立即进行武装斗争和忠实于中国道路，而且指歼灭的理论，摒弃统一战线、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以及搞城市游击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带有马宗达的个人标记。没有这些政策，没有马宗达，纳萨尔巴里主义就不能是它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的那个样子。从马宗达死后他的同事们对他的批评看⑦⑩，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这些方面，多半会被抛弃，即使纳萨尔巴里组织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在这本书里是把纳萨尔巴里运动当作已经过去的事来处理的。

## 教訓和前途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其它一些方面，在马宗达死后或许会流传下去。纳萨尔巴里主义不仅仅是鼓吹歼灭和反对“群众路线”的运动。它自称是毛主义的，它赞成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它是某些阶层人民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行动方式。

至于它作为一个亲华运动的作用，除非国际共运力量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印度总会有一些集团将从中国党吸取力量的。他们的力量和政策，除了其它因素外，将决定于印中两国政府的关系。在政府同中国友好的国家里，各亲中国集团就比较

容易开展活动，而无需怕受到迫害，但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武装斗争的口号。在斯里兰卡，政府是同中国友好的，各亲华集团给与政府以有批判的支持。这些集团也批评由人民解放阵线在一九七一年发起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歼灭阶段前的纳萨尔巴里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sup>①</sup>。

中国党一般地并不看重出现在其它国家的为数众多的毛主义集团。在印度，虽然印度共（马列）得到承认，但其它相互竞争的亲华集团到达中国使馆的通路并没有堵塞，它们既未受到谴责，也未受到压力要他们加入印度共（马列），组成一个亲华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改善同印度政府的关系，这一决定将同这些集团的活动无关，而是以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目的作为依据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中国对于越南、朝鲜和罗马尼亚党的态度，因为这三个党和古巴党一起，同印度共（马）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北京的政策是提倡在其它国家成立新党，这些党将是中国党的被保护者。中共承认了在文化革命中犯了“左倾错误”，现在有可能在互相尊重独立的基础上同未必是纳萨尔巴里分子那样的亲华的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文化革命的时期，中国党和亲中国的党，都不大愿意把这三个党同阿尔巴尼亚党摆平，这三个党同中共的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并不那么热烈。在世界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态度是否会发生变化，中国人是否准备全心全意地接受它们维护独立性的表示，则尚待揭晓。这种态度的改变，也将影响中国同印度共（马）的关系，印度共（马）尽管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间遭到中共的凶恶攻击，在批评中国党方面，却一直十分谨慎小心，同时在同其它党的关系上表示了它的独立性。



撇开它们对中国党所表示的忠诚，纳萨尔巴里各派同印度共（马）在印度纲领方面的分歧，由于马宗达先前的一些同事近来对马宗达进行的批评而缩小了，这些批评者包括卡努·桑亚尔和斯里卡库兰起义的两个还活着的最重要的领导人 C·特杰斯瓦拉·拉奥和纳格布尚·帕特奈克<sup>(72)</sup>。他们致纳萨尔巴里分子的信提到马宗达的“左倾冒险主义偏向”，以及他不在党员中传阅中国党对他的歼灭政策和摒弃群众路线的做法提出的批评；他们谴责“左倾偏向”，认为这是运动的主要危险。象林彪一样，现在可以把马宗达作为印度共（马列）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一切过失的替罪羊。虽然那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的，不敢在马宗达犯这些错误的时候批评他，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些批评，为印度共（马）和纳萨尔巴里分子毫无思想保留地去开展联合群众活动开辟了道路，尽管他们之间在各种意识形态问题上有着分歧。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和派别是否会做出这种选择，则要以后才能看明白，虽然中国给印度共（马列）所提的意见中强调统一战线会使采取这一政策变得比较容易一些<sup>(73)</sup>。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强调革命是刻不容缓的。这个运动的历史证明，纳萨尔巴里分子号召立即夺取政权是错误的。但印度的经验还没有否定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在这个国家赢得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表明，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算是微不足道的。首先，要在这个国家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是有困难的，在这个国度里，宣传工具是对共产党怀有偏见的，识字率是低的，而宗教、种姓制度、语言及类似的问题可以被执政党用来转移人们对于在阶级基础上进行斗争的必要的注意力。第二，过去的经验证明了印度统治阶级完全蔑视它鼓吹的民

的基本准则。这一点由范围广泛的选举舞弊表现出来，例如贿赂选民，控制选票，收买反对党的候选人，宣布反对党的提名证书无效，通过法院命令或关进监狱的办法阻止反对党候选人从事竞选活动。

虽然使用了这些方法，大企业的报刊进行了持久的宣传，封建利益和工商业利益对选民施加了压力，这时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或单独地，或同其它政党联合起来——仍能在一个邦里取得多数议席，那么他们或者被剥夺组织政府的机会，或者在政府组成之后被人用种种方法搞垮。这表明印度统治阶级不愿意接受反对它的选举裁决。第三，新德里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的所作所为证明：执政党会毫不犹豫地调来军队，抛弃议会，如果共产党竟然通过选票箱在中央上台执政的话。现在在印度把武装斗争列入议事日程，也许为时过早，但是从长远看——也许并不太长久——，武装斗争的必然性，并没有由于纳萨尔巴里的经验而受到怀疑。

纳萨尔巴里主义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是人民的某些部分不满的产物。这些人的不满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对部族人的剥削还在继续，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保护他们拥有他们开垦和耕种的土地的权利，或保护他们不受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下一次，部族人的造反，可能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或者不相联系，也可能不是由左派领导的，但部族人感觉到的不满肯定会表现出来。在西孟加拉邦，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正在制定对加尔各答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计划，以求为执政党夺回这个邦。宏伟的工程，诸如地下铁道、第二座胡格利河大桥、把哈尔迪亚建成卫星港都已动工了，邦政府已对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发出了就业的保证。

但这些会成功吗？加尔各答都会发展局推展多项计划的计划在面临着许多困难；加尔迪亚工程已落后计划好几年，因为在德里同加尔各答之间关于外汇分配的混乱，大桥的建设不能被原定时间开工；对于邦政府各部门一万三千个办事人员职位提出申请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政府至今还不能处理这些申请。此外，邦的国大党政府，由于内部冲突和政府中各对立军事集团之间的积怨，已明显呈现出分裂的可能性。别的不论，光是邦官厅机构的普遍贪污腐化和无效能，就一定会计使这些计划不能好好执行。在全国来说，因印度战胜巴基斯坦和绿色革命的明显成功而出现的异常欢乐心情，已经过去了。一九七三年粮食生产的数字，预计要大大下降，马哈拉施特拉邦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失业在全国继续上升。

最后，纳萨尔巴里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暴力。但暴力不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或共产党人或西孟加拉邦特有的。甚至在一九七〇——七一年，北方邦发生的暗杀比西孟加拉邦还多。不论在什么问题爆发暴力行动（种姓制度、宗教、语言或阶级），不论提出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右翼的或左翼的），不论暴力行动采用什么形式（骚动、恐怖主义行动、强盗行为或群众示威），所有这一切行动都具有反映现存社会制度的彻底不足的单一特点。教派事件的次数，从一九六一年的六十一件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五百一十九件，因为参加的人是以教派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贫困的。纳萨尔巴里分子采用暴力行动，是从阶级观点来说明他们的贫穷和不平等的。自发的、无组织的凶暴事件，例如学生同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冲突，抢劫仓库，袭击火车和公共汽车，也是同一疾病的症状。另一面是国家采用的暴力行动，如不加区别地枪杀、

逮捕和拷打，以及对于有产阶级对比较无权的人们进行的暴行——在马德拉斯事件中，无地农户的四十八名妇女、儿童和男人被地主活活烧死——漠然置之。贫穷、不平等和失业也是同样难以忍受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最重要的教训是：采用革命的一个特种样板，而不考虑它同有关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和政治现实，那就是自杀。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应当理解群众的情绪，应当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的宽广范围内使其政策和做法适应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分裂是无益的，要有一个容许党内民主、相互忍让、纪律严格的党组织，不能有别的选择。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事情暂时进展得不那么顺利时，不应当灰心丧气。在他们中间，只有那些最不老练的人才会为短期的成功或失败沉不住气，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运动从来不直线发展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相信政治占星术，说到某时某刻革命就将完成，那他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可能比人们现在能预见到的时间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晚一些。一个革命者应当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家。

## 注 释

①参看第一章第三节。

②查鲁·马宗达：《为什么我们必须现在建党？》，《解放》，一九六九年三月。

- ③详见第二章。
- ④观察家：《要赢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树立革命的权威》，《解放》，一九七〇年二月。
- ⑤用马宗达的名字发表在《解放》上的文章，有许多是他同各个小组谈话的纪要。还可参看S·罗易：《两起死亡事件》，《新地》，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
- ⑥《解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斯里卡库兰游击斗争扩展到平原：一个教训》。
- ⑦参看第三章。
- ⑧《新的潮流和在某些问题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印度共（马列）出版的供党内传阅的一个文件，包括比哈尔组织的批评和马宗达的回答。
- ⑨观察家：前引文。
- ⑩《自由新闻杂志》，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
- ⑪警察官员们也承认，纳萨尔巴里组织的非集中化，使他们侦察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工作变得困难了。参看《政治家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 ⑫查鲁·马宗达：《通过总结印度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向前迈进》，《解放》，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 ⑬参看第二章。
- ⑭参看第四章。
- ⑮观察家：前引文。
- ⑯马宗达在对学生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毛的这句著名的评论，《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在运动的都市阶段；这句话成了流行的口号。
- ⑰参看第四章。
- ⑱参看后面。
- ⑲参看第六章。
- ⑳参看第七章。

⑲K. K. 梅农：《一件谋杀案的剖析》，《新地》，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⑳《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

㉑纳萨尔巴里分子曾进攻贝塔拉的一个有八人的武装警察哨所，夺了他们的枪。在马古尔詹发生了另一起事件，从警察哨所里抢走了四枝枪。在一九七一年，还报道过类似的从单个警察手中夺枪的事。但是没有发生进攻军队哨所的事，实际上，除了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选举日，军队从未卷入同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冲突。

㉒查鲁·马宗达：《关于当前若干政治和组织问题》，《解放》，一九六九年七月。

㉓切·格瓦拉：《论游击战争》。

㉔例如，就一九六九年说，在有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统计资料的九十六个国家中，只有十个国家（包括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和八个非洲国家）的数字低于印度。参看联合国：《一九七二年统计年鉴》，一九七三年。

㉕例如，在有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七年增长率的统计资料的四十三个国家中，只有六个国家的增长率低于印度。参看联合国：《世界经济调查，一九六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

㉖同上。

㉗同上。

㉘P. K. 巴德汉：《印度收入分配型式的考察》，一九七三年（油印稿）。

㉙参看例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关于大规模引种粮食高产品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研究、文选集》，一九七一年。

㉚然而，由于政府已停止发表关于失业的数字，因此不能提出数字。参看印度政府：《失业委员会的报告》，第一卷、第二卷，一九七二年。

- ③③参看P.V.苏克哈特：《填饱印度不断增加的亿万人民的肚子》，一九六五年。
- ③④参看P.K.巴德汉：前引书；丹德卡、尼尔坎塔·拉特：《印度的贫困：幅度和趋势》，一九七一年；V.S.维亚斯：《制度的变革、农业生产和农村贫困》，《商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九日。
- ③⑤另一方面，大量的无党派人士和其它政党的党员，在选举之后转到国大党那一边去，也是司空见惯的。
- ③⑥参看《印度共（马列）纲领》。
- ③⑦列宁的话“议会是畜圈”，是纳萨尔巴里分子喜爱的一句话。
- ③⑧《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九六五年。
- ③⑨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西方的学生政治》，《新地》，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 ④⑩阿索克·鲁德拉：《纳萨尔巴里国际》，《新地》，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三日；阿龙·库马尔·罗易：《选票和革命》，《新地》，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
- ④⑪林彪：前引文。
- ④⑫参看第七章。
- ④⑬同上。
- ④⑭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联合阵线政治和选举》，《新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
- ④⑮参看第四章。
- ④⑯为了了解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性估价，请参看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西孟加拉的“甘地主义”》，《现代亚洲杂志》，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七二年。
- ④⑰《爱国者》，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
- ④⑱阿希姆·查特吉：《论孟加拉国》（孟加拉文），一个党内文件。

④参看西孟加拉邦计划局：《西孟加拉邦第五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的方针》，还可参看拉纳吉塔·罗易：《西孟加拉的痛苦》，一九七一年。

⑤同上。

⑥持有工科文凭的人中间，大约有一万名失业者，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中大约有二千人失业。参看《欢喜市场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还可参看西孟加拉政府：《西孟加拉邦一九七〇年劳工统计手册》，一九七一年。

⑦在一九七一年的选举中，尽管人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运动反对印度共（马），该党及其盟友仍然几乎得以在邦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

⑧这些冲突（死亡一人）中，有两起分别发生于加尔各答的大学和贾达夫普尔的大学；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两派在加尔各答广场附近发生了另一次冲突。参看《甘露市场报》，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

⑨参看第四章。

⑩参看第四章。

⑪《论坛》，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⑫《泰晤士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

⑬《解放》，一九七〇年三月，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月。

⑭《甘露市场报》，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

⑮《解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九六八年一月。

⑯《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⑰《新华社英文电讯》（伦敦），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⑱比普拉布·达斯古普塔：《西孟加拉一九七二年的选举》，见《经济和政治周报》，一九七二年四月。

⑲为了详细了解中国左右两派的斗争，请参看贾亚普·范·金



內坎：《五·一六运动的一九六七年阴谋》，《当代亚洲杂志》，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七二年。

⑥⑤报纸现在是放肆地反加尔各答的纳萨尔巴里分子。

⑥⑥观察家：前引文。

⑥⑦参看第六章中“马宗达同比哈尔组织的分歧”一节。还可参看《解放》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月，《大动荡时期》。

⑥⑧《解放》，一九七〇年二月。

⑥⑨参看第六章。

⑦⑩《主流》，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⑦⑪主要的批评是：条件不成熟时就发动了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上层人士，其结果是加强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

⑦⑫《主流》，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⑦⑬同上。